

白 首 回 眸

回忆当年“一二·一”

1945年的“一二·一”学生运动是我人生征途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当时是日本投降，二战胜利，全国人民企盼和平与民主，可蒋介石仍然坚持法西斯专政，一心想扑灭共产党、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内战危机迫在眉睫。昆明学生率先发动了反内战、争民主的学生运动，1945年12月1日，惨遭国民党军警的血腥镇压，四名师生，英勇殉难。事件发生后，全国震动。各大城市纷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声援昆明同学及反内战、争民主的学生运动。

那时我在成都甫澄中学念高二。早在1943年，我就参加了大中学生的进步组织燹火社。1944年—1945年，由于地下党员的参加和领导，她实际上已成为党的外围组织。

“一二·一”的消息传到成都，燹火社召开了紧急会议，号召全体社员积极投入斗争。在这之前，我们已经秘密散发了民主同盟中央主席张澜先生的小册子《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在民盟盟员、燹火社社长、我们的老师崔宗复先生带领下，我和其他几个燹火社骨干份子拜访了张澜先生并聆听了他对当前时局的分析，受到很大鼓舞和教育。12月7日晚，燹火社社员通宵夜战，写标语、印传单和《告全市同学

书》。次日清晨，分头出动，在全市各主要街道和学校门口张贴，然后回到各自所在的学校去宣传、发动和组织同学参加这一运动。

整整一夜没有合眼，可是我没有一点倦意，热血始终在我胸中翻腾，正义感和强烈的爱憎之火在我心中燃烧，使我没有任何畏惧。我回甫中后，立即找我们的星火文艺社社长廖光策商量，很快召开了紧急社员会议。

我是星火文艺社编辑，主编《星火》壁报。时间紧迫，来不及等大家写文章，于是我利用手中的《华西晚报》，搞剪报，附加醒目的标题和我们的呼吁，很快编出了《反对内战暨援助昆明受难同学特刊》。《华西晚报》是民主同盟的机关报，实际上是地下党领导的。文革后我看过一篇文章，是该报党的负责人田一平写他到重庆红岩村中共中央南方局向周恩来汇报工作的回忆，才知道《华西晚报》是南方局领导下的报纸。我虽然不认识该报的编辑和负责人，却在该报发表过大量的杂文。在她的庆祝创办几（？）周年的特刊上，还发表过一首题为《我歌颂你——大众的吹鼓手》的诗。

甫澄中学同别的蒋管区的学校一样，实行的是法西斯教育，所以我们的《特刊》和标语传单只能在晚间贴出。第二天是一二·九运动纪念日，是全市大中学生示威游行、声援昆明同学的日子。一大早，星火文艺社会体社员二十多人，在我和廖光策的带领下，溜出校门，参加示威游行去了。

游行回来，喘息未定，军事教官就传讯我和廖光策。我们早知道，军事教官是国民党特务，是专门搞奴化教育和监视进步学生的勾当的。我们都抱着“不怕牺牲”的决心。走进训育处，看见满脸横肉的军事教官阴沉着脸，见我们来

了，他就暴跳如雷，眼里迸射出杀机，厉声问道：“是哪个把人带出去参加游行的？”“是我！”我们两人都抢着回答。“好呵，你们不怕死呀？”你们知不知道这是共产党干的事，你们懂不懂利害？看来，出什么特刊，到处张贴共产党的标语、传单，都是你们干的了！”我们以沉默来反抗。最后，他说：“你们回去写检讨，写交代，要交代出是哪个唆使你们干的！”我们默默地走了。出了“训育处”的门，廖光策低声说：“鬼才给你写检讨。”我说：“当然，我们没有错。”

放寒假后的第二天，或许是第三天，我得到学校的通知：“下期勿庸来校。”这是“默退”，即不挂牌的开除。后来知道不仅我和廖光策被开除了，星火文艺社的全体社员都被开除了。

这个“默退”的通知，我不敢拿出来给父母亲看，也不想同他们商量我该怎么办。十六岁的我陷于彷徨和苦闷之中了。“到处都是黑暗，到处都是法西斯教育，我到哪里去呢？”

正当我彷徨无主的时候，我突然看见了曙光——燭火社的好朋友张天义来了。

张天义是金陵大学学生，燭火社骨干，后来才知道他是地下党员。1948年，他在川北组织游击队，是游击队领导人之一；建国以后，改名张乐山，在川北和西南工作过一段时期，后来调到中央纺织工业部任建设局局长。

我把我的苦闷告诉了张天义。

张天义说：“不用愁，你有个最好的去处——重庆的育才学校。”接着，他向我介绍，这是蒋管区最好的学校，那里实行民主教育，那里有最好的老师，学的是革命的理论，

等等。

我焦急地问：“那我怎么去呢 要考试吗？”

他说：“我给你找人写一封介绍信 进校没有问题。”

他很快给我带来一封介绍信，是四川大学李相符教授写的。我知道李先生是民盟中央委员，却不知道他还是地下党员。

我高兴极了，在 1946年 2月，我就背着父母，偷偷地动身到重庆去了。

我顺利地考进了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社会组。在那里，学习了马列的理论和毛泽东思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95.11.18夜为纪念“一二·一”五十周年而作

育才，我的保姆

想起育才，我的心就不禁怦然跳动，那些金子一样闪光的日子，仿佛又在我眼前熠熠发光。可惜我在育才的时间太短了。但就在这短短的几个月中，她哺育了我，使我较快地成长起来。这是我人生的一个真正的起点。她使我懂得，人，究竟应该为什么而生活，什么样的生活才有意义。它把辉煌的革命真理展示给我，从此以后，我就有了一个正确的方向。

—

记得那是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国民党统治区反内战、争民主的学生运动正在兴起的时候。那时我十六岁，在成都参加了一个地下党领导的进步青年组织—— 燭火社。凭着一点对党的朦胧的认识和从进步文艺中吸取的一点营养，我满腔热诚地投身于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在积极声援“一二·一”西南联大事件和反内战的斗争中，我被甫澄中学开除了。这时，我对成都一般中学里的法西斯教育十分反感，不愿意转到任何一个中学去又不敢把我被开除的事告诉家里人，因此，我彷徨无主了。正在这时，燭火社的领导人之一、地下

党员张天义跑来安慰我，对我说：

“你不要着急 你知不知道重庆有一个最好的学校？”

“哪个学校？”我惊喜地问。

“育才学校 陶行知先生办的 那是一个民主堡垒。”接着他就给我介绍了学校的一些情况，我当时感到非常新奇。听到那里没有法西斯教育，学的是革命理论，我就十分向往了，可是我又担心人家不要我。我急切地问：

“要考吗 考些什么？”

“考是要考一下的，但最重要的是政治上可靠。这一点，我可以找人给你写封介绍信。”

很快他就把地下党员、民盟中委、四川大学教授李相符先生的介绍信拿来了。于是我就瞒着家庭，偷偷地跑到重庆。

1946年初春的山城，光明与黑暗、民主与独裁正作着殊死的搏斗。令人喘不过气来的政治浓雾正笼罩着山城。我找到了在重庆的一个亲戚，一个长辈，他是一位开明人士，一听说我是考育才的，便明白了我的思想倾向，立刻就介绍了一位他的自来水公司的同事高力生给我。高力生，社会学系学生，三十多岁，脸黑黑的，嘴边有浓黑的经过修整的胡须，很精干的样子。他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好！小朋友，社大和育才是姊妹学校，你来考育才，太好了！”

他带我在山城的马路上逛了一周，一路告诉我重庆的近闻：新近发生的较场口事件，郭沫若、李公朴先生被特务打伤了；反动派组织了反苏游行，新华日报营业部被捣毁了……我们漫步在民生路上，我看着新华日报营业部三层楼都打得破烂不堪了，心里不禁燃起了怒火……

高力生还带我到管家巷 28 号育才学校城内办事处，那时候陶先生不在，马侣贤副校长接见了我们。他看了我的介绍信，同意我参加入学考试。我本来准备考文学组，但马校长告诉我文学组不招生，只有社会组才招生。高力生又竭力怂恿我考社会组，告诉我学好马列主义的重要性，于是，我报名投考社会组了。

（写到这里，我要向高力生烈士的英灵敬致悼念之忱，解放前夕他被敌人杀害了）

在考试之前，高力生又告诉我，要考一点哲学。我很惶恐，因为我没有学过哲学，于是他又同我一道到三联书店去买了一本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我连夜赶着读，可是并没有读懂，只背得辩证法的三大定律。果然考试就考了三大定律。我只能把它背上去，却不能解释清楚。好在我还有一点社会科学的常识，十八道试题，大概我能答上大半。照规定：除考试之外，还要写“自传”。交上自传，我满怀信心地等待考试结果。

笔试算是过去了，我考得还不坏。然后，由社会组主任苏永扬先生主持口试。使我怪诧的是，苏先生对我的情况非常清楚，我在自传里没有写到的燭火社与另一个团体合作出刊物的情况，他也问到了。

很快我就得到了录取通知。我就要到全中国（实际上是国民党统治区）最好的学校念书去了。我是多么幸福！我开始懂得，苏先生主持的口试，正是革命组织对我的审查。育才革命的学校，不能让一个坏人混进来。因此，我更热爱我们的育才学校了。

二

我在办事处报名之后，就参加了正在城里的“育才寒假见习团”。

有一件小事在我的脑中印象非常深刻。那是我初到见习团的日子。有一天，社会组的廖意林老师和文学组的女同学陶月初正在一起谈话，我走拢去，廖老师问了我什么，我于是就滔滔不绝地叙述我入学的经过。我谈到陶校长不在，见到马校长，苏主任，怎么怎么，于是她俩就大笑起来，笑得前翻后仰，不可开交。我莫名其妙，脸一直红到脖子根，我想，我一定是说错了什么话了，可又不知道说错了什么。再三询问，才知道育才有一个规矩：年轻的教师都称呼大哥、大姐，年老的教师、校长都称呼先生，没有叫什么主任、校长的。我一面感到惭愧，觉得自己的“旧意识”太深了，一面也非常高兴：这里真是亲如一家啊！

在见习团的日子过得非常幸福！我们社会组和文学组的几十个同学住在上南区马路一幢高楼的楼上。没有床，到晚上，我们把各自的被盖卷打开在地板上睡觉；早上起床，就把它卷起来，靠墙壁一排放着。早上，我们在晒台上开朝会、唱歌。我们经常唱的是陶先生作词的《手脑并用歌》：“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会用，才是个开天辟地的大好佬！”唱着这支歌，沐浴着清晨的阳光，我感到精神焕发，信心十足。我想，陶先生的歌词，是多么生动、活泼的语言，而又包含着多么正确、丰富的思想呵！我更热爱陶先生

了，虽然这时我还没有看见陶先生——他正在为国家大事、也为我们学校操劳呢。

我们每天听讲演。老革命家、有名的学者、作家、教授轮流给我们讲。我知道他们来给我们讲演，是因为关怀我们学校，因为我们是“民主堡垒”，我们这些学生是革命的幼苗。我如饥似渴地贪婪地听着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尽可能把它笔记下来，铭刻在我的心上。记得有一次邓大姐来给我们讲话。我们全体同学都沸腾起来，邓大姐穿着朴素的粗呢子制服。她神采奕奕，兴致很高，和我们很随便地谈话。我还记得她讲到二万五千里长征，那时她正患肺病，很严重，要人抬着走，她心里很不安。她告诉我们，无论病多么重，环境多么艰险，她始终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这种精神终于战胜了病魔，她现在完全恢复健康了。听到这里，我们都笑了，为邓大姐的健康，我们十分高兴。邓大姐又同我们亲爱的意姐谈话，她是那么亲切，那么体贴入微，她也跟我们一样叫“意姐”——写到这里，我不禁热泪盈眶，就是这一位我们的意姐，我们育才学校的党支部书记，这一位被全国人民衷心爱戴的革命老前辈邓大姐称呼为意姐的同志，被“四人帮”迫害而死已经十一年了，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的意姐的……

有一次翦伯赞先生来见习团讲演，讲完之后和我们随便聊天。有一位小同学天真地问：“翦先生是什么党？”翦先生戴着一副眼镜，神情严肃，看了一眼这位同学说：“我是反法西斯党。”我感到这句话说得非常有力，表现了翦先生同国民党顽固派坚决斗争的坚定立场。我当然知道中国并没有一个反法西斯党，翦先生即使是共产党员，当时也不能明

说。翦先生这句话和他说话的神情深深地印入我的脑海。以后我读翦先生的著作《历史哲学》和《中国史纲》，那时的情景还常在我的脑际显现；特别是在“四人帮”横行、在报纸上大批翦伯赞这个“反动权威”时，我除对“四人帮”的反动谬论嗤之以鼻之外，也想到翦先生这句话。我永远不会相信，一个坚强的反法西斯的革命战士，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会突然变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

晚上，我们育才寒假见习团的同学又常常到我们的姊妹学校——社会大学去听课。有一次，我正在聚精会神地听着何其芳先生讲课，好像是听他讲他的《夜歌》，或者是讲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我忽然察觉到我背后站着一个人：中等身材，戴着眼镜，黑敦敦的，很结实的样子，也在专心听讲。我悄悄问旁边的同学，才知道这就是陶先生。我开始有些诧异，原来我想象中的陶行知先生是温文尔雅，有“学者”风度的，现在，站在我身旁的陶先生却没有那种“风度”。我在思索之后终于找到了答案：陶先生不是主张“手脑并用”吗？他怎么会是温文尔雅的样子呢？这正是陶先生之所以为陶先生！于是，我又一次发现了我的“旧意识”，我非常惭愧地感到，我的旧意识实在是太多了。

有时候，某个剧团有什么好节目演出，我们就集体去看戏。我们看戏是不花钱的。我心里想，这还是因为我们是“民主堡垒”的缘故，当时的重庆，虽然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中心，但文艺界却是进步势力占优势。所以，剧团常常免费欢迎我们看戏。

有时候，我们自己也开小型的晚会。同学们坐在自己的被盖卷上靠着墙壁，表演的同学就在中间跳起秧歌舞来。全

体同学都加入齐唱，有时还拍着手唱。我们喜欢跳《朱大嫂送鸡蛋》，唱《茶馆小调》、《古怪歌》等等，这些歌、舞，后来就渐渐流传到各地大中学校去了。

夜晚，隔岸扬子江畔灯火闪烁，沿江的上南区马路若明若暗，马路上一幢高楼上歌声嘹亮，它好像一股奔腾的激流，要冲破这笼罩山城的黑暗……

三

寒假见习团结束了。我们回到学校、回到红岩村来了。“红岩村”，这是多么美、多么富有诗意的名字！当我踏上红岩村的土地时，我看到岩石的颜色的确是红色的，土地也是红色的。我们美丽的学校就在这里！在半山腰上！山上，还有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即中共中央南方局），敬爱的周恩来副主席就在上面办公。山下，有新华日报的印刷部和编辑部。这里，真是我们的“红色区域”呵！土地是红色的，我们的心也是红的，我真想扑在地上，亲吻这可爱的大地，我真想倒在地上，扑在大地的怀抱里……

可是，那时候，幼稚的我竟一点也没有想到，这美丽的地方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心腹之患”，这山前山后，正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惊心动魄的斗争呵！

我编入社会组二班，我们这学期的课程有经济学（即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政治学（即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宪法概论、中共党史、青年问题等。每个星期，我们还要听新华日报总编辑熊复给我们作时事报告。

我们的同学都非常关心时事，平均二、三人就有一份新

华日报。报社的报童是我们的好朋友，他们每天早上一早就送报来，直接送到我们手里，还坐在我们的床上给我们讲述新闻。

我们的课外活动也是非常活跃的。我们经常组织晚会，有诗歌朗诵、诗剧、歌剧、舞蹈、音乐节目，丰富多彩。大型一点的晚会就在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礼堂上去开，同办事处的同志一起度过一个欢乐的夜晚。我和文学组、舞蹈组的同学一起，组织了一个“四八歌咏队”（由成立时是四十八人得名）。舞蹈组的小同学最多，他们亲热地叫我刘大哥，其实我也比他们大不了几岁。他们是多么聪明、可爱呵！有时候，我在晚会上看见他们自编自演的节目，真是感动极了。我不禁这样想：他们都是沦陷区的孩子，都是无父无母的孤儿，要是没有陶先生，没有育才学校，他们现在即使还活着也不知道成了什么可怜样儿，哪能有今天这样的欢乐！他们的聪明和创造才能，早就被埋没了。后来，当我唱起端木蕻良作词的《新儿童赞歌》时，我总是要想起他们——

人类的孤儿呀在荒野里长大

人类的孤儿呀受尽了风吹雨打

被丢弃了的孩子们

吃了野狼的奶长大……

是的，他们就是“吃了野狼的奶长大”的。我想，我也是个孤儿，虽然我有父母，可是他们同我不是一条心，但是，我现在也吃了“野狼的奶”，就要“长大”了。

我还参加了文学组同学组织的四月诗社。由于我在成都的报刊上投过稿，发表过一些非常幼稚的习作，同学们就选我当学生自治会的总文化干事。我曾经为编辑一个油印的学

生自治会的会刊，着实忙了一阵子。但我不会依靠同学们、发动同学们大家来办会刊，只是一个人埋头搞，结果搞的质量很差。没有稿子，我甚至把过去在中学写的感情不大健康的诗也拿来勉强凑数。后来我看见社会组出的壁报，质量比我编的会刊好，感到很惭愧。正在这时，红岩小学的教师同志向我开火了。

红岩小学同我们毗邻，也是我们的姊妹校。其中的教师同志当然比我成熟得多，他们发现会刊的缺点，写文章对会刊进行了批评。我感到恼火，不虚心检查自己，反而写文章还击。于是一来一往，打起笔战来了。后来还是我们敬爱的苏大哥把我找了去，很耐心地给了我教育，促使我猛省，我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才停止了笔战。

从那以后，我逐渐认识到，我的家庭出身给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我同许多同学在思想上的差距是很大的，于是，我开始比较严格地要求自己，而且认真地向老师、向同学们学习了。

那是多么难忘的日子呵。尽管当时我们的物质条件是比较差的，每个月三元钱的伙食费，常常是干豌豆做菜，但是全校师生同甘共苦，没有听到一点怨言。我们社会组的苏大哥、意姐都患着肺病，可他们从来没有说过他们有病，从来不要求有任何照顾。每当我看见苏大哥两颊深陷、颧骨突出，未老先衰的样子，特别是看见他上课之后气喘吁吁，心里就非常难受。苏大哥、意姐也同我们一样吃干豌豆下饭，吃三元钱一月的伙食，没有一点特殊，甚至年老的方与严先生，听说学校给他一点伙食补助，他都用来帮助困难的同学了。我们的同学大多数是难童，衣衫穿着都很破旧，但是个

个都是朝气蓬勃、精神焕发，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一个同学唉声叹气，更从来没有听说过吵架的声音。大家都是互相关心，互相帮助。老师从来没有呵斥过任何一个同学，没有一个同学不衷心敬爱我们的老师。这里是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和校外的一片黑暗，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简直是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

马克思主义理论、毛主席著作的学习，使我的激情逐渐升华为理性的思考，我的前面出现了越来越清晰的光明前景，我的心逐渐踏实起来了，我和老师、同学之间的关系就更加亲密了。

四月初，我们听说叶挺将军出狱了，大家都非常高兴，有些同学还去参加了欢迎会。可是，很快就传来了极其不幸的消息——我们的一批无产阶级老革命家，飞机失事，在黑茶山遇难。不是一个，而是好几个！叶挺、王若飞、博古、邓发……。这真是晴天霹雳！我们还有一位同学，音乐组的黄晓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教员，也同时殉难。大家心情沉重，说不出话来了……

郭沫若先生很快写了挽歌，由夏白老师谱曲。我们育才同学组成了挽歌队，坐上卡车，进城参加四八烈士追悼大会去了。

大会会场门口摆满了挽联、花圈，扎断了半条街。我们一进入会场，就感受到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主席台上点上了大蜡烛，并排放着十多位烈士的巨幅画像。我一眼瞥见主席台侧的一副挽联上面写着“李公朴敬挽”几个字，挽联上写的话已飞入我的眼帘：“你们的死，使我格外不怕死！”我想起刚到重庆不久，我就和几个同学一道去看望过被特务

打伤的李先生，那时他还用纱布裹着头，睡在床上。现在，我回过头看台上，他满脸大胡子，正巍然屹立在主席台上，显出凛不可犯的样子。我怀着深深的敬意向他注目。——但是我万万没有料到，就在三个月之后，李公朴先生在昆明竟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暗杀！

追悼会是民盟主席张澜先生主祭，李公朴先生司仪，郭沫若先生读祭文。我听着郭老朗诵他自己撰写的祭文时声音在发颤，热泪正在他的心里奔流，听着听着，我感到他哽咽起来了，我自己也早被泪水模糊了眼睛……

我们敬爱的周副主席出席讲话了。他脸色严峻，屹立在主席台前。要是在平时，我一定会跳着欢呼起来，可是在这样的场合，我只能呆呆地望着他。我只是不断地呆呆地想：他是多么难过呵！一下子牺牲了这么多老同志，这么多党的好干部，这么多中华民族的精英！我一面揣度着他的心情，一面努力在他的脸上寻找悲伤，可是，没有——他的脸上只有严峻，没有悲伤！呵，我明白了！伟大的周恩来同志，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是多么能够克制自己呀！在这样的场合，你不能过分悲伤！你是一座大山，你是擎天之柱，会场上成千双眼睛在看着你，全中国人民在看着你，敌人也在看着你呀（他们也在主席台上）！你不能有丝毫的软弱、丝毫的沮丧呀！

可是我听到了哭声，先是低低啜泣，后来渐渐扩大开来，哭声终于汇成了一片，我早已不能控制自己，只好低下头痛哭起来。一面哭，一面紧握拳头，我宣誓，我要继承烈士们的遗志，我一定要把自己锻炼成一个坚强的革命者，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

暑假来到了，我本来准备参加学校组织的工学团，到乡下去。可是，我拗不过我的亲爱的姐姐的劝说，终于同意回家过暑假。

不料，回到成都以后，国民党发动的反人民的内战，全面爆发；陶行知先生又猝然逝世，形势急转直下……我得到意姐的信，要我“就地转学”。从此，我离开了育才，离开了我的永远难忘的保姆的怀抱……

我流着泪撰写纪念陶行知先生的文章。我一面写着，一面想：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培育，不辜负老师、同学对我的期望……

文章发表在民盟机关报成都《华西晚报》上。

四

……三十年过去了。三十多年，这是多么漫长的岁月！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人民，经历了最大的欢乐，也经历了最大的苦难。现在，她终于从苦难的深渊中得救了，灿烂的阳光重新普照大地。

三十多年，我也经历了最大的欢乐和痛苦，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严峻考验，在坎坷的道路上走过来了。亲爱的育才，我的保姆呵，是你最初用革命的乳汁哺育了我，使我能够逐渐地学会走路。在党的领导下，我能够一步一步地走得更坚定、更沉着，在狂风暴雨之中没有跌倒。今天，雨过天晴，万物苏生，让我紧紧跟上育才老师、同学的步伐，在新长征的道路上努力前进吧！

彩霞燃烧在东方

——优桡杂忆之一

打开窗户，好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

听见小女儿的歌声，不禁产生一种联想：年轻的生命就像这阳光灿烂的早晨。忽然，一首诗的题目冲口而出——《彩霞燃烧在东方》。这是我十九岁的诗作。也是在这样的阳光灿烂的早晨，我心潮澎湃，写下了这一首激情的诗。

昨晚同几个华西协高的同学在一起，谈战争形势，谈学生运动，谈“四九血案”以后的工作，直到深夜。1948年4月9日，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镇压了学生运动，许多同学受伤，一百多个同学被关进监牢，成都的天空一时阴霾密布；但全市大中学罢课的斗争还在继续，地下党仍在潜在地领导着这一切。工作是艰苦的。国民党成都警备司令部突然在成都各报公布了各大学的“匪谍”名单，我作为华西大学的七个“匪谍”之一赫然出现在名单上。党指示我们：敌人是要孤立我们，暂时还不会逮捕，要坚守岗位，更紧密地同群众团结在一起。

不论工作多么艰苦，年轻的我，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我坚信，正如毛主席早已描绘过的那样，新中国像一轮喷薄欲出的红日，她的彩霞已经遍布东方。天气也常常影响人的

心情，1948年4月下旬的那个早晨，我的心里充满了阳光。但当我凭窗俯视，看着川流不息从我的窗下匆匆走过的同学时，忽然，一股焦躁和怅惘的情绪向我袭来。我砰然心动，写下一首诗的题目——

“彩霞燃烧在东方”。

一个充满活力的女孩子的形象的在我的意念中闪动。“为什么没有她 为什么看不见她呢？”于是 我写下了诗的第一段——

彩霞燃烧在东方

为什么看不见你，我的姑娘？

我大胆地写了“我的姑娘”。其实，这个姑娘还并不是“我的”。所谓“我的”不过是我的想象而已。接着 我的回忆、想象和激情融汇在一起 姑娘的“双垂的发辫”、“明亮的眼睛”、“激荡的呼喊”，仿佛就在我面前 我仿佛看见她在游行队伍里领头呼着口号大踏步在前进。我奋疾地书写，不需要思索，不需要推敲文字，我一口气写完了这一首诗。我在诗的接近结尾处写道：

彩霞燃烧在东方

为什么看不见我的姑娘？

为什么新生的不快些成长？

为什么不尽情地歌唱？

这里第一、二行虽然与诗的开头文字相同，但情绪却不同，特别是接连三个“为什么”的排比，节奏加快了，显然有一种焦躁的情绪。“新生的”什么，没有说，不能说，说不了。新生的政权、革命力量，怎么能明说呢；新生的爱情，也不好意思说。“新生的……”，也许还有别的什么，让

读者去想象吧。

我的姑娘

我在窗口守候着你呀

我在窗口伫望.....

我不讳言这是“革命加爱情”的诗。在革命中产生的爱情，即使不能实现，也是美丽的。

1990年 11月 10日 上午

远 航

——优栌杂忆之二

天朦朦亮，一阵紧促的敲门声把我惊醒。我立刻警觉起来：“莫非出问题了？”我悄悄打开房门，走到大门口，犹豫了一下，没有立刻开门。

“谁？”我轻轻问了一声。

“是我，老倪。”是熟悉的亲切的声音。

我打开门，老倪靠着自行车站在我面前。

“出事了！今早四点左右，特务出动了。我们宿舍抓了蓝敦敬。特务到处找你，问你在哪里，没有人回答。老胡叫赶快通知你，要你迅速撤离，到原来指定的地方去。”

“组织关系呢？”没时间多问，我只抓住这最重要的事。

“老胡没有说，来不及了。去了自然会有人来联系。”

我们俩彼此信任地对视了片刻，两只手紧握，然后，他骑上自行车，飞也似地在我的视野里消失。

我呆了一下。头脑中出现了特务的狰狞嘴脸，宿舍里的一片混乱。“我们宿舍是党的基地，党的领导人多数在那里，该不会……，蓝敦敬是群众，为什么抓他……”一连串的问题。不能想了，赶快冷静下来，准备走。

我轻轻叫醒了妈妈，告诉了她这件事。她不知道我是共

产党员，但是知道我在干正义的而又危险的事。她是开明的，慈爱的；我们开会时，她还为我们在大门口放过哨。

妈妈一时没了主意。只说：“把光良哥叫起来……”

光良哥是我的远房堂兄，党的同情者。

我很快收拾了一下东西：把必须毁掉的烧掉，把《资本论》和其他宝贵书籍锁进书箱，交托给光良哥。

淑萍（我叫她二妹）在为我缝补一件破旧的蓝布衫。她只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我明白她的心情。妈妈要她缝补这件衣服是要给我化一下装：我没有华贵的西装，只好装扮成农民。

我走了。头上包一块白布，身上穿一件褪色蓝布衫。脚上穿着草鞋，背一个蓝布包袱，悄悄地同妈妈告了别。二妹含着眼泪送我：

“三哥 你什么时候回来？”

“二妹 我会回来的 我会给你写信！”

我明明说了一句谎话，心里一阵内疚，一阵酸楚，但坚决地掉头走了。光良哥送我。

天渐渐亮了，危险程度在增加。光良哥和我绕小道走。

成都的天常常是灰蒙蒙的，阴沉着脸，仿佛蕴藏着杀机。这时大街小巷仍然很宁静，只有一两声“卖豆腐呵”的叫声打破了死一般的沉寂。我和光良哥都走得很快，没有交谈，也没有嘱咐，仿佛这时已不需要这些。行人渐渐多起来，我们绕开人群，走到江边，找到了小船。

“三弟，一路顺风 前途光明……”

“谢谢你 光良哥 多多保重！”我们扬扬手。船平稳地开了。

小船上除了艄翁，只有我一人，我忽然感到轻松，愉快起来，看着江岸两边青葱的树木、房屋静静地流过去。“告别了，成都！告别了，过去的日子，告别了，妈妈！告别了，我的战友们！告别了，二妹……”

庄严的入党宣誓，市委书记讲话的沉着、坚定的神态，汹涌澎湃的学生运动，呐喊、呼号、拼搏，警察宪兵的枪托和刺刀，战友的被捕，“四九血案”后援会，小屋里的党小组会，报纸上的“匪谍”名单……一幕一幕，又出现在我的脑际。我的战友呵，你们现在在哪里？谁又被捕了？能受得住考验吗？

二妹，你是多么单纯、纯洁、温柔可爱。你虽然不是我的亲妹妹，只不过是我的邻居，但多像我的亲妹妹。难忘那些安谧温馨的夜晚，我给你讲《实验高级英文法》、讲古文、讲鲁迅的情景。也许你爱我，从你的眼睛里我读到了这种感情；但你不了解我，你太单纯，你还是一个幼稚的高中生。我是个危险的人！我已经以身许党，随时准备赴汤蹈火，我不能爱你！我不能给你写信，不能告诉你我在哪里。请原谅我，二妹！为了亿万人民的幸福……

太阳终于冲破了云层，露出了笑脸。两岸的树木、青草沐浴在金色的阳光里。一切都好像有了生意。我走出船舱，迎着太阳，精神为之一振。生活是美好的，战斗的生活多美好！我想到我又踏上了新的战斗岗位，那里有新的战斗伙伴，也将有更加复杂、更加艰巨的战斗。

我满怀信心地眺望着远方……

也谈“四九血案”

读了《龙门阵》上沙勤生同志写的《四·九血案亲历记》，引发了我的回忆。我也是血案的亲历者，想作一些补充，个别地方还要根据我的记忆作一点修正。

先说说“四·九”游行的口号。我看过有些同志的回忆录，大约是因为四五十年以前的事，记忆不清了，又没有记载可查，他们写的游行的口号都不准确。沙勤生同志在文中写的是“反对饥饿，要平价米！”“停止内战，改善生活待遇！”后一个口号失实，前一个口号不是原话。

我是华大地下党员。游行前党组织传达的口号共有四句：“我们要饭吃！”“我们要平价米！”“赶快配发平价米！”“上了粮为啥没饭吃？”同时还严格要求游行时只能喊这几句，不准乱喊。当时我想，这些口号层次较低，只有“反饥饿”、没有“反内战”的内容，这是为了争取广大的中间群众；如果口号提高了，会吓走他们的。所以，我对党提出的口号心悦诚服。从当时成都的学运看，由于华西坝的金陵、燕京、齐鲁等几个大学都已复员迁走，随之也走了相当一批地下党员和学运骨干，华西坝只剩下一个华大，我们的力量大大减弱。虽然川大接收了一些金大等校的转学生，但可能也不多。在此情况下，党组织提出的口号是完全正确的。

陈善英是华大民协会员，大风诗社社长，很活跃，她大

约是当时被捕的唯一的女生。

“四·九”之前，上级领导有“放手开展群众运动”的指示，市委书记洪德铭以全国学联代表的头衔作掩护，分别给川大、华大的党员、民协会员作了几次专题报告。报告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提出了当前学运的任务和斗争策略。“四·九”前后还发展了一批党员和民协会员。这就为“四·九”的斗争作好了组织准备和思想准备。

“四·九”那天，游行队伍的组织是这样的：由于川大、华大是主力军，走在最前面的是川大男同学，最后是华大男同学，中间是川大和华大的女同学。这大约是为了保护女同学的缘故。除这两校外，还有成华和其他学校。游行人数总共有六千多人。每六人一排，手挽着手，沿途唱歌、呼口号。我看见洪德铭、彭塞（市委副书记）和华大支部书记胡庚炳都在队伍外边跟着走，实际上是在指挥战斗。

到了督院街，先头队伍在国民党省政府门前停下，听说代表们进去谈判去了。我们继续唱歌、呼口号。过了好一阵，代表们还没有出来，远远看见我们的队伍冲进去了。大家一阵欢呼，手挽着手，准备跟着冲进去。这时，忽见大批军警挥舞枪托、刺刀直冲队伍杀来，队伍开始溃散，但无路可走，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我被拥挤的人群挤到一家百货商店门口。商店本已关闭，忽然门开了一个缝，我同另外几个同学挤进去了，老板赶紧又把门关上。外面的军警在喊：“不准窝藏学生 把学生藏起来是脱不到手的！”老板向我们打手势，叫我们不要出声。我从门缝看了一下街，游行队伍已经不见了，街上到处都是踩掉了的鞋；警察、宪兵举着步枪到处巡逻，我还看见有人举着手枪。老板要我们到里面

去，里面有一个天井，站满了学生，大约有七八十人。

我们静静地等待着，天渐渐地黑了。大家商议：决定冲出去；如果有一人被捕，就全体跟他一起去坐牢。于是，我们有序地排队走出去。没有遇到军警，我们就解散了。在路上，我看见还有同学在茶馆里宣传、讲演。

川大四九血案后援会成立了。华大也成立了后援会，并出版了油印小报。血案发生第二天，王陵基发表书面谈话，诬蔑学生是暴徒，我立即写了一文《斥王陵基的书面谈话》在第一期的油印小报上刊出。成都各大中学在血案发生后陆续罢课。市委通过统战关系营救被捕的一百多个同学，并发动各校后援会广泛宣传，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援。

被捕的同学终于放出来了。我作为华大的代表之一，参加了川大四九血案后援会召开的慰问大会。有一位从监狱刚出来的同学发了言，后援会主席陈仲文作了慷慨激昂的讲演。大家齐唱《坐牢歌》：“坐牢算什么 放出来 还要干！”高呼口号：“打倒刽子手王陵基！”

不久，国民党成都警备司令部在成都各报同一天发表了《通告》，公布了各大学的“匪谍”名单，川大有二十多个，华大七个，此外还有成华的。要求有名在案的人到警备司令部去报到。我也在华大七人之中。党组织已事先获得信息，指示我坚守岗位，不为所动。列入名单的川大同学在报上联名发表了“抗议”。华大同学则以个人名义分别刊登了抗议。

这以后，党组织把已经暴露的党员和民协会会员分别输送到其他地方。八月，国民党特种刑事法庭开始大规模“传讯”和逮捕，我得到党的指示迅速转移了。

“而立之年”前后

(1957年8月—1962年4月)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耶稣

“而立之年”是人生的黄金时期，是一个人开始建功立业、创造辉煌的时期；但我的“而立之年”不是这样，我的“而立之年”是在屈辱和困境中度过，我的创造的潜能已被窒息。整个人都被颠倒了，哪里还谈得上建功立业，创造辉煌！

下面的叙述仅仅是粗条线的草图。但借此一斑，也可略窥当时的时代风云，人是在怎样的环境中受到锤炼。这里全是真人真事，只有省略，毫无夸张。立此存照，以鉴来者。

一、晴天霹雳

1957年8月，我二十八岁，任内江高中语文教研组组长。我所领导的语文教研组，刚刚受到省教育厅工作组的表扬，被誉为最符合省厅要求的全省语文教研组的旗帜；我写的总结文章，已刊登在省教厅编印的内部资料上；我被聘为

市高考文科主考，新近又参加了市里召开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座谈会；自我感觉心情舒畅，认为建功立业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开始了！既然是党发起的、党领导的，当然是必要的、正确的。我认真学习反右的文件，在会上积极发言。不料在一天上午快要散会时，小组会主持人江家骏，一位年轻的英语教师，预备党员，郑重地对我说：“你对你的党籍问题有什么意见，下午给大家说一说。”

我困惑了：“党内的问题在这个会上谈不合适吧？”他的要求使我感到很突然。

这位整风反右副组长斩钉截铁地说：“不，有必要！你准备一下吧。”

要谈就谈吧，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想。我是1948年2月在华西大学入党的地下党员，1952年6月在川南党校参加整党学习，被开除出党。以后我一直在申诉，要求重新审查，恢复党籍。就这样，在当天下午，我详细交代了我在地下工作时期的情况，说明即使在没有上级领导的情况下，我也在积极工作，没有违犯党的纪律，没有犯政治错误。我的发言占了整整一个下午。我看到与会的同志有的频频点头，有的似很感动，甚至散会后还有人对我说：“地下工作真不容易呀！”我谈完后，主持人没说什么就散会了。

谁知第二天学习会上风云突变，在主持人的号召下，开始了对我的猛烈进攻，说我在昨天的会上评功摆好，事实完全不是那样。有人慷慨激昂地说：刘光对党是抽象地肯定，具体地否定，质问我在这会上说了些什么。原来是因为我在政协会上作了《揭发内江高中领导的官僚主义》的大会发

言。“否定校长，就是否定党！”完全不容许我申辩，一阵吆喝，有人大声喊：“把右派份子刘光抓出来！”接着就是铺天盖地的一片“抓出来”的叫喊。我知道再说什么已经毫无意义了。

同其他地方的斗争一样：检查、批判；再检查，再批判……，不必赘述。我是语文教研组也是全校抓出来的第一个右派份子。以后又抓出来两个，都是语文教师。

二、在法庭上

1958年4月4日，接近中午了，学校突然召开全校教职工大会。副校长兼整风反右组长潘渊如庄严宣布：刘光是反革命，现在马上到人民法院接受审判。又一个晴天霹雳！我仿佛看见本来是晴朗的天空突然变黑了。这些日子，有人劝我忍耐，说党的政策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现在，一切的幻想都已破灭了。过去，我只有上国民党法庭的精神准备，却从来没有上共产党法庭的精神准备。我镇定了一下自己：最后的时刻到了，我必须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

校医黄老师是转业军人、共产党员，负责押送我上法庭，还好，没有捆绑。他沿途劝我想开些，怕我寻短见。我说：“你放心 我不会这样轻视自己的生命。”

黄医生把我送到就上街吃中饭去了。法庭上只有一个审判员，两个做点缀的陪审员，一个书记员，开庭以后才知道还有一个原告，是检察院检查员，再就是被告我。我环顾了一下四周，很遗憾，没有一个听众，也没有律师。

检察院的检查员对我提起公诉，主要罪状是我参加了国

民党特务组织，并于 1948 年 10 月以荣县教科长的身份，镇压学生运动，还与警察局长密谋，亲自带领便衣警察逮捕了五个学生。

这简直是无耻的诬陷！我头发都气得立起来了。但我镇定地驳斥了原告：我是 1948 年 8 月受地下党成都市委的派遣打进荣县国民党县政府做地下工作的。学运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是学运的领导者，我领导下有一批学运骨干。师范学校学生打了体育老师，是因为体育老师对女学生不规矩，不是什么学生运动。我当时是督学，只负责视察小学，管不了中等学校，我无权也没有过问这一事件。我是 1949 年 4 月才任教科长的，与原告所说的时间不符。说我逮捕了五个学生，为何不说出他们的姓名，为什么不出庭作证？他们都被我害死了吗？他们的亲戚也都被我害死了吗？说我参加了国民党特务组织，是军统还是中统，或者别的什么？有什么证据？

我发言后，原告没有任何话说。审判员似乎有些慌乱，他只好宣布休庭。10 分钟以后开庭，他宣读早已准备好的判决：定性为反革命，管制三年，劳动教养。二十多年后，我找到这位审判员王正言。他说：五人小组早就定案了，法院审判只不过是形式，我们有什么办法呢？

受审后我急忙返校，因为我早已是饥肠辘辘了。今天中午打牙祭，好心的炊事员知道我是受审去了，特意给我留了丰富的菜肴：一碗猪肝，一碗回锅肉，还有一碗黄豆芽肉汤。我狼吞虎咽地吃了个饱。然后按规定退还工作证、借书证、工会会员证。我已被开除公职，一切都没有了。学校规定我不准去看近在咫尺的妻子，她还在师范附小上课。我只

好回家去看我的岳母和只有四个月的女儿。我没有任何财产，只有一柜子书，我把它郑重地交给岳母，因为我住在学校的宿舍，必须搬家。时间紧迫，我要在下班以前赶到看守所报到。我抱起了我心爱的女儿，她哇哇直哭，哄也哄不住，我只好亲了亲女儿，把她交给了岳母，硬起心肠走了。

晚饭是在看守所吃的。同在一起的有许多右派和反革命份子。饭是包谷渗米饭，很硬，许多人都吃不下，我仍然吃了两碗。

三、辗转流徙

第二天一早，一辆一辆的汽车满载着我们这些劳教份子出发了，不知有多少人，也不知开到哪里去。汽车摇摇幌幌，我闭了眼睛沉思：这是怎么了？我对党忠心耿耿，为什么一定要把我推到敌人那边去？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真笑话，把我的骨头砸成粉末也找不出这些东西。为什么要颠倒我的历史陷害我？究竟是谁陷害了我呢？我记起了我在参加政协会议期间，听民盟市委领导人说，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不是说急风暴雨式的斗争已经过去了，今后是“毛毛雨下个不停”吗？这哪里是毛毛雨呢？对党籍问题提出申诉就是反党吗？记得我离开团地委，被调到内江一中教书，本来是一种惩罚，我还是处之泰然，因为我喜欢青年，喜欢教师的工作，参加革命本不是为了当官嘛！这几年教书育人，我是尽心尽力的。有一次参加人身保险，受益人我没填母亲和姐妹，填的是中共内江地委，可见我对党的感情啊！……呵，

不！我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我的思想深处一定有许多肮脏的东西，需要通过劳动来改造。那么，这次对我的惩罚还是对的。

我睁开了眼睛，发现了一个熟人：“王大永，你怎么也来了？”他原在荣县《农民报》当编辑，因为文章写得好，调到地委宣传部。王大永见了我，笑了一笑，那是苦笑。我们不能询问彼此的案情，这是违纪的。后来听人说，原来是地委的公厕里发现了“反标”，上写“××（地委领导人）又在王婆骂街了”，怀疑到他，于是被打成了右派。

车子经过成都、乐山、峨嵋，最终到达峨边沙坪农场，那是一个劳教农场。

我们住的是草草搭成的工棚，睡的是跟劳改犯一样的通铺。有战士通宵值班看守我们。上厕所要喊“报告，我要上厕所”经允许才能去。

我们的劳动是开荒。我从来没干过这样重的劳动，第一天下来，双手满是血泡，破了以后就流血。我咬紧牙关坚持着，我想手上有了茧就好了。

最恼火的事情是这儿的气候。正在劳动时，天下雨了，但管理人员不收工，等到大家衣服都湿透了，他吹口哨收工了。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回到工棚，换了干衣服，把湿衣服晾在床栏上，然后打开被盖，把脚伸进去，坐着休息。没想到一会儿雨停了，出工的哨子又响了。怎么办呢？穿上干衣服，一会又下雨怎么办？不得已只好把湿衣服又穿上。有些人没换成湿衣服，果然一会雨又来了，干衣服又成了湿衣服，收工后，没有干衣服换，湿衣服也无处晾。这样下去，怎么不得病呢？

我们的吃食是每顿两个包谷窝头，晚上吃包谷稀饭。没有人不吃包谷了，窝窝头吃得很香。有一天早上，小组长用洗脸盆装了一盆窝窝头，发给大家时却少了一个，小组长犯疑了。大家出工后，他偷偷地回来检查，发现有个人把窝窝头藏了一个在被窝里，于是当天晚上此人就成了批斗的对象。

阿弥陀佛！谢天谢地，在沙坪农场三个月后，我们搬家了。

第二个驿站是云南盐津县杉木滩。我们的工作修筑铁路。刚到那一天，早来的第六中队就发生了严重的安全事故。他们在河对岸的山头上打炮眼，山头突然崩裂，垮了一大片，一群劳教份子掉在河里，血染红了一条河。于是宣布停工学习。我们都很高兴，每天坐着开会，可以休养一段时间了。

开工以后，我争取干重活打炮眼，由于手劲太差，干了一天，工效很低。大组长老夏是个小学教师，连忙跑来跟我说：打炮眼你要上黑榜，还是去除碴或洗河沙吧。我很感激他的照顾，果然，我一段时间搞除碴，一段时间搞筛石头洗河沙，都上了红榜，还放过卫星。

修铁路的伙食比起农场的伙食好多了，每天吃的是大米饭，定量每人三十多斤，但还是不够。劳动不太剧烈时，大家在工地上边干边聊天，谈的内容都是吃。冠生园、努力餐，……过去享受得多的人谈得特别起劲，大家也听得津津有味，谓之“精神会餐”。

我们吃的饭是用洗脸盆蒸的，四人一盆，必须划成四份。大家协议：每天轮流划饭，然后排名次，谁第一个要

饭，谁第二第三，划饭的人最后拿饭。谁不会划，也可请人代劳。由于划饭的人最后拿饭，所以他在划饭时，总是用筷子左比右比，一直到比得完全准确，四份饭的量完全一样，或准确率达百分之九十九，否则划饭的人就要吃亏了。我想，如果把这划饭动作录像，现在来看，一定要笑破肚皮。

还有更滑稽的事：一般人认为，不够吃时总是要狼吞虎咽吧，不是这样。我常看见有人端着一份饭，左看看，右看看，好像在欣赏饭，其实是舍不得吃。

吃晚饭时，还有这样的事：炊事员手执饭瓢，一人一大瓢。很多人都怕碗小了装不下撒了可惜，都去买大碗，我也去买了一个彝族同胞的木碗，口径很大，倾饭时万无一失。有时稀饭还剩一些，炊事员叫声“哪个还要？”大家一涌而上。这时管教干事就来了，他从后面抓住一个人的衣领往外拽，然后再拉第二个，口里骂着“饿坏了吗？穷吃饿吃的！排队排队！”有时，我想，我如有个儿子，长大了不叫他干别的，就当炊事员好了。这时大家都羡慕炊事员。

尽管我们停工学习了一个月的安全规则，施工时还是经常违犯。为了抢时间、抢工效，经常重叠施工。上面在撬石头，下面在除渣。一块大石头撬动了，要滚下来了，只听上面喊一声“来了！”下面的人赶快让开。有一次我就差点碰上滚下的石头。还有一次，我背着一箱炸药从隧道口经过，隧道口堆满了笔陡的碎石，很难走，正走在隧道口，里面滚出来一块大石头，从我的身边擦过，我吓出了一身冷汗。要是再偏几十公分，我就会被石头打到崖下去了。有一次我看见工地上抬了一个人回来，头和嘴、脸都是血，原来是荣县中学校长刘介澄。他在掌钎子的时候，被打二锤的一锤打在

脸上，牙齿打落了几颗。

我们后来又转移到第三个驿站喜德，工作还是修筑铁路。那里的气候很差。幸而不久我们又转移到最后一个驿站会东铅锌矿，在那里度过了早已遗忘的“而立之年”生日，过了一段相对稳定的生活，即“暂时做稳了奴隶”（鲁迅语）。

四、会东冶炼

刚从法院受审回来时，我还有个想法：不过是管制三年吧，三年回来，我肯定要保证我的专业不落后，我还在幻想回到教师岗位。后来才听说，劳教是没有期限的，心里凉了半截。我们这些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中国知识份子似乎都有一种原罪意识，即认为自己生下来就是有罪的。当然这种观念解放前是没有的，那时，大学生中难得有工农子弟，自己也就不觉得矮人一等。解放后工农干部多了，这种原罪意识就产生了，因而不免自卑。这种自卑感此时到起了一种积极作用：认罪服管，不思反叛，虽然每到一处，都看到有人自杀，有人逃走又被抓回来，自己却从来没有轻生和逃跑的念头，只一心想着好好改造，重新做人。

到会东后，强劳动力被抽去搞重劳动去了，我属于弱劳，安排在副业组搞蔬菜。我的任务是每天挑粪浇菜，这还是能胜任的。只不过手劲差，别人使用那把手较长的粪瓢舀粪，握着把手的尽头处，手距离粪瓢较远，不会把手弄得很脏。我的手劲差，没那个力气，只得把手握在距粪瓢很近的地方，弯着身子费力地舀。这样，不但我满手沾满了粪，而

且常常让粪溅在衣服上甚至溅到脸上，弄得一身臭味。完成任务要紧，我当然顾不得这些了。

由于生活安定，按时作息，每十天还有一天休息，除了洗衣、补衣外，可以读书报了。于是我和杜辉打伙订了一份《光明日报》，还写信央求姐姐给我订了一份《人民文学》、一份《红旗》杂志。杜辉是县供销社的科长，进军干部，为人温文尔雅，和我相处甚好。他很幸运，由于祖传中医，家里又寄了些医书来，供他学习，他终于成了矿区的医生。

矿区的卧室是上下铺，我睡的是上铺。灭灯以后，只有一盏光线很弱的灯。有一天晚上我起来上厕所，用手去抓牵在床头两侧晾毛巾的绳子，失手跌倒下来。背和臀部疼痛得不能行走了，休息了十多天。稍稍好一点，能做一点轻微的工作了，小组长叫我带一条小板凳去匀苗。我每天就坐在菜地旁把变黄的、蔫的苗子拔去。过了几天，收工集合时，队长讲话了，他说：“刘光态度很不端正，叫他干轻微劳动匀苗，他还要坐凳子，简直不像话！”又过了几天，我的疼痛减轻了些，我开始尝试着挑半挑粪了。队长又批评：“你看他挑粪，挑那么一点，不挑满，偷奸耍滑。”后来我痊愈了，挑满挑了，队长又表扬我：“刘光有转变了，挑满挑了，”令我哭笑不得。

1961年9月，我的管制期已经满了五个月，好消息终于来了。矿部开会宣布第一批撤销管制、解除劳教的名单。我听到了我的名字，兴奋得心里直跳：我自由了！我终于自由了！我哪里晓得，事情还并不是那么简单。

我们这伙自以为获得了解放的人，到十里外的乡场去玩去了。

从此，我脱离了劳教队，参加了职工队，从矿区搬到大凉子山上劳动；但并未说何时放我们回家。

管教干事对我的态度不同了，我甚至还开始写一点小文章练笔，他还鼓励我寄出去发表。我的来往信件不再有人检查，我以为我已经同一般的公民没什么区别了。

不知什么时候又刮起了“跃进风”，职工队的队长在我们正在修筑土墙房子的工作中布置了夜战任务。不惜在子夜时候给我们加一顿餐。可惜我的肚子不争气，吃糯米饭消化不了，连续肚泻不止，反而误了两天工。

有一天晚上，我挑着一担土给春墙的同志送土。（过去我们相互叫同学，现在恢复同志的称谓了）。这时土墙已筑到第四层，我走进春墙处，看见已有七八担土挨次摆着，我完全可以把挑的土摆在后面，这样我就可以很轻松地往回走了。也是我一番好意，想把这一担土送得更近些，使春墙的人不必站起来，顺手就可以提土，于是我跨过七八担土往前走。由于光线很暗，看不清楚，我的脚被一个土箕的耳朵绊住了，一下子我从墙上掉了下来。

我觉得我的左臂一阵酸痛，头也晕眩起来。我被送到卫生员那里。这位卫生员很年轻，也不知他受过专业培训没有，他用酒精给我擦痛处，然后，就叫我休息。

第二天我的左臂开始发肿，第三天第四天肿得更厉害了。我找到队长，要求到矿区医务室治疗。经过允许，我下了山。矿区的医生叫我让两只手垂直，要我看一看镜子，原来左臂比右臂更长了。医生说，这是脱臼，及时复位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已经晚了。于是立即派车把我送到矿部医院。

矿部医院距矿区大约十几里。到了矿部医院，经过检

查，确实是脱臼。本该由骨科医生治疗，但医院只有一个骨科医生，他到成都去了，于是只有由外科医生来代劳。两位外科医生，一个把我压住不许动弹，一个来给我复位，我忍住剧烈的疼痛，折腾了好一阵，说是好了，用我的围巾把左臂吊在我胸前，嘱咐我不能活动。过了几天，我觉得不对，似乎接好的骨头又脱开了，于是医生又给我再来一次复位，我再经历一次剧烈的疼痛。如此者反复了三次或四次。我对复位完全丧失信心了。

我除了骨头脱臼以外，内部并没有病，但吃的却是病号伙食：每日两餐，每餐一碗稀饭，两个小馒头。我每天饿得发慌。先是向医生请求吃普通伙食，不允许；后又向院长反映，还是不允许。理由是：住院的都是病号，都只能吃一样的病号伙食。我无可奈何。幸好我有个熟人唐子英，他原是内江师范学校的美术教师，现也在此劳教，生病住院，他是内病，吃不下饭，每顿饭偷偷地给我一个小馒头，使我感恩不尽。本来还有一位我的教研组的教师张笃周，他当过伪满的小职员，在反右后期“补课”时被揪出来，打成右派兼反革命，也在此住院，但我不好去向人家乞讨，他也未必像唐子英那样吃不下去。

在成都开会的骨科医生终于回来了。他给我做了一次检查，说复位已经没有希望。他说：“如果再给你扯脱、复位，你太痛苦了，只好就这样了。”这意味着我的一支手已经报废了，无可挽回了。

既然治疗无望，每天又吃不饱饭，我不如早点回去。医院也同意我出院了。

汽车把我载到矿区，正碰见开晚餐。我在医院每天吃两

顿，下午就把一天的伙食吃完了。这时，好心的炊事员问我：“没吃晚饭吧？”我说没有。他连忙舀了一大瓢稀饭给我，还问我够不够，说是中午还剩得有干饭和菜。我于是又吃了一大碗干饭。这下该饱了吧。吃完了，游游缓缓地上了山。不料路过炊事房时，一位炊事员瞥见我，又关切地说：“晚饭开过了，不过还有饭菜，快来吃吧。”我居然毫不推辞，又吃了一顿晚餐。就这样，我连续吃了三顿饭，加上在医院吃的两顿，一共吃了五顿。我真奇怪我的肚子为什么这么大，而且吃了之后并没有拉稀，完全消化了。

我每天仍用围巾吊着一支手，不能够挑粪了，把我派到副业二组当组长。名为副业二组，实际都是正在养病的病号。我只是生活上关照一下他们就算尽职了。矿区成立了文工队，我的主要工作在文工队。我唱歌还可以，也还可以写点歌词什么的。文工队有个作曲家李杰，是原简阳县文化馆的干部，矿区领导给他特殊优待，叫他脱产搞创作，还免费供应叶子烟。我们这儿人才可多哪，笔杆子还有原四川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汤远烈和当过《四川文学》编辑的卿秋、铁路文工团的导演等。我独唱时，有小提琴、二胡、琵琶、笛子、三弦等伴奏，我平生没有享受过这样的殊荣。由李杰作曲，我和卿秋等作词，我们创作了一部《矿区大联唱》，由十多个歌曲组成，气势不小。我执笔写的《抢救水泥》，是描写修铁路时在一次暴雨中抢救水泥的动人场面的长篇朗诵诗，也由集体朗诵演出。由于有了这样一支队伍，矿区领导要求我们每半月开一次晚会。1962年春节，我们还在附近厂矿巡回演出，受到热情接待，又吃了些好饭菜，十分欢畅。唯一的缺点是没有女演员。歌曲《好了伤疤别忘痛》是

兄妹联唱，我当哥，谁当妹呢？只好找一个带点女孩子气的小伙子来代替。也还好，居然让矿区领导列为“保留节目”，多次演出。

这时我觉得似乎远离灾难了，可是我的一支手还吊着，我不甘心让它残废，同时也想家，不知何时能够回家。凑巧有一天听说矿长大驾光临矿区，我急忙跑去找矿长，说我的手臂工伤致残，请求回家医治。他很爽快地答应了。

五、坟场巡礼

不管是什么地方，住久了都难免有依依之情。特别是这里有一些我新结识的难友，如杜辉、卿秋等，不知何年何月才能重聚，也许这一生再没有那样的机会了。

告别了，会东！告别了，铅锌矿！告别了我的患难中的朋友！我在颠簸的汽车中默默地呼唤。汽车开到了矿部医院，这个我曾经生活过一个多月的地方。车停了，有人下去办什么事，我忽然想起我的同事张笃周。他患的是肺结核，不知现在怎样了，我打听到汽车还要停一阵，就急忙下去探望他。

到了内科病房，找不到张笃周。一位病员告诉我：“他已经在这里分了土地了。”“分了什么土地？”我一时懵了。“死了呗！就埋在后面坟地里。”我一下惊呆了。

我绕过医院的后墙，出了后门，面前出现了一大片坟场。只见一个一个很矮的土堆，高不及脚颈。一排一排地排列着，每一个土堆前面插了一块薄薄的木片，上面写着死者的姓名。我挨次去找“张笃周”三个字。一排，又一排，又

一排，都没有。环顾左右，这样的土堆简直是漫山遍野。于是我慢慢地走，一个一个地寻找，走了一圈又一圈，找了一层又一层，没有，还是没有。我流泪了。一阵凄怆之感扑上我的心头。张笃周，大约要比我大二十岁，他只有中学学历，在旧社会颠沛流离，家乡沦陷后为生活所迫，当过伪满的小职员，解放后凭自己的奋斗当上了教师。同我共事三年，工作勤勤恳恳；能写教研文章，文笔简洁流畅。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谨言慎行，与人无争的人，却不料落得这般下场。

1963年4月，即离家整整四年，我终于回到了内江。在以后的日子里，继续接受严酷的考验，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整个人才逐步地颠倒过来，得以平反昭雪，恢复党籍。那时已是“知天命”之年了。

1996.12.11写完

至情至文

我的祖父刘隆岳，字方岳，二十多岁时以拔进士进京，官至吏部侍郎。据说我出生不久祖父即去世，我没有见过祖父，只是从父亲和四姑母那里知道一鳞半爪有关他的事情：祖父是书法家，曾手书对联一副，作为家训：“到底存些真面目，好生挺着穷骨头”。这是给我的人生启蒙第一课，教我怎样做人。还有一首回文诗：“潇潇木落晚风秋，瘦影灯寒月上楼，萧管一声生谱曲，焦窗绿涌碧云流。”顺读逆读都是诗，虽是文字游戏，却使我很钦佩祖父的才华。

但是深深打动我的心却是另一段文字。记得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不久，正在日本留学的五叔仓促回国，带回一幅祖父写给他的单条。后来父亲把这幅单条郑重地交给了我，要我悬挂在书房内，经常诵读。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我默诵这段文字时，我不仅像初读时一样的感动，而且有了更深的体验，以为是一段至情至文。原文如下：

己巳（经查，是1929年）初秋，崎儿嵘儿将由成转渝，出外游学。或路逾数千里，或远越重洋，不惜金钱，并离骨肉。捫心清夜，当如何鼓励前进，发愤自雄。但以年少识浅，阅历尤疏，少不

自慎，不唯不能上达，且将混入下流。此余所以惶惶焉，尤为深忧者也。故特书此幅，俾常携带，凡行踪所在，随悬壁间，早起晚睡，诵读一周，如对白头人耳提面命者。然总期无负此行，庶亦无负乃父乃兄厚望尔兄弟与远虑尔兄弟之苦心耳。

后面写了十几条戒律，只记得第一条是“勿犯淫”，以后的全忘了。现在想来，当时只看重前面的“前言”，后面的戒律根本没有在意。这段文字，激发着我的想象，我仿佛看见我的祖父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又仿佛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黯淡的灯光下书写着，书写着……窗外传来更夫断断续续的击梆声。我深深地感受到祖父送子远行的那种复杂、矛盾的感情。这是人世间的至情至文，不知四叔五叔有此感受否。但四叔过早辞世，五叔回国时祖父也早已不在人间。那么，祖父的谆谆告诫就成了他的最终遗言了。今凭记忆写下祖父这段文字，可使天下儿女感受父辈的殷切期望与厚爱，庶亦勿负其厚望与远虑之苦心云耳。

父亲教我读书

年少时，有一件事，使我对父亲产生了反感，至今记忆犹新：我家有几箱父亲收藏的名家书画，每到夏天，父亲都要取出来翻晒。有一次，我见父亲在摊开排列的书画中流连忘返，仿佛陶醉于其中的样子，甚感诧异。父亲偶然抬头，看见了我的傻相，叹了一口气，又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愤愤地说：“俗不可耐，周身无一根雅骨！”他虽然骂得文雅，却使我感到十分委屈，我气冲冲地走开，嘴里嘟哝着：“你什么时候教过我，我怎么欣赏得来这些书画？”

父亲是民国初年北京农业大学毕业生。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份子不论是学工学农、学文学理，恐怕没有一个不曾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何况我的家在家乡号称“书香门第”？但是父亲忙于他的事，从来没有教我读书，更不用说欣赏艺术了。我只在陪他闲聊中知道荆轲刺秦王“图穷而匕首见”，刘邦在项羽面前耍无赖以及朱熹注《四书》、清代国学大师廖季平批评朱熹注错了等趣事。我十一、二岁的时候，父亲给我买了一部金圣叹评点的《三国志演义》；他知道我读了《聊斋志异》，又给了我一部同类题材的《阅微草堂笔记》，要我看了之后说出哪一部更好；还曾经要我同他比赛，看谁默读更快。所有这些，我当时都毫不在意，现在

想起来，他正是在教我读书哩！

特别要感谢父亲的，是他在我念初中之前，要我在家里读了一年古书。他为我请来了一位教师张先生。他教我古文，还教《孟子》，配合前后《出师表》，又教了《三国志·诸葛亮传》等。他特别重视朗读，在他那声调铿锵、抑扬顿挫的吟诵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古文之美。他为什么不教《论语》而教《孟子》，恐怕是因为《孟子》的论辩文章汪洋恣肆，有一种宏大的气势，更具有有一种撼人的力量吧。《孟子》中的“舍身而取义”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人道主义精神使我终身难忘，这大约也是老师的苦心孤诣的所在吧。

可惜张先生教我的时候仅两月就中断了，从此再也没见到他。但他培养了我对古文的浓厚兴趣和初步的阅读能力，以后的大半年，就是随兴之所之囫圇吞枣的自学了。

父亲给我讲的《史记》的故事激发了我自学《史记》的强烈愿望，《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等使我爱不释手。我还写了一篇历史小说《垓下之战》，英雄崇拜渗透了我年幼的心灵。为了了解作者司马迁，我又自学了《报任安书》，我反复吟诵，以至潸然泪下。

父亲给我讲的廖季平的故事，使我懂得了“尽信书不如无书”；金圣叹对《三国演义》的评点，启发了我独立思考。于是，我在继续自学《孟子》时，参看了几种不同的注释，加以比较，并将自己未必正确的结论记上笔记本。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幼年时的学习情景仿佛还历历在目。至今想来，父亲和张先生都是我的好教师。教师的职责不在于一字一句不厌其详的讲解，而在于启发、诱导和潜移

默化的熏陶。一年的古书学习，我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若干精华，不仅大大提高了我的阅读能力，更初步明辨了是非善恶，培养了我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怀，影响我的一生。

1996.1.13作

1996.11.16修改

我的初恋

期终考试结束，姐要我回家，我想参加学校组织的社会活动，一天傍晚，吃完了晚饭，我闷闷地来到了教室。

教室里静悄悄的，只有一个女孩在前排坐着。我一看，是李端仪。

好长一段时间我没有注意这个女孩。她皮肤较黑，长相一般，唱歌跳舞也不是很出色的。有一次她病了，同班的男生一同到宿舍去看她。出来时我走在最后，她用眼色把我留住，示意要我伸手给她。她悄悄地给了我一颗糖，很妩媚地看了我一眼。我没说什么，但体会到她对我特别的好。这时，她见我来了，高兴得跳起来。

“喂，你来了！”她跑过来抓住我的手。

她让我把一只手伸开由她握着，用另一只手拍打我的手心，一面念着一首儿歌：“点脚班班，脚踏南山……”

我的忧愁和苦闷一扫而空，发觉她是一个活泼可爱、稚气十足的女孩。我开始喜欢她了。忽然，她丢开我的手，跃上课桌，在桌上跳起旋转舞来。

我连忙拍掌，称赞她跳得好。她一下又跳下来了，坐在我的面前。她的脸对着我的脸，眼睛微笑着，盯着我问：

“我可爱不可爱？”

“可爱。”我活像一个被老师拷问的小学生。

“好！”她说。然后低下头，在书包里找出一张很小的、只有 5 分大的照片。她埋头认真地在照片背后写着：

给

光 愿永远照耀着苦难的人民

然后，递给我，说“送给你。”

我说：“太小了，看都看不清，怎不送张大的？”

她无奈地说：“没有呀！”她像哄小孩一样，拍了一下我的肩头：“以后一定送你一张大的。”

我忽然觉得，她像一个吉卜赛女郎，具有一种野性，这种野性就是一种美，一种性格美，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自在的性格，想爱就爱，毫不掩饰，决不羞羞答答，扭捏作态。我想起普希金的《茨冈》。我感到这种性格美比什么都美。我简直爱上她了。

“走！”她忽然站起来，拉起我的手，说：“我带你出去玩！”

教学楼后面是一座山。这时，太阳已经落坡，暮色逐渐降临。她牵着我走上山去。这儿我从没来过。山上有许多大树，没有来往行人，显得十分幽静。我想，这确实是谈情说爱的好地方。再看她，她的身材丰满而窈窕，不算很长的长发披在肩上，更显得风流潇洒。她找到一个地方，叫我先坐下，然后她紧靠我坐下。很快，她的身子向我倾斜，我连忙搂住了她，把她紧紧抱住。

她的眼睛闭上了。我感到她的胸脯在一上一下地起伏，

呼吸也急促起来。我身上的热血一下汹涌起来，我俯下身子，嘴唇贴在她的嘴唇上，我的全身都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舒展和快乐。

夏天的衣着是单薄的，她的丰满的肉体紧贴着我，使我心跳不已。我的手轻轻地触到了她的胸部，但很快又退缩转来。我忽然有些胆怯，不敢越雷池一步。

我忘记了当时我喃喃地向她说了些什么，也忘了她说了什么，只记得我们连续的、不断的、长长的接吻。这都是一切！这就是我享受到的幸福。我想，这已经足够了。

远远听见敲梆的声音。慢慢的，声音愈来愈近，一个敲梆的更夫逐渐走近了我们。端仪一跃而起，说：“不早了，我们回去吧。”

更夫敲的梆，大约是三更，已经是子时前后了。这时我才觉得，我搂着端仪的右臂有些酸痛，原来我已经抱了她三、四个小时。

我从神秘的幽会中回来，感到甜蜜和满足，庆幸我有了一个可爱的小恋人。我在这种甜蜜的疲倦中鼾然入睡，睡得很香。第二天起得较晚，起床后就去找我的小恋人。宿舍里没有人，我急忙又跑到教室、食堂和活动场地，到处都找不到她的踪影。我逢人就问：“看见李端仪没有？”也不怕引起别人的怀疑。我爱她，她也爱我，怕谁呢？直到我听见——

“李端仪和王熙在田间小路散步。”我目瞪口呆了。

我忘记我早就听说过，李端仪和王熙相好。这个王熙，是学生自治会干部，比我大好几岁，广西人，比我长得帅。完了，原来如此……

从早上到晚上，我都处于失魂落魄的状态，我的初恋刚

刚开始就宣告结束，最短的恋情也不会这样短吧——仅仅只有几小时。

回家后，我收到一封简短的信——

光：

我奸污了你纯洁的爱情，请原谅我。

我已同王熙启程返广西，我们结婚了。

在解放的那一天，我们还会再见的。确信那一天一定要来临！

端 仪

1946.7.20

（摘自尚未完稿的长篇回忆录）

孩子的名字

我家三个孩子的名字都是我取的。大女儿原取名小兰，源于她妈妈的名字奉兰。我当“反革命”的时候，一段时间她跟着妈妈姓，叫谢小兰。1962年我“劳教”归来，她的姓也还原为爸爸的姓，我给她另取了一个很满意的名字叫“树蕙”。此名源出于《离骚》：“余既滋兰之九苑兮，又树蕙之百亩。”“树蕙”，即栽种香草之意。我热爱教育，渴望女儿继承父业，“树蕙”喻培养人才；此义推而广之，也可喻为为人民做好事。我喜欢这个名字还因为它不易与人雷同，虽然与“淑慧”谐音，也有误会的可能。老二是男孩，我起名夕秀。源出于陆机《文赋》：“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夕秀”即迟开的花朵。我常感叹自己早熟，反遭挫折，盼望孩子不要步我后尘。“大智若愚”，装出“愚”的样子，毕竟是假的，我崇尚真诚，不喜虚假，故为我所不取。迟开的花朵，成熟得晚一些，少遭人忌，也许少些灾难，也有“大器晚成”之意。取此名是历尽沧桑、饱含人生体验的结果。可是我将这两个名字写信告知大姐时，大姐却责备我不该在古书中去找名字。当时政治挂帅，政治第一，我不能用今天的观点去评说大姐的不是，我也确实为这两个孩子另取了名：“永红”和“建农”。“永红”确实太俗，终未能用，

大女儿“树蕙”的名字得以保留，而小名“小兰”也不废。“夕秀”之名，反对的人不少，说是女孩子的名字；小时候大家叫他“秀秀”，邻居的刘么娘谐音叫他“臭臭”，再发展为“屁臭”，太难听了，我终于把他改成了“建农”。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这下政治挂了帅，孩子的大姨该满意了。小女生于1968年文革时期，取名“文兵”是“文化战士”之意，极易与“文彬”混淆，落入俗套和雷同，也易误解成“文革时期的战士”，但户口簿写上，不易更改了。

建农自小憨厚老实，做事有始有终，喜欢劳动，乐于助人，十多岁就能帮学校的炊事员刘大爷挑水。他还能爬树。有一次，我和他妈看到他爬上一棵树的顶端，我们没有为他的安全大惊小怪，却称赞了他的勇敢和灵巧。不知在什么时候他学会了游泳，使我们惊喜；以后又学会骑自行车是当然的了。当我在离城二、三十里的沙滩上搭上帐棚，从事沙石生产劳动时，他才十一、二岁，自愿来与我作伴，同我一起住在帐棚里，每天过河帮我买菜，烧火做饭，有时还参加筛石的劳动。他在妈妈所在的高坡小学念完小学念初中，文革结束后，我设法把他转到了城里的十三中。那时我还在劳动谋生，早出晚归，建农同我一起住在桂湖街那间潮湿、狭小的屋子里，帮我做饭。空时就在家里温习功课，从不外出，也不与别人打交道。这样倒好，免去了受人的蔑视和欺侮，还因此获得邻居的好感。在我到师范校教书后，他就到学校住宿了。

小女文兵也转学到师范学校附小读书。我到师范后，和我同住一屋。她睡一张小床。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她床上挂的是漏洞百出的破蚊帐，她用许多花花绿绿的纸贴在

破漏处，倒也是一个奇特的景观。我想，我不怕人家嘲笑，刘老师就是个穷教师嘛！好在没有人来参观这一景观。学生们来，也故意不注意它，我想他们的心里一定是酸溜溜的吧。

有一天，小兵放学后没有回来。我等她一直到天黑，心里的恐惧与时俱增。她的妈妈不在这里，我这个爸爸承担了全部的责任。她才十来岁，她到哪里去了呢？是遇到坏人了吗？天哪！我急步跑到附小找她，没有人；又跑到附近的一中，到处是静悄悄、黑洞洞的。我害怕极了，大声呼唤她的名字。这时，才在一间亮着的屋里走出了一位教师。她说：“刘文兵跟着几个老师到一队看电影去了。”我心中悬着的一块石头才落下来，跑到一个院坝里找到了她。我把她拉了回来，叫她爬在床上，打她的屁股。这是我第一次打她，也是最后一次打她，她是我最心疼的么女儿呵！我一面打一面掉眼泪。“你还乱跑不乱跑？还乱不乱跑？”不了！不了！”么女儿一面哭，一面求饶，我再也打不下去了。

（摘自尚未完成的长篇回忆录）

小 石 头

春节一天天地逼近了，我的小石头将又要回到他的外公身边。一年一度的春节，本来已经引不起我的太大的兴趣，我的许多春节都是在孤独中度过的，那时已经锻炼了一颗抵抗寂寞的坚硬的心。可是自从前年我的女儿把小石头带到了我的身边，我的坚硬的心融化了，我有了充盈的、无限的快乐。我一下子回到了青年——不，童年时代了。

但是，半年以后，小石头被带走了，我是含着眼泪和他告别的。我不能太自私，我不能独占他的爱。从此，我只能在回忆中看到他的天真的笑脸，在梦境中追寻他的笑声了。

只有春节，小石头才会跟着他的爸爸、妈妈出现在我的面前。所以，我就像小孩子一样巴望着春节了。

记得小石头初到我的身边时，他还只有两岁。据说刚刚生过病，脸颊瘦削，皮肤黑黄，有些胆怯。他怕汽车，老远看见汽车他就躲起来，特别怕汽车叫，于是就喊：“外翁（公）外翁（公）！”一下扑在我的怀里。他有些字吐字还不清楚，但正因为说不清楚，我却觉得更显得稚气、可爱。过春节时，放鞭炮，他就吓得蒙住耳朵，躲在他妈妈身边，我女儿轻轻拍着他：“石石，不怕不怕”，好半天他才恢复正常。他说话还不会用人称代词，分不清“我”、“你”、“他”

三种人称,比如,他要吃糖果,他就说:“石石要扑扑星。”(他把一切糖果都叫做扑扑星,这是他爸爸教的)他老是说:“石石要什么”“石石怎么样”却不会说“我要什么。”可是,石石有绝顶的聪明,在很短的时间里,大约就是几天吧,他认识了一盒积木的几十个字,这是小保姆教的。小保姆叫罗显秀。一年以后罗显秀早已离开他了,他还常常念着罗显秀的名字。石石看着大人写字,他也要写字。小保姆教他写,他很快学会了阿拉伯字母,只有一个“8”字写不好。他妈妈把他交给外公外婆,春节以后就走了。他并不每天吵着要妈妈,他不哭,只是常常给我说:“外翁外翁,石石要妈妈。”这是因为有一次我把照片簿给他看,他指着这是妈妈,这是爸爸,这是外公、外婆、姨姨,乃至只见过一面的舅舅,他也记得。“石石要妈妈”,我就立刻把影集给他,他一个人要细看老半天。妈妈走了,他只好恋外公、恋外婆。我每天要伏案工作,他要缠着我,要我抱他。我说:“石石乖,外公要工作。”小石石却说:“抱一会,抱一会,”我心里一酸,小石头离开了妈妈,需要爱抚啊!我把他抱在我的膝上。可是他一上桌就要我的笔,说:“石石要写字。”于是我只得拿一些纸给他写。一会儿,他又说:“石石要画妈妈”“石石要画爸爸”他画的妈妈、爸爸都是一个样子。他画了,还要外公画。就这样,缠了半天,我才把他抱下来,让他一个人站在椅子旁边画。他恋外婆,常常缠着外婆不要去上班。他说:“外婆,别去上班,外婆上班了,坏蛋要咬石石的。”引得我们哈哈大笑。他不知从哪里来的“坏蛋”这个概念。他又怕“虫虫”,常常在墙壁上发现一个小黑点,说“虫虫!虫虫!”要我去打它。我抽烟的时候,他

要给我划火柴，点烟，点燃之后，他非常高兴，看看还有余火，就说：“烧虫虫！烧虫虫！”于是我就假装把火柴棍往墙角一扔，说：“烧虫虫！烧虫虫！”他就哈哈大笑。（现在，回忆起来，我是不应该在他面前抽烟的，这是天大的罪过。）

小石石还拿着圆珠笔在墙壁上乱画，我的小客厅的几堵墙上到处有他的作品。我的小女儿说：“把墙壁划坏了。”我说：“不。等若干年以后，等石石长大了，看看他小时候的作品，这是很有意思的。这是很好的纪念品”。因为我想到了，小石石的妈妈，我的大女儿，在他这个年龄，就在我的《瞿秋白文集》的封面和扉页上划了很多作品，现在将近三十年，已经成为我的珍品了。

小石头在半年之内渐渐恢复了健康，脸色红润起来，个儿也长高了。胆子也渐渐大起来，因此也就更加活泼、更加可爱了。

我特别爱听他的声音，爱听他说话和他的笑声。他虽然个别字音还不很清楚，但是满口的普通话，发音非常好听，我认为这是音乐。早上，我间或听见隔壁他的哭声，我也感到像听音乐似的，并不厌烦。这是天籁呵，充满了纯真、洋溢着生命的跃动的美的音乐。他说的话也是充盈着可爱的单纯的情感。他每天吃饭时要叫我：“外翁，吃饭罗！”一面敲我的卧室门。我有时埋头工作，没有理他。他又叫：“外翁，吃饭罗！饭凉罗！”我再不应，他又换一个叫法：“刘老师，吃饭罗！”引得我暗暗发笑。然后，他用脚踢门，声音更大了，直呼我的名字：“刘光，吃饭罗！”我只好放下笔，开门，一下把他抱起来亲他。

他不但喜欢画画，还喜欢唱歌。他常常一个人站在院子

里花台上尽情地唱：“我在路上捡到一分钱，把它送到警察叔叔手里边”“啦啦啦 啦啦啦 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他会唱许多歌，因为，外婆教他唱，外公教他唱，姨姨也教他唱。有一次，我的小女儿教他唱一个青年歌曲，比较复杂，我说不行，但小石头居然学会了，能唱了。

小石头玩玩具，非常认真。他把小汽车、小飞机……都当作他的朋友。他说：小汽车病了，要打针。于是我就给他两根火柴，他用火柴去打针。有时候，他说：布娃娃睡觉了。他就不去玩布娃娃，让她睡觉。

等到小石头第二次来到我身边，他同我刚刚分别了半年。那就是去年春节的前夕。

我永远忘不了那见面时他的第一句话和他那个可爱的憨态。他还是个刚满三岁的孩子呵，他说的话却像个大人。而这句貌似大人的话出自于天真的孩子的口，又是出于直觉，出于真情，毫无矫饰。那时我站在火车站出口处，焦急地等他们——石头和他的爸爸、妈妈。我看着年老的、年轻的、男的、女的、结伴的、单独的、一个一个的陌生的面孔走过了。忽然，我看见了小石头，他的爸爸把他几乎是举着，所以我首先看见他，然后才看见女儿，女婿。他们正拥挤着，人太多，我们还没有说话。小石头看见我的招手了，他在笑着，刚刚靠拢我就轻轻地说：“外公傻笑”。这一句话真把我逗乐了。我的女儿、女婿都笑起来。我无法想象我自己见了小石头时笑的样子，也许真是傻笑，因为我太兴奋、太激动了。但是一个三岁的孩子说出这样的话真使我吃惊。这简直仿佛他是大人，我是孩子似的。但如果他真是大人，他就要考虑长幼之别，辈份之别，他就要讲究礼貌，不会那

么说了。所以这句貌似大人的话还是孩子的天真的声音。但这又似乎是一个过早的走向成熟的孩子的声音。

这一次的小石头比半年前大不相同了。他似乎成熟了许多，并且开始表现出男孩子的特征。他大概经常看电视，他爸爸告诉我，他无师自通地说“我是亨特！”“我是亨特，我是男子汉！”（他已经能够运用人称代词，并且懂得‘我’‘你’‘他’的分别了。）我什么也不怕！”女儿故意逗他说：“你不怕，我怕。”你猜他怎么着？他说：“你不怕，我保护你，我保护妈妈。”于是惹得他妈妈抱住他狂吻，这样的孩子怎么不逗人爱呢？他果然已经开始执行保护他妈妈的神圣的义务了。有时候，他爸爸逗他，故意说：“我要打妈妈。”他立刻不示弱：“你敢？我要打你。”他说着就去打爸爸。他的妈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现在，他不怕汽车了。春节放鞭炮的时候，他不但不用手蒙住耳朵，而且，他还要用手捏着礼花，让舅舅给他点燃，他要让礼花的火在他自己的手中燃烧了。多么勇敢的孩子呵。

他的勇敢还表现在骑车上。半年以前，他的脚还够不上车的脚踏，我扶着车子推他走，他也有些害怕。现在，他已经能娴熟地驾驭他的三轮车了。他骑着车威风凛凛，跑得飞快，活像一个小英雄。

他喜欢看电视里的广告节目。这本来是最不喜欢看的。小女儿告诉我，现在广告节目艺术化了，多样化了，所以孩子喜欢。我想，这是真的。好的广告节目可以培养儿童对艺术的爱好。我很希望电视节目多多考虑儿童的需要。看来，小石头在接受电视教育中开阔眼界，也更活泼了。有时候，他伏在风琴上，摹仿“新闻联播”的节目。到最后，还

要说“谢谢收看”。

春节是短暂的，不久，他又随着他的爸爸、妈妈回西安去了。我已经一年没有见到我的可爱的小石头了。我女儿来信告诉我，小石头常常说，他有两个家。一个在西安，一个在内江。当他听见飞机响的时候，他还说，“外公外婆来接我了。”女儿还把他的新作品寄给了我：他已经上了幼儿园，阿拉伯字写得很好，“8”字早就会写了。他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已能自己料理了。可他还不到四岁呢。这几天，我老在想，小石头，现在是个什么样子呢？我一方面希望他长大，一方面又希望着他不要长大，这真是矛盾。因为，我害怕，伴随着“成熟”而来的常常是“童心”的失落、幻想的消失。我害怕那种种“务实”的心污染一个纯洁可爱的灵魂。我的小石头呵，我希望你永远不要失去一颗童心。

1989.12.10星期日

挤 车 记

自从我 1993年初当上了一个民办学校的校长到现在，我已经有了五年的挤车史。

我原来所在的单位某学院本来有交通车，一大早要开进城去接人，下午又开车送人回家。我的家就在学院，是可以利用这车为我所用的。但是车开得太早，我习惯晚睡，起床后还要做饮食，来不及赶这趟早车。那么，下午该可以用了，当然可以，但我们这部校车往往不准时，甚至有时候站了许久，望眼欲穿，也不见它姗姗来迟。于是只好去坐马直达——这个名称我只在本城听到，正式名称叫“小公共汽车”，雅称为“小巴”或“小巴士”。说起“小巴士”之名，我大约是八十年代初期第一次知道的，那是参加一次在厦门召开的全国性学术会议。会议给我的通知是：在下了火车（或飞机）后乘“小巴士”到某某街某某招待所。我当时不知小巴士为何物，还请教了见多识广的朋友；到了厦门，才第一次坐上了“小巴士”。

我们的“马直达”和“小巴士”相比，形状、大小都差不离，新旧之别美丑之差却一望而知；厦门的“小巴士”整洁美观，而我们的“马直达”灰暗破旧；“小巴士”窗明几净，“马直达”多是缺几扇窗子，座椅也多破损。现在已是

冬天，有一天我在“马直达”里听见一位中年人说：“你这里没有窗子，风灌进来，把我吹感冒了怎么说？”我想，我这个老头儿当然更受不了哪！所以，如有可能，我总是避开没有玻璃窗户的窗口。厦门的小巴士里除现成的座椅外，如座位坐满了，还有人来，可以放下收好的座椅，增加几个座位，总之，车里的乘客都有座位，没有站着的，所以没有“挤车”之虑；而“马直达”则没有这个设备，小车除去驾驶员和售票员的座位外，只有 15 个座位。我们这条东桐路虽是郊区，来去乘客却蛮多，座位坐满了，狭窄的过道上也站满了人，外面的人却照挤不误地拼命挤进来，结果往往装了三十人以上，即超载一倍，压得你气都喘不过来。没有一个人想到安全不安全。驾驶员和售票员不管装不装得下，只要有乘客招手，他就停车欢迎，弄得全车人“怨声载道”。售票员高声喊：“往里挤一点，里面还有空”，其实前后的过道早已挤得水泄不通，连脚都没处放了。

今天下午我从我那个民办学校走到这个街口，伫立在寒风里，眼睛紧盯着从桥上驶来的每一辆车。五点二十分了，还有十分钟，按正常时间，校车应在 5 时 30 分从这里经过。可是又过了 5 分，还没有来；又过了 10 分，还是没有来。刺骨的寒风夹着雨点不断地扑面而来。我有点焦燥了。我倒不是怕感冒，我虽然已经年近古稀，但身子骨却还硬朗，前几天下着小雨，我还同我的小学生们去公园看菊展，我想让孩子们得到锻炼，我自己也得精神抖擞，作出表率。我今天穿得很厚，不怕感冒，但如果学院的交通车不来了，我不是白等了？坐交通车有座位，当然比坐“马直达”舒服，但时已至此，我不能再等，于是，当一辆“马直达”开到面前，

我也就同青年们竞赛，看谁先挤上车。

我终于挤上车了，我一只手提着文件包，一只手赶快抓住那一条横着的扶手。这时我的背后和左右都挤紧了人。不只是挤满，而是挤紧，好像人的身体是有弹性似的。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空隙，脚与脚之间没有任何距离，真可以说是“团结如一人”了，人与人之间亲密到了极点。我的两只脚也只能是脚靠脚，这就无法保持平衡态，容易歪倒，背后面不时给我施加压力，我真怕站不住了。我忽而想起在夏天类似的情景，那可更吃不消，汗流浹背的人群，挤在一起，会强迫你的鼻子去接受那酸臭的气息，如果你身边是一位女士，那长发就在你的脸上撩来撩去，撩得你心烦。现在是冬天，没那份罪，倒是幸福，天气冷挤在一起还可以避寒呢。想到这里，我有些宽慰了。不料一位女士尖声叫起来：“哎哟！你踩了我的脚！”另一个说：“我的脚没处放呀！”无处放好像只好放在别人的脚上。

车子在坎坷不平的小路上一跳一跳地前进。走到三岔路口，停了车，下来了几个人，车里松了一点，我刚让两支脚拉开一点距离，以保持身体的平衡，忽然又挤了几个人上车，一支脚立刻占据了我两脚间的空隙，我刚刚获得的一点自由立刻丧失了。我只好站稳脚根，一支手死死地抓住扶手。

车忽然停下来。“怎么了？”一位乘客问，没有回答。该不会是前面发生了车祸吧？前几天我乘坐校车就发生过前面两车相撞，请交警来处理，于是停止通行，一辆又一辆的车子愈排愈长。交警久久不来，校车上的人纷纷下车走路，我懒得下车，就一直等到天快黑了。这东桐路如此狭窄，好些

地方都容不下两辆车并排进退，难免发生车祸。还好，驾驶员发话了：“你是怎么的？”对方是一辆出租车，回话比问话强硬：“你为什么不离开一点？”你没看这路这么滑吗？”的确，驾驶员如果再离出租车一点，就有滚下崖的危险。好在双方都让了步，后退几公尺，车终于通过了。

今天的遭遇并不奇特，可以说是咱们挤车人经常遇到、司空见惯的事。这时我想起一位堂兄弟给我写的信：“你是离休干部，处处受优待，与我们不同。”我回信告诉他：“我每天上班下班与多数人一样挤车，并没有小轿车让我随叫随到，我同一般大众没什么区别。”不过，我转而想，我如果真的出门就是小轿车，那么我怎么能体验到大多数人的挤车之苦呢？有了这一种人生体验，才是人生之福，我才不是“人上人”而是“人中人”，这正是我的老师陶行知先生所期望于我们的。

1997.11.28晚

附言：此文写成后不到一年，东桐路已经变成一条宽阔、平坦的大路，车辆也多起来，美观、舒适、宽敞的中巴代替了破旧的“马直达”，挤车之苦已不复存在。保存此文，意在保存一种人生体验；抚今思昔，别有一番感受。

1998.11.14

深沉的思念

老 驥 之 歌

——记老作家萧蔓若

读完萧蔓若的近作《不是梦——优枋反刍之一》（《创作》文学季刊一九八三年第一期），赞叹和敬仰之情油然而生。这位从三十年代起一直活跃在中国进步文坛上，写过大量作品的老作家，如今以七十五岁高龄之身，向人民、向社会继续奉献着精神食粮，怎不令人敬佩！最近，我有机会见到了他。萧老热情洋溢，谈笑风生，说：“晚年逢盛世，我要做的事真多，真想一天当两天用啊！”

萧蔓若出生于四川璧山县一个穷苦农民之家，十五岁毕业于初级师范，做过乡村小学教师、店员、学徒，参加进步群众运动，醉心革命文学。一九三六年，他在上海左翼作家联盟刊物《夜莺》上发表短篇小说《江校长》，从此，便用笔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先后在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和《抗战文艺》、《文艺生活》、《青年文艺》等刊物上发表了小说，出版了长篇小说《解冻》。这些作品的共同点，是同人民、同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有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反封建民主精神。他的著名短篇小说《牺牲精神》和《老刘的文章》，鞭辟入里地揭露了国民党官僚的丑恶嘴脸，塑造了“否定的典型”，受到了茅盾、楼适夷等同志的

高度赞扬。建国以后，作家去西南师范学院担任中文系系主任，以后又到四川师范学院任外国文学教授。一九五七年以后，萧蔓若经受了种种折磨和考验，在落实政策之后，他虽过古稀之年，仍立刻走上讲台，主讲“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并且重新拿起笔，继续为人民写作。

在老作家的工作室里，我们看到满屋书籍，有抗战至建国以来的文学刊物，有新出版的各种文学杂志。他说：现在虽放暑假，但仍要抓紧工作。除周末进城回一次家外，每天，他都把时间用在阅读和写作上。近两年来，萧老除写了短篇小说《不是梦》之外，还发表了小说《李玉》，散文《佛光掠影》、《邛崃行》以及回忆郭沫若、茅盾的文章。但萧老对这样的成绩很不满足，他告诉我，他要写的东西很多，常常是正写着这篇，又有了写另一篇的冲动。现在正写一个中篇，力争早些完成。另外，打算今年把短篇小说的自选集编好，写好序。重庆出版社正编辑出版“作家与重庆”丛书，也约他写一篇，这个任务也要在最近完成。以后还准备选编一本散文、杂文、特写的集子。萧老说：“我更有兴趣于写现实题材。我的这个中篇就是写现实题材的。我觉得，隔得越近，写起来越有劲头。”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萧老的近作《不是梦》的副标题里已经以老骥自许，他正在唱着他的老骥之歌。我们祝愿这歌唱得嘹亮、出色、辉煌……

1983.8.21《成都晚报》

“爱满天下”的陶行知

今年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诞辰一百周年。全国范围的“知陶、学陶、师陶”活动早已广泛展开。为什么要开展“知陶、学陶、师陶”活动呢？因为许多人还不了解陶行知；因为陶行知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是从中国国情出发的，是既适合中国国情、又符合世界现代教育发展趋势的一种新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陶行知的革命献身精神和伟大人格，足以成为“万世师表”，值得我们永远崇敬和学习。

这里，我只从一个侧面介绍“爱满天下”的陶行知。

陶行知是安徽省歙县人。他于1914年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后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回国以后，担任南京高等学校的教授、教务长。1927年，他放弃大学教授的高薪和优裕生活，历尽千辛万苦，在南京郊外创办了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这是为什么？他有一段话说得很清楚，他说：“晓庄是从爱里产生出来的。没有爱就没有晓庄。因为他爱人类，所以他爱人类中最多数而不幸之中华民族；因为爱中华民族，所以爱中华民族中多数而最不幸之农人。他爱农人只是从农人出发，从大多数最不幸的出发，他的目光，没有一刻不注意到中华民族和人类的全体。”这一段话很可以说明陶先生那种广博、真挚、深厚、伟大的爱，正是这种爱使他能够“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

草去”。无私无畏，把一切奉献给教育事业和为争取祖国独立、民主、富强的斗争。

陶行知“爱满天下”，更集中地体现于他对学生的爱。他爱学生胜于爱自己，真正做到了“爱孩如命，爱才如命”。他办育才学校时物价飞涨，天天要和米价赛跑。有人好心地劝他“不必背着石头过河”。他乐观而坚定地回答：“不，我是背着爱人在游泳呢！越背越带劲！”他主张教师和学生“相师相学”，进一步还要向学生请教。学生反驳他、批评他的话，他听了不但不生气反而很高兴，虚心吸取学生的合理意见。例如，他写的一首诗，一个小学生给他改了一个字，他称赞改得好，并且照着改了。他喜欢同小朋友通信。他得到小朋友的信常常高兴得不得了，即刻写信回答小朋友提出的问题。他对所有的学生一视同仁，不歧视任何一个学生。他全面关心学生的成长。育才音乐组学生陈贻鑫进校时头上有癞疮，他亲自找医生治疗。找到了好医生，他兴奋地给他的夫人写信，说陈贻鑫不久就会满头黑发了。陈贻鑫过早地谈恋爱，影响了学习，他十分忧虑，耐心地开导、劝告。这些都从他的《全集》的书信中可以看到。他写诗批评有些教师对学生的简单粗暴，他说：“你这糊涂的先生！你的学堂成了害人坑！你的墨水笔下有冤魂！……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陶行知办的每一个学校都是爱的学校。正是这种爱的教育，哺育了他的每一个学生，使他们成长为坚定的革命者和建国后各行各业的人才。“陶门弟子”成了一种光荣的称号。

写给一个故友的亡灵

12月8日下午，我来看你，不想你就这样去了。其愚，你就真的这样去了吗？

你去得那样突然，那样早！你本不该这个时候去的。你正当英年，你雄心勃勃，正是大有可为的时候，你竟离我先去。你为什么先我们而去？老马、老叶、艾荪、老冯和我，都比你年长，不想你竟先我们而走了！其愚，我们呼唤你！你的老战友在呼唤你！在为你心痛！为你心碎！

其愚，你太累了，你身兼数职，可没有一个职务你不是克尽职守。作为一个兼职文联主席，你硬是作了专职的工作。《新时期文学作品选》，你是主编。我先以为，这是挂名，你没有时间，我们也不要你作具体的工作，可是你却一篇一篇地读，一篇一篇地认真审稿，把四十万字的书稿看完，还提出取舍的意见。你说：“只有诗歌我没有细看，因为我不懂新诗。”你是那么坦率，并不“强不知以为知”。其实，你是在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提高自己。你学历不高，为了参加革命，你中途辍学，我记得你仅在川大附中念了高中一年级。解放后，你由一个乡村小学教师调到中学任教，后来又调到《沱江报》，不是靠了勤奋自学吗？到你担任市委宣传部长和文联主席时，讲话不用讲稿，语言准确流畅，

谈文艺问题也没有一句外行话。你胸怀宽广，豁达大度，为人排忧解难，处处顾全大局。几年的往事，历历如在目前。有时，遇着一件恼人的事，我沉不住气，而你却心平气和，处之泰然。几年之中，我为你的修养和处事态度所折服，你也在潜移默化之中感染了我，教育了我。

其愚，我知道你是不甘心就此去了的。7月24日，你在成都住院，我来看你，你说还要参加第二次文代会，你还有许多打算和计划，你对战胜疾病还满怀信心。可是，令人痛恨的病魔终于夺走了你的生命，你再也不能参加文代会，我们再也听不见你的工作报告了。

其愚，你安心地去吧，你已经尽到了最大的努力，在你会见马克思时你可以毫无愧色了。愿你的灵魂安息。

1990.12.10

松柏不抱风霜怨

——亡友杨天相逝世七周年祭

今年的教师节，过得有些冷清，我在家里独坐，不禁怀念起亡友杨天相来。这个才华横溢、一身傲骨、一世坎坷、默默地无私地献身于教育事业的人，长眠于地下已经七年了。翻开相册，看天相灵堂的照片，正中挂着他的遗像，我知道这是他的学生为他的七十寿辰而画的：身穿一件旧呢子上装，头戴一顶旧呢帽，眉头微蹙，眼光里似含有一丝忧虑。他的学生送这幅画像到他家时，适逢我在那里。我说：这幅画画得好，不在他的形似而在神似，这是一幅典型的中国老一代知识份子的画像。不只是服装，重要的在于他的眉毛和眼睛：这里不仅蕴含着他一生的坎坷，更透露着中国知识份子忧国忧民的爱国之情。是啊，天相一生，薄于名利，与人无争，唯独倾全力于自己的教学工作，却迭遭顿挫，一直到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以重见天日。正是“多才早露头，乏缘晚见天。”（注一）他的亲友学生，能不为之凄然伤怀么？

我在五十年代初期由机关调学校，当上一名中学语文教师。就在这个时候，我结识了天相。那时他已是二中颇有些名气的教师了。他对人热诚，博学多才而又虚怀若谷：他特

别有一套高明的课堂艺术，能在语文教学中引人入胜，因而深受学生的敬爱。他长我十岁，却从不在我面前摆老资格，从不夸夸其谈，炫耀自己。他自谦文学理论修养不足，常同我讨论文学理论问题。以后就发展到几个“同好”星期天的定时聚会。

使我困惑的是：像天相这样的好教师却累累遭到某某上级领导的大会点名批评。私下问天相，才知道解放前他在新疆盛世才的手下当过小职员，曾经编写过成人识字读本之类的事。这在那时就成了有历史问题的人。于是，每次运动他都成了“运动员”。若干年后，他曾对我说了个笑话。他说：自解放以来，我们填过许多“干部登记表”，表上照例有一栏“有何特长”，我没有特长，照例不填。现在我想，我还是有特长的，以后我要填了，我的特长是“善于写检讨”。我俩都笑了，虽然笑里包含着无限的辛酸。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他的幽默才能，也可看出他有宽阔的胸怀。

由于“臭味”相投，在反右运动中我们都是“在劫难逃”。我们都被发配到不同的地方监督劳动。几年之后，我们重聚，庆幸还都是幸存者。但天相的一只腿因伤致残，成了瘸子。天相重新上了讲台，又同我研究起作文教学来。并且把他的教改实践成果给我看。打倒“四人帮”以后，我和他同获解放。可惜不久天相就到了退休年龄，他不得不留恋地退下讲台。

我在落实政策后调到一个高校。几年以后，另一个高校欢迎我去，我打了申请调动的报告。党委书记想留住我，他知道天相是我的好友，就要天相劝说我不要走。但不久，书记改变了主意，对天相说：“不要再留他了，让他走吧，他

的脾气太怪。”天相问他：“这个人教学如何？”回答：“教学是好的。”又问：“科研怎么样？”答：“科研也不错。”于是天相正容说：“这个人教学、科研都不错，你说他脾气怪，那你这个党委书记是干什么的？”书记哑然了。后来他确实费了好大的力把我留住了。这件事过去了很久，天相才告诉我。我虽然有点怪天相不该留我，但我却真佩服他的直爽和气魄。

天相有一位学生胡德培，已成长为一位知名的文学评论家。他念念不忘老师的培养和引导，曾专程从北京来看望他敬爱的老师，把他的著作赠给老师。胡的新著出版还特请天相题辞。为此，天相很是高兴，同我谈及此事时又十分感慨于同是学生，对他的态度却迥然不同。有人当了官，就目中无师了。天相常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祖国的蒸蒸日上而欣慰，表示自己还应该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他仍然每天读书，从不间断，并写作小说、杂文和电视剧。胡德培曾把他的中篇小说《饿莩》推荐给某杂志。这个杂志的编辑把“饿莩”读成“饿孚”，说这篇小说阴暗的东西太多，给枪毙了。

我现在还珍藏着天相写给我的几封信。重读这些信，更使我深深感受到他的正直、无私和诚挚。他不只关心我，还关心我的女儿。1989年3月，即他逝世前半年，他在给我的信中，还特别写了一副对联赠送给我的小女儿——

花繁柳密处，拨得开，方显手段；
风骤雨急时，立得定，始见脚根。

这其实正是他人生经验的总结。他正是能够在风骤雨急

时立定脚跟，接受考验，始终坚持忠于人民、忠于人民的教育事业的立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正是：

松柏不抱风霜怨

桃李常思雨露恩（注二）

1990.9.15初稿

1996.9.15改

（注一）（注二）均是天相友人吴伯涵所作挽联。

含辛茹苦为人民

——忆人民公仆程觉远二三事

1948年4月9日成都大中学生反饥饿的游行请愿遭到镇压后，国民党成都警备司令部在成都各报公布了各大学“匪谍”名单，地下党员和民协会员相当一部份已经暴露，我也被列入名单之内。其时党组织已把我的组织关系调出学校，命我利用父亲的老关系搞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七、八月份，国民党特种刑事法庭开始公开传讯和秘密逮捕。形势严峻，大批同志奉命转移。正在这时，国民党省政府的高级顾问、地下民革负责人张斯可推荐我父亲刘桂崇任荣县县长。地下党成都市委决定，派我打入国民党荣县县政府工作。

我到荣县后，由于党组织没有给我转组织关系，找不到党，心中十分苦闷。这时碰见了华大同学、民协同志徐玉良（当时不知道她是党员），她的家在荣县，向我介绍了一些情况，特别告诉我国民党县党部是进步力量控制的，哪几个人是民盟成员。

我当上了县督学。除学期开学后下乡走一趟以外，空闲时间很多，有利于开展社交活动，进行力所能及的学运和统战工作。渐渐地，我同《荣县新闻》的几个人混熟了。他们是刘石夷，经理；郝世培，编辑；官辑熙，记者。都是民盟

的重要骨干，刘石夷是民盟负责人。特别是郝世培，成了我的莫逆之交。我从郝世培那里，进一步了解了荣县的政治情况和国民党特务活动的一些情况。《荣县新闻》是国民党县党部的机关报，而其实是地下党通过民盟直接领导的报纸，。

当然，从表面上看，荣县是一潭死水，一片平静；实际上，地火正在运行，地下党和地下盟正在积极活动，并且同荣县的反动势力、特务份子进行着巧妙的战斗。

可是我感到寂寞。失去了党组织的联系，得不到党的指示。一直到 1949 年 4 月，我估量和郝世培相互间已有了深刻的了解，便向他提出：“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我们不能老是空谈，要有实际行动，要有个组织。”郝世培会意地笑了，说：“明天我给你介绍一个人，他是老农民协会的。”

第二天，我怀着热烈的期望去同一位富于革命斗争经验的老同志见面。地点在国民党县党部的办公室。郝世培和程觉远已经先到。程觉远满头蓬松的灰白头发，穿一件褪色的灰布长衫，一副饱经风霜的面容，看上去至少有 60 岁（后来知道才 49 岁）。他大概已经很了解我，没有客套，没有相互的自我介绍，谈话不多就进入了主题。他直接提出组织新民主主义促进会的事。我谈了我在学运和县政府内统战工作的情况，我父亲的政治观点和政治态度：他相信共产党会胜利，国民党会垮台，他决不会损害革命者，可以争取他起义。程觉远笑了，说：“你干得很好。继续这样干下去。我们联系不方便，你可多同老郝联系，他会告诉我。我有什么意见也由他转达。”后来才知道，程觉远表面是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员，暗地是地下党县委副书记兼民盟的组织部部长。

大约就在 4 月，我被任命为县教育科科长。此后同程觉远约会过两次。关于 1949 年下半年小学校长的人事安排，是由程觉远、郝世培和我研究决定的。我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是在地下县委领导下进行的。

不久，因地下民革出了问题，我被迫转移，回到老家仁寿县。刚刚解放，就收到一位同志的来信，说程觉远当了县长，他要你回来。组织关系已派人到川西区党委转来。

就这样，我回到了荣县，住在县人民政府内。

在程县长任职初期，干部服还没有发下来，他仍然穿一身褪色的灰布长衫，因为是冬天，头上还包上一块白帕子，活像一个老农。有一天，我和其他两个同志同他一起外出回来，我们当然都没有穿干部服。走到县人民政府门口，守门的卫兵挡住了我们，不让进去。我说：“你不认识县长吗？”卫兵问“哪个是县长？”我指着程觉远说：“就是他呀！”卫兵用怀疑的目光打量了一下程县长，让我们进去了。他竟忘了敬礼，程县长也不追究。

刚刚解放，心情十分振奋，我同另外几个在县政府任职的年轻同志每天早起，打开县政府后门，到广场上去锻炼身体。老林是秘书，每天早晨都去叫程觉远：“老头，快起来，出去锻炼。”程觉远就真的起来同我们一起去锻炼。后来想起，十分内疚：解放初期，作为一个县长，工作十分繁重，我们这些年轻人太不懂事，为什么不让他多休息一会呢？

1950 年初，为支援农村的春耕生产，县人民政府动员全体干部送肥下乡。程觉远挑着盛得满满的一挑大桶走在最前面。我挑着一挑较小的桶还没有盛满，感到十分惭愧，心里暗想今后一定要好好锻炼，过劳动关。

程县长确实不像一个县长，他命令县人民政府打开大门，欢迎群众来访。他和一些农民谈话，还常常不在办公室，而在阶檐边，来访者蹲着，他也蹲着，来访者常常是好几个人，围着他谈话。我心里想，他确实不像国民党的县长，这才是真正的人民的县长，人民的公仆。他和人民血肉相联，老百姓像都是他的亲人。他的谈话常常是谈笑风生，与来访者有说有笑，气氛很热烈。

1951年2月，程觉远调到川南行署任民政科长。这位深受干部和群众爱戴的人民的县长不声不响地离开了他长期战斗过的家乡。没有饯行的宴会，甚至没有人送别，我都是在他走了之后才知道的。

1952年5月，我在泸州川南党校参加整党学习，关于父亲的问题和我自己在国民党县政府任过职的事，怎么交代也过不了关。我曾到民政厅去找过他，诉说我的苦恼。他给我安慰，并告诉我一定要实事求是，不可乱交代，鼓励我勇敢地接受审查和考验。自此以后，我就再也没见到他了。

程觉远是我一生中最崇敬的革命前辈和长者之一。他在党处于最困难时期的1927年入党。他出身地主家庭，但把他的家产全部变卖献给了党。他多次领导了荣县的农民运动和武装暴动，并被国民党监禁达十二年之久。他备尝艰苦而斗志始终不移，他为革命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从不计较个人的名誉地位。1954年元月，他在赴四川长寿化工厂任职，乘姊归轮在汉口至宜昌途中不幸失踪，没有留下任何遗物。中共化工局总支虽然决定保留他的党籍，但他的死因却成了一个不解的谜。

1996.9.22

忆诗人邹荻帆

我年少时喜读诗，特别钟爱七月派诗人；自己也学习写诗，还写诗评。艾青、绿原、邹荻帆对我的影响尤深。记得我最早（大约是1944年）发表在成都《新中国日报》的一篇诗评就是《读邹荻帆的〈青空与林〉》。当然很幼稚，现在也记不起说了些什么了。

近日在报上看到邹荻帆病逝的噩耗，怅然久之。回忆的浪潮几度翻腾，使我夜不能寐。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他，大概是1945年。那时还是高中生，已参加了成都文协。那天是诗人节——即屈原投江的日子，传统的端午节，聚集在成都的诗人在祠堂街美术协会集会。邹荻帆到会并作了慷慨激昂的发言。他说，诗人不能回避现实，要正视现实。他提倡写政治诗。他讲得很激动，满脸通红，给了我强烈的感染。那时我刚读了他在《诗垦地》上发表的长诗《新时期》，写的是美国反对南方奴隶制，林肯领导的美国南北战争。写得气魄宏大，充满激情，我很喜欢这首诗，以为这首诗比《青空与林》里的诗有更高的境界。当时还没有产生对“陕北红星”的联想。

那天的诗人集会有一个有趣的插曲：会议进行中，忽有两个和尚自称喜爱诗歌，要求参加。主持人很为难，怕的是

国民党特务来搞破坏。几经磋商，最后还是同意他们进来。他们进来了，很安静地坐着听，不知他们有什么感受，可没有出什么事。

我第二次见到邹荻帆，是在四十五年之后的 1990年 6 月，那是文友吕进给了我一次研究七月派的机会，使我得以专程拜访我一向深爱的几位七月派诗人。我去了邹荻帆在北京和平里的住处。这一次他不再是激昂慷慨，而是亲切和霭，平易近人。当他得知我正在进行七月派的研究，并已拜访杜谷、曾卓、绿原和梅志夫人等，就真的把我当亲密的朋友，无话不说了。当时我认为他很健康，听力很好，谈话也很自如，却不料在 5 年之后溘然长逝。他赠我的一本《邹荻帆抒情诗》，竟成了永别的赠品了。

如今，放在我桌上的这本诗选，虽然远不能代替他的全部诗作，但就在这里面，我们已经可以窥见一颗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关怀全人类的永远跳跃着的赤诚的心。这本抒情诗竟然绝少关于爱情的歌咏，诗人在《后记》中说这是他的不足，但这正足以说明，在祖国和人民处于危难之际，他把全部的关注和爱都献给祖国和人民了。

怀念我的两位音乐老师

最近去了一次重庆，老同学邓菱赠给我两本她编的《重庆文史资料》。我爱不释手，阅读之中，无意间发现：原来我的音乐老师赵启海还是 1940 年大后方在重庆第一次演出《黄河大合唱》的组织者之一，并看到了一幅有赵先生在内的全体演出人员的合影照片。于是引发了我对赵先生和我的另一位音乐老师李兆鸿先生的深深怀念。

那是 1944—45 年，其时我在成都甫澄中学念高中，赵先生教我们的音乐，一面还在金陵大学读书。他的声乐很好，他喜欢唱民歌。我在歌本上看到，好些青海民歌都是他收集整理的。我很喜欢听他唱《在那遥远的地方》、《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和《半个月亮》。我觉得他有独特的风格：抒情味很浓，节奏的自由度高，非常动听，总之，比别人唱得好。我后来唱这几支歌，都不知不觉地学他的样。他也教我们英文歌曲，但他喜爱的是中国民歌。他还组织合唱团，我是他的男高音部团员。我从那时开始参加四部合唱，并第一次领会到合声音乐的美。我还记得他教我们唱《我所爱的大中华》，我在歌唱时感受到那种激昂奋发的感情，一种爱国的激情就在我胸中激荡。赵先生有一次要在成都开独唱会，我是他的崇拜者，当然非常高兴，我积极地把我们那个文学社团的成员全体动员起来，帮他拉票，卖入场卷，演出时还

为他拼命地鼓掌、捧场。赵先生这场独唱会开得很成功，一个多钟头，听众的情绪始终不衰。

另一位音乐老师是四川省艺专和南虹艺专的钢琴副教授李兆鸿先生。我认识李先生是在 1946 年秋我进了华西大学之后。他是业余时间在他的家里义务教我的钢琴和指挥，没有要我一分钱学费。我本来考上了艺专音乐科，但父亲不让去，只好业余学音乐。我忘了是谁把我介绍给李先生，我只知道他是思想进步的音乐家，不知道他是地下党员。也许，是党组织给了他任务，让他把我培养成党的文艺干部的。后来，由于条件限制，我的钢琴学习没有坚持多久，但我从李先生那里学到的一点初步的指挥知识，却帮助了我以后在华大、在别的地方组织合唱团，使我敢于去指挥四部合唱。

1948 年上年，赵先生要去美国留学，我感到依依不舍，曾邀李先生作陪，在华大附近的一家小餐馆为其饯行。席间，我才进一步知道，赵先生和李先生有相同的艺术见解，他们都是进步的（应该说是革命的）音乐家。只不过李先生是专业的，赵先生另有专攻。此后不久，我接受党的派遣，离开成都；赵先生离开了祖国，从此杳无音讯。

五十年代我回到成都，得知李先生解放以后在四川音乐学院任钢琴教授。不久就调到重庆西南川剧院任研究室主任去了。后来我在重庆会见了李先生。李先生请我欣赏经过改革的川剧演出。过去我总认为川剧音乐难听，特别是帮腔，这一次感受却大大不同了。原来是李先生带了一批川音的毕业生对川剧音乐作了大胆的改革，帮腔改成了女声合唱，全部音乐都作了改造，听起来既优美又不失川剧味，我对川剧音乐的看法于是根本改变了。

以后，李先生回到成都，在川剧研究所工作，住在人民公园楠木林文化厅宿舍。我去看望过几次。交谈中不免常常回忆到过去。我问他还记得他创作的歌曲《五月太阳似火烧》不。他完全忘记了，我却还觉得很完整。于是我唱给他听：“五月太阳似火烧 不烧胡子烧眉毛 老板昨天要加佃呵 开口几万不能少。不肯加呀嘿没田种，一家大小怎开交？吞下眼泪卖新谷，心中好比插把刀，新谷好卖价不好呵，旧谷一挑当两挑。你家今年要加多少？问你心里焦不焦？”

我一面唱歌，一面体会李先生那种对苦难中的农民的深沉的爱，深深感受到一个人民音乐家的崇高的精神和伟大的人格。我几乎要掉泪了，但李先生却很平静，很淡漠，他只笑了笑，夸奖我的记性好。我想，他生平作了许多贡献，却从来没把它放在心上，这同那些并无贡献却又趾高气扬的人相比，真是相去万里了。

写到这里，我不禁感到深深的内疚，由于各种事务的纠缠，我竟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去楠木林看他。后来，有人告诉我：他已经离我们而去了。

我的两位音乐老师不仅在音乐上给了我以指导和熏陶，而且在做人方面也给了我以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我的心里留下了永恒的记忆。记得李先生的女儿亚宓同我一起学钢琴，我十七岁，她才七岁，她是个可爱的小姑娘。后来她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毕业后分在峨眉电影制片厂工作。我几次去看望李先生都没看到她。有一次，师母告诉我：真不巧，亚宓刚走。师母是个很善良、很贤淑的女性。在此，我祝愿师母和亚宓健康、幸福，祝愿李先生的灵魂安息！

1995.7.31于桐梓坝

悼 林 涛

林涛于 1988 年 11 月 5 日逝世，可我得到讣告已是 11 月 16 日，林涛的遗体告别仪式是 15 日举行的，当天就进行了火化。我来不及见他最后一面，使我痛上加痛，歉疚不已。

林涛原名钟青安，我在育才学校社会科学组与他同班，同他一起攻读马列主义，他是我的亲密的朋友。当时，由于厚藩（洛庚）、君宇和我是一起到育才的，比较接近，我们又都共同喜欢青安。他待人热情，虽不善于言辞却能坦诚相见。他的头发是“少年白”，这使我们感到他的年龄比我们大，常把他当作大哥，他也似乎确比我们老成，其实，除君宇小一些以外，他和我们的年龄是差不多的。

1946 年秋，我中途转学到成都华西大学。1947 年，林涛从泸州给我来信，说他在主编一个妇女周报，要我给他编文艺版。这以后我就每周编好文艺版给他寄去，出版后他就给我寄几份来。这件事干了多久已经记不清了。后来不知怎么失去了联系。也许他那时就到华莹山组织游击去了。

再以后就听到了关于林涛的传说。说他被关在“中美合作所”，不久又听说他已经英勇就义。可是，大陆解放后，我收到姐姐从重庆写来的信，说林涛还活着，只是受了伤。她亲见林涛在“中美合作所”敌人罪行展览中担任解说员，

在那里现身说法。我一时喜出望外，立刻给他写信。复信很快就来了。他沉痛地告诉我哪些同学、校友牺牲在渣滓洞，对他自己英勇斗争的事迹却只字不提。

以后，我在他的来信中知道，解放后他虽在“新华日报”当编辑，党组织并没有立即承认他的党籍，党对他在狱中的表现审查了两年。他一直到恢复党的组织关系以后才告诉我这件事。言说之间，认为这是天经地义，并没有半句怨言。这真是“心地无私天地宽”呵。这以后我和林涛就失去了联系。现在回忆起来，大概是因为我已被打成右派，发配到远方去了。

从此过了许多年，我不仅完全得不到林涛的信息，也同所有的育才同学都断了音讯。一直到十年动乱结束，1978年我恢复了工作，1979年开始落实政策，我才在分别三十三年后找到了林涛。

起初，我是带着碰运气的想法给四川日报写信，问他们那里是否有个钟林，因为建国之初林涛在新华日报工作，那时他已更名为钟林。新华日报不办了，我猜想他也许到了四川日报。果然，四川日报社很快来信，不但确认老钟就在那里，而且告诉我他又更名林涛。不知怎的，我不禁产生一种沧桑之感。当我带着激动的心情到四川日报社找到林涛时，却不料他的住房只有一间，屋里只有一张单人小床，一张旧办公桌，一把藤椅，一个简易小书架，两个木凳。他让我坐他的藤椅，自己坐在床上。他的穿着还是那么朴素，像学生时代那样。头发还是蓬松着，只是白得更多了。他的眼睛有病，又经常咳嗽，咳起来就满面通红，老是止不住。他告诉我是气管炎加肺气肿。但仍然抽烟抽得厉害。我劝他把烟戒

了，他笑着摇摇头说：“要工作就得抽烟，不抽烟不行。”我只好说：“那就少抽点吧。”我问他为什么不请病假好好治疗一下。他说：“不要紧。工作离不开。”我又问：“你的夫人和孩子呢？”他说：“都在乡下。”我想，一个在党报工作近三十年、现任四川日报农业部主任的老干部，怎么爱人都还没有接来，而且身边没有一个孩子。我忍不住说：“老钟，你也太苦了，为什么不把嫂夫人接来？至少也安排一个孩子在身边。像这样，哪个照料你呢？”林涛却满不在乎地说：“不行不行 政策不允许呀！”我只好无言了。

因为没有家，林涛只好在饭馆里招待我。他一定要陪我喝一杯。尽管多年不见，我们之间却没有一点距离。我觉得，同林涛在一起非常自在，非常随便，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边喝边谈，回忆育才的生活，谈到育才的老师，同学，他们的过去和现在，使我沉浸在爱的海洋里。唉！好多年了，我失去了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友谊，失去了爱。是林涛唤起了我久已麻木的感觉，我似乎新生了。

现在回忆起来，那一次林涛也很少谈自己。即使我问到他，也是三言两语。他从来没有炫耀过自己，从来不谈自己的贡献，似乎他一直过得很平凡，没有什么可以言说的。

那一次林涛给了我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一个朴实的、坚韧的，默默地无私地奉献自己、却从不索取什么的共产党员形象在我的心里生根了。多么好呵，林涛。如果所有的党员都像你这样就好了。但是，林涛为了工作，太不爱惜自己，又使我心里隐隐作痛，并产生了一种担心和忧虑。以后，我就同洛庚以及别的朋友说，要多给林涛一些关心，他太不关心自己了。以后我又常常把林涛的事情讲给青年学生

听：共产党有这样好的党员，你们知不知道呀！可不要把一切都看成一团漆黑。

又过了几年，林涛因病提前离休，他的夫人终于到了成都，他终于有了一套房子。我到他的新居去看望他，并在他的家里住了几天。他戒烟了，但咳嗽仍不见好转。晚上经常看电视，看得很晚。我劝他早些休息。他说，睡不好，睡着要咳嗽，不如多坐一会。我痛心于病魔还在无情地纠缠他。以后忽然听说他煤气中毒，住进医院。因为冬天冷，林涛怕冷，把窗户关得严严的，家里人都睡着了，他还在看电视，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屋里生着火，煤气出不去，所以中毒。幸好不久痊愈了。近两年，我虽然偶有事到成都，但总是来去匆匆，没有再去看望林涛，却不料突然传来噩耗。林涛刚刚才 60 岁，就离开了我们，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林涛、青安、老钟呵，我的亲爱的兄弟，我将再看不见你亲切温暖的笑容，你为什么去得这么早？是敌人摧残了你的身体，使你留下了不治之疾吗？是你长期带病工作，耗尽了你的最后一点心血吗？嫂夫人是善良、勤劳的劳动妇女，她不是在殷切地照料你吗？也许，她来得太晚了，你的病拖得太久，拖得太重，无可挽回了。我们——特别是我，对你关心得太少了。老钟，你虽然自认为平凡，我却认为你谱写了最美最动人的生命的乐章，你活得充实，活得有意义。你为摧毁旧世界不惜牺牲，你为建设新世界也不顾自己。你无愧于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你可以放心去看马克思去了。永别了，林涛，安息吧，勇敢的战士！

1988.11.16 17日凌晨写完

致诗人阳云

阳云兄：

得到您的贺年卡，十分高兴，尽管您和嫂夫人去年经受了磨难，但您还健在，嫂夫人想已痊愈。多年未通音信，去年寄去拙著，未见回音，使我十分担心。现在我可以放心了。您是我最早结识的诗人。那时我还是十四岁的少年。我是先读了您的长诗《牧歌初唱》以后才见到你的英姿的。这首长诗那时我能全文背诵的，而且很多年我都能背诵。只是磨难太多，渐渐地只记得一些片断了。您还有一首诗《让我们奔向那些街》，我十分喜爱，至今仍能背诵一部份，特别是下面几行诗，印象特别深：

让泪洗过的眼睛更亮

让血的脸在太阳下放红棕色的光

让那些长久忧郁垂下的头

在万人的大合唱里再昂扬起来

这简直是一团火，点燃了我的年青的心，使我反复吟哦，至今不忘。那是 1945 年，在我们这几个“毛头小伙子”办的《果园文艺》上发表的。我在以后的几年中，投身于学生运动，这首诗是起了激励作用的。

你是平原社的诗人。平原社的诗风与七月派接近，七月

派的诗人有些也是平原社的。我的记忆是这样。不曾问过杜谷，他当然是知道的。以后读到《五个人的夜会》（诗辑）里你的诗，情调有些低沉了，我有些失望。但接着又听说你到解放区去了，又使我感到高兴。我们的交往虽不多，但我深爱你的诗；无法同您通信，就写了《怀念黎茹——并略论他的诗》在《天风》周刊上发表。《天风》的编辑陈鼎文（后来知道他是燕大地下党员），约我去编辑部谈，夸奖我这篇文章写得好，说我对你的诗是作了认真研究的。现在想来，他可能认识你。不知是否如此？

这些都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如果不是杜谷兄，我是肯定找不到你的。因为研究七月派，拜访杜谷，无意之间，同他谈到了你。他说你已改了名（即阳云），现在湖北省作协；还站在凳子上去翻他的书橱，找出了一本书，大约是中国现代诗人的传略什么的，上面有关于你的记述，这使我喜出望外。

在阔别四十几年之后，我终于在武汉找到了你。感谢嫂夫人的殷勤接待；感谢我新结识的朋友姜弘，用省作协的专车陪我到医院看你。得知你得了癌症，正准备开刀，我的心情变得沉重起来。可是，完全出乎意料，你明知自己的病情，却非常乐观，非常开朗，见了我十分高兴，已到“古稀之年”且是病人，却十分硬朗，腰不弯，背不驼，走路还相当快，谈话中还常爆发笑声。你说开刀的医生还没回来，没有事，今晚可以回家畅谈。就这样，我们有了一次愉快的聚会；并同姜弘一起，留下了几张珍贵的合影。

分手后，我惦念着你的手术是否成功。当得知你手术十分良好后我宽了心。久不通音讯又使我疑虑重重。现在好

了，乌云已经散去，阳光依然普照。

尽管你已不写诗了，改写散文，但你的诗人气质是改不了的。你永远是一个诗人。拙著蒙您首肯，慰勉有加，但是过誉了，使我受之有愧。我现在正主持一个教改实验学校，已无暇搞科研、写论文，余暇时间，写点回忆性散文，当奉上请教。姜弘兄评论胡风的文章，很有见地，我深为敬佩。他曾有写当代文艺思潮评述著作的计划，不知已完成否？请代问候。即颂

新年快乐 全家安好

刘 光

1997.1.18

白头长相知

昨天收到一张来自荣县的贺年片，上书：

少年从兄后，白头长相知；
新春年年至，祝福无绝期。

小妹。

96.12

诗的右侧画着一个圆脸的小女孩，头发像要飞起来，两脚交叉像在跳舞，右手拿着一张曲谱，嘴大张着，好像在笑着唱歌。贺年片的右下角印着“美妙歌声”四个字。

细读小诗，不胜感慨。这位“小妹”，实际已是年逾花甲的老太婆，在家里是婆婆，在我面前，就始终是小妹。贺年片上的小姑娘，就是我的小妹，不仅是过去的小妹，也是现在的小妹。我想起四十几年前的她，活泼、天真、聪明、稚气，我认识她的时候，她才十六岁，是高中学生，著名文学家赵熙的孙女。1948年9月，我初到荣县，听说赵熙是川剧《情探》的作者，仅仅为了这个，我有幸去拜望了他。不久他就去世了。他的孙女却成了我的工作对象——当年我作地下工作，他的孙女后来成了民协会员，学运骨干。记得

她的祖父出殡时，排着长长的队伍，我在队伍中看到了她，她就忍不住笑，这个调皮的小姑娘，她好像人世间没有什么悲伤的事。

她不仅把我当引路人，也把我当哥哥。我排行三，背地里她叫我三哥；她排行六，自称六妹。当着其他战友，她叫我刘大哥，与其他人对我的称呼相同，借以表示她同我没有更亲密的关系。我爱好音乐，她也爱好音乐；我自认为识谱能力相当强，一首不太难的新歌，不必先学谱，可以立刻唱词；她不比我还差，甚至比我还敏捷。我们在一起时，不只谈工作谈学习，也唱歌，唱那些没有学过的新歌。当然我们同大家一起聚会时也唱歌，这时她往往成了教师。

荣县有个基督教教会组织的青年团契，有二十多人，冷冷清清的，除了唱诗，没有什么活动。我运用在华大搞团契的经验，指示学运骨干打进青年团契，利用它的合法外衣，开展一些活动，团结和争取一批青年靠拢我党。小妹也参加了这一工作。后来青年团契发展到二百多人，并由我们控制了领导权。

一年后，由于特殊的原因，我转移了。建国以后，我又回到荣县。刚到那天，适逢青年征粮宣传队下乡宣传归来，一路敲锣打鼓，个个神采飞扬。一看，不少是原来的老朋友，小妹也在其中。我安排在团委任职后，组建了青年剧团。小妹是一位重要演员。我们一口气排练了几个大型歌舞剧：《白毛女》、《刘胡兰》、《王秀鸾》。小妹不仅扮演了刘胡兰，令人吃惊的是她居然还扮演了《白毛女》中黄世仁的母亲，没想到小妹扮演一个地主老太婆也那么惟妙惟肖。她对角色的体验做到了体察入微，充分展示了她的艺术才能。

世事沧桑，一晃二十年，我才从炼狱中走出来。荣县县委和自贡市委举办吴玉老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会，邀请我参加。我得以旧地重游，同许多老朋友、也同小妹重聚。小妹特邀我在她家玩了几天，仍以兄妹之情待我。她的丈夫和她都是高中语文教师，这人寡言少语，性格内向，却与小妹感情甚笃。可谓性格互补。小妹有次和我一起拍了一照，她还是那么调皮，歪着头笑着对我说：“可别让别人误会呀！”我打了她一下，说：“没啥，我们是兄妹。”以后我就公开叫她小妹，人人都知道我们感情很好。

小妹不服老，她始终是那么乐观、活泼、开朗和正直。这些年，她寄过表演独唱和喜剧小品的照片给我，还说，如果想听她唱歌，她还把歌声录下来寄给我。

相知”难，“长相知”更难，“白头长相知”就更是难上加难了。我同小妹确实是“白头长相知”，相互了解，相互信任，始终不渝。这是人世间最可贵的友情。半个世纪的人生阅历，使我看到：有的人“相知”一时，经不住时间的考验；有的夫妻“同床异梦”，几十年不“相知”。令我欣慰的是，当我在厄运中挣扎，为众人所不齿的时候，我得到了“相知者”的安慰；更有二十年断绝音讯，不避风险，还敢挺身而出，拍着胸膛担保说“刘光是好同志”的人。这才是真正的战友，真正的“相知”。人就是靠着这样的“相知”生活，靠着这样的“相知”去战胜困难，克服险阻的。

忆谐剧大师王永梭

读 8月 3日《文摘周报》《王永梭讣告引发的话题》，才知道王永梭已经去世，他的一连串的光耀的头衔，大部分还是第一次得知。

王永梭是我的老朋友，安岳县人，五十年代初期调到内江川剧团。我知道他是解放前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毕业生，很早就创造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曲艺品种——谐剧，演员只要一人，不需任何布置和道具，必要时也只要一几一凳作为一种象征即可。我看过他的表演。他早期的杰作《阿Q正传》、《卖膏药》具有强大的魅力，感人至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还是一个语言艺术家，他用四川方言，充分发挥了这种方言的幽默、诙谐、生动、含蓄的美。像这样的天才，我认为是非常难得的。那时内江第一次筹建文联，我有幸同他经常接触，知道他具有卓越的艺术才能，同时也了解他深切关怀人民群众的疾苦，是一个人民艺术家。

可是，也许是文人所固有的一种傲气吧，当时文联和更高的领导对他并不欣赏，他自己也明白，所以，当我提名他当剧协的主席时，他坚决地挡住我，说：“绝对不行！”果然，领导对他的不满似乎在不断升级，他经常受到大会的点名批评。我很纳闷：王永梭在解放前并无一官半职，并且创

作了不少表达人民疾苦的进步作品，他究竟有什么问题？

好在机会来了。五十年代中期，省里有个文工团来内江演出，王永梭参加了演出后的座谈会，文工团领导发现了他的艺术才能。不久，王永梭被调到四川省军区战旗文工团。

1957年上半年，王永梭回到内江，我们又见面了。令人高兴的是，他这次带了七个谐剧节目，要到上海去拍电影。朋友们都庆幸：王永梭谐剧的影响将扩大到全国，这个独特的曲艺品种将得到广泛的承认了。

朋友们要求他行前在内江演出一次，他愉快地答应了。

没想到他去上海不久，全国爆发了反右运动，王永梭被错划为右派。我伤心地想：谐剧电影肯定不能拍了，王永梭的谐剧从此消失了。这么一个独创的曲艺品种从此失传了。

接着，我也被错判为右派。在云南盐津县参加修筑铁路时听说王永梭也在筑路大队，但无缘见到他。

几年以后，劳教归来，听说王永梭已调到省曲艺团，并且还在搞他的谐剧演出。当然，演员还是他一个人，而且是专场演出，没有别的节目。演出还是像过去一样，场场客满。王永梭够累了，为他的团赚了很多钱。但因为他是右派，给他的报酬很低。王永梭的生活很困苦。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绝大多数的右派份子得到了解放，恢复了名誉和待遇。王永梭和我都得到了新生。这时，我高兴地看到了王永梭新著谐剧《结婚》在电视里出现。后来，我在编写一本美学函授教材写到“喜剧”章节时，谈到了这部谐剧：

谐剧作品《结婚》写一个中年男性公民在结婚筵席上同满座的客人说话，历数他的“恋爱史”的坎坷，颇

有喜剧性，可新娘还没有来。一等二等，终于等来了电报，说新娘因为替人接生，婚期要改。于是新郎苦笑了。作者的创造就是这个意味深长的苦笑。建国初期马烽的同名小说，情节与此相仿。根据小说改编的歌剧，却自始至终充满欢乐。主人公虽然是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却显得矫情。婚期一改再改，谁也不会没有一点不愉快吧。谐剧《结婚》却并不掩饰这一点，它再现的是喜中有悲，乐中有苦，因而也就写出了生活的复杂性，人的情感的复杂性。

当然，两部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解放，王永梭也写不出、不能写这样的“苦笑”。而“苦笑”之所以让人看得清楚，也是由于荧屏（或银幕）特写的作用。

但是，我也看到了王永梭的败笔：

谐剧《黄巡官》也出现于荧幕上。它的故事，完全是契诃夫小说《变色龙》的移植。当然，这个短篇小说的情节很适宜用谐剧形式来表现，但《黄巡官》缺少必要的创新。在这里，我似乎觉得，王永梭已经江郎才尽了。

我在同他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把我那本函授教材《美学初步》赠给了他，不料那一次就是永别了。

杰出的谐剧大师王永梭去了。值得庆幸的是，他的谐剧艺术已经得到广泛的传播和高度的评价。而且，更重要的是，谐剧艺术后继有人。希望王永梭的学生和后继者创作出更多更好的谐剧作品，使谐剧艺术更加发扬光大！

乱 弹 杂 音

不 灭 的 火

——关于《萧蔓若小说集》的通信

萧老：

得到您惠赠的《萧蔓若小说集》，不胜欣喜。早在十多年前就听说四川某出版社要出您的全集或选集，我以为这是十分必要的。四川籍老作家而具有乡土特色的，除沙汀、李劫人外，你是一个。单说抗战文艺史的研究，也不能没有您和您的作品。十多年过去了，某出版社的“计划”已成泡影，文人出书难，早是作家们的共识。当然那些赶时髦、顺应商品大潮、能赚钱的书除外。我在十二年前写的那篇《老骥之歌》，对您的介绍十分粗浅简略，至今深为愧疚。您的宽阔胸怀、高风亮节、忧国忧民、又甘于淡泊，虽届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壮心不已，令我景仰、敬佩。捧读大著，心潮起伏，感触颇多，今将读后体会，略陈于左，也许仍不免于粗浅甚至谬误，希望得到您的教正。

“文学是生活的教科书”您的书当之无愧 您始终坚持现实主义道路，让自己的作品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的土壤。您慧眼独具，能从旧中国社会的某一角，于芸芸众生诸相中，透视一个时代的社会热点、精神风貌和一定社会的本质真实。虽不能全面，但确可以“借一斑以窥全豹”。这本短篇

小说集写抗日战争时期较多，这里有爱国学生运动的风起云涌，有对学生运动的横蛮镇压，有专横跋扈、却口头革命、一心争权夺利、发国难财的国民党官僚和准官僚，有狂热爱国却动摇不定的知识分子，有醉生梦死、愚昧麻木的中下层人物等等。写于解放战争时期的作品收入集子的不多，但作品对国民党崩溃前夕政治腐败、工业凋蔽、经济崩溃的倾向已有洞察。这些忠实的形象的描写，是历史教科书所不具备的，对于当代青年了解中国过去的社会，了解新中国是从什么样的社会蜕变而来，当能有所裨益。

现实主义作品忠实于现实生活，但不是照相，从中我看出了您的鲜明的倾向性——您的是非分明和强烈的爱憎之情。您把同情和爱给予爱国青年，把仇恨和愤怒之火投向反动分子和无耻之徒。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对待浑浑噩噩的人。您曾任外国文学教授，又曾主讲“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我觉得俄罗斯文学对您的创作是有影响的，特别是契诃夫的影响。

下面我想稍稍深入一点谈谈您的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让我作一次“灵魂的探险”吧。

前面已经说过，您是一位具有乡土特色的作家，这种特色首先表现在您对方言的运用上，四川方言，幽默风趣，意味无穷，有许多是普通话不能代替的。当然，方言用得太多，会给外地人带来阅读的困难，但它有助于文学的表现力。李劫人和谐剧作家王永梭是运用得很成功的。你对四川方言的运用也很娴熟，信手拈来，便十分妥贴，特别是写人物，对人物的个性化、立体化很有作用。例如：“我跟你谢大爷没有坛子。（P303末行）涮坛子”是开玩笑之意，其

中包含侮辱性的玩笑。难怪责任编辑或校书者不懂四川方言，把书上的“二天”改为“两天”你很生气。原因是：“二天”是“改天”“以后”的意思，这一改意思全变了。

除此之外，运用人物的口头禅和浑名也是您小说的一个特色。“乖乖龙个咚”是女训育主任的口头禅（《江校长》），我幼时曾听到过，有时表示高兴，有时表示惊异。“所以的话”是一种习惯性语弊（《译名不只一个》）；把“所以”两个字拼成“水”（《牺牲精神》）也是一种可笑的习惯。如此等等，我感到有一种喜剧效果。至于“牺牲精神”的口头禅（《牺牲精神》）则是人物性格的集中体现。这种“口头禅”再发展为“译名”（绰号），用您的说法，就是“既具概括力，复饶幽默感”的东西了，例如“搁平书记”和“初级书记”（《译名不只一个》），这都是你独特的喜剧创造。

此外，四川乡镇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等等的描写，您虽没有着意刻划，而都栩栩如生；解放前、建国初期与改革开放以后的时代气氛也都作为背景而有鲜明的展示。

前面已经涉及到喜剧性问题。我认为，您的作品的最大特色是喜剧性。反面人物几乎都是喜剧人物，您对他们的外强中干、外表庄严而内心龌龊，给予了极其辛辣的讽刺。您对他们的丑化连一个生活上的细节也不放过。这里当然有夸张，但都有生活依据，决非信口开河。我只觉得，集子中最早写的一篇《江校长》，夸张得似乎有点过头。我极其佩服您对这种伪善人物的内心世界真是洞若观火，体察入微，他们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所流露出的阴暗心理，都逃不出您的锐利的眼睛。您也真可以说得上是世故老人了。您的辛辣的讽刺不仅对敌人，对叛徒，也指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某些

“尸位素餐”者，他们不一定是大贪污犯或大阴谋家，但他们也是社会主义大厦或大或小的蛀虫。因此，我认为，从中国人“以食为美”的古传统来看，您的作品的主要味道是辣味。（四川人都喜欢吃辣椒，我同您“有同好焉”，一笑）

在旧社会，您是一个穷教师，还当过店员、学徒，这使您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和情感积累；但因为您不是生活在斗争的前沿和中心地带，所以不可能正面描写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斗争，您采用了侧面描写或作为背景来显示爱国力量和革命的力量。这也是不少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作家惯用的方法。你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是成功的，这使您的作品不同于那些单纯暴露黑暗的作品而具有触目的亮色。

短篇小说塑造典型是不容易的 而我认为，《牺牲精神》中的曾×长、《译名不止一个》中的郭长浩、《曾宝儿生平纪略》中的曾宝儿，都可以说是典型。他们不仅有普遍性，也有鲜明独特的个性。以曾×长为例，这个人物使人很容易联想起张天翼的华威先生。他们都是国民党的抗战官僚。华威先生很著名，几乎成了“开会迷”、“会贩子”、“空谈家”的代名词，而曾×长的性格刻画，比华威先生丰富复杂得多。如果说，《华威先生》像一幅速写，由作者几笔勾成；《牺牲精神》中的曾×长却不是速写，而是雕塑，是经过您的精雕细琢而成的。曾×长之所以出不了名，我想说不定是您不该写个“×”，因为“×”是读不出音的，如果读成个“某”字，也使人莫明其妙。假如您早点给他取个名字，也许他就名扬天下了。不过，我还认为，华威先生的出名也许还因为他的性格特征单纯，容易把握，而曾×长的性格却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清的。请不要以为这是我讨您的好，我相信每一

个客观的读者比较一下这两篇小说就会同意我的结论。

您在《自序》中说：“仅就作品的数量而论，解放后的四十余年远不如解放前的二十年，该是多数从旧中国过来的老一辈作家的共同命运。”读之令人心酸感叹。但是我要说，这本集子中解放后写的几篇为数虽少，却可以看出您对新社会的热爱和认识的不断深化，艺术上益臻老练圆熟。建国初期，举国欢腾，新一代青年立志献身革命，他们朝气蓬勃、热爱工作、热爱集体，“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

《夜访》中的刘知群、《歌声》中的沈如慧、《李玉》中的李玉都是这样。她们都有美好的理想和信念，但又不免天真和单纯。我想不仅是青年，就像您这样饱经沧桑的中年作家，那时也不免天真和单纯吧。但是由于您对现实人生的真诚与执着和严谨的现实主义精神，您没有去讴歌“大跃进”和其他不应该歌颂的事情。打倒“四人帮”以后，您重获解放，写了《不灭之火》，歌颂了一位在文革中受尽折磨而仍旧傲然屹立的老知识分子，他心中“对人民、对国家、对真理的爱之火，永不熄灭。”其实您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

改革开放，文禁大开，您的思路更加开阔、题材更加丰富。除以上作品外，还有对文革的反思、对久远年代的反思、对当代政治投机家的揭露和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新鲜事的描写，甚至还有对《左传》的故事新编（《“大隧”之歌》）。总的特点是：政治淡化了，人性问题提到了更高的位置。

人说：老年人喜欢怀旧。可是，这也要有一定的条件。现在，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总算结束了。您可以打开您的记忆的宝藏尽情地抒写了。但是您为什么要写曾宝儿这

个人（《曾宝儿生平纪略》）？为什么要写那个年轻的么舅婆因偷情而遭受酷刑（《不是梦》）？还写那个一心想成仙拒绝婚姻终于病死的‘九叔’（《九叔成仙记》）我想这正是作为一个作家的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人应该活得像个人样，人应该有追求爱和幸福的自由，人应该告别愚昧，珍惜生命，过人的生活。历史和现实不是绝缘的。历史的尸体有时是死而不僵，有时还会借尸还魂，变形再现。在运动中靠告密发迹的郭长浩（《译名不止一个》）不正是鲁迅所曾鞭鞑过的靠别人的鲜血染红顶子的投机家的借尸还魂？这个郭长浩和您在 1942 年写的那个嫁祸于人的黄春浦不是也颇有些师承关系么 您改写《左传·郑伯克段于鄢》）淋漓尽致地刻画了郑庄公和颖考叔的虚伪和中国式的狡猾，其中妙语联珠，发人深省，具有深长意味。所有这些，都是您对人性扭曲与异化的批判。

您最近（1993 年）写的《广东人》（原题《当代英雄》）是别具一格的作品 聪明美丽的小燕子刚刚批评了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春花太没脑筋，跟才认识几天的人跑了，而自己却也跟着一个她一见倾心的外地人跑了。是对，是错？是祸，是福？您一反过去是非分明的态度不予评说，且在描写过程中力求客观，不寓褒贬。我认为，这种写法更接近当代文艺思潮，尊重读者，让读者去思索、想象和判断。这也许也是您的又一个新的起点。您写这篇作品时已经八十五岁，仍能有所开拓而超越自己，真是可喜可贺。你是“不灭的火”还在熊熊燃烧，决非什么发挥余热。在此，我敬祝萧老健康长寿，创作出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刘 光 1995.12.2

关于《长恨歌》评价的商榷

建国初期，文学界对白居易的名篇《长恨歌》就曾有过热烈的争论。那时，新的政权和新的意识形态刚刚建立，多侧重于用政治尺度去衡量文学作品，但《长恨歌》是一种复杂的文学现象，任何简单化的诠释与批评，都不能说明它的复杂意蕴的价值所在。近读《光明日报》95.8.11的《东风》副刊楚庄先生的《长恨歌得失谈》，似又回到了老路。

楚文所说的“得”，是人所共知的“脍炙人口，千古传诵”，“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所以略说；其重点是放在“失”上。文章用了大量篇幅说的不过是杨玉环并非“养在闺中”的闺女而是寿王妃，玄宗夺了自己的儿媳妇，这是把稗史隐去“美化帝妃之恋”，是艺术上的失真。但既然是“艺术上的失真”，又怎么可能是“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呢？难道离开了艺术的真还能有艺术上的美么？

问题是怎样看艺术的真。楚先生既然“允许甚至有剪裁、有夸张、有想象”，为什么又独独不允许白居易把寿王妃改为闺中女呢？这无非是楚先生把道德评价和审美评价加以割裂，心目中只有一个至高无上的道德尺度和道德评价，贬低以至否定艺术的审美尺度和审美评价。楚先生也明白《长恨歌》“所渲染和歌颂的”是“生死不渝、忠贞不二的爱

情”。完全正确！这正是《长恨歌》的主旨。诗人所写的虽然是帝妃之恋，但远远地超越了它，而达到了一种美好的人性的高度。如果诗人按照楚先生的教诲，揭露和批判唐玄宗的荒淫乱伦、杨玉环的“争宠、弄权、骄奢”，道德到算是道德了，可艺术不再是艺术，《长恨歌》从题目到内容都得全盘改造，这一篇“千古传诵”的文学名著也就不复存在了。

陈鸿的《长恨歌传》倒是深得楚先生欢心的，但它不是文学作品，它的“惩尤物、窒乱阶”的主旨倒是完全符合封建道德那一套，可以说与白居易的《长恨歌》风马牛不相及。但“脍炙人口，千古传诵”的偏偏是《长恨歌》而不是《长恨歌传》！

楚先生还谈到人民性。但是，为人民所喜闻乐见，“千古传诵”的文学作品会没有人民性？庸俗社会学把人民性和人性加以割裂、对立，所以常常会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

略谈鲁迅的文化价值观

——在内江市美学学会、市政协、内江师专、内江教育学院、沱江文艺杂志社、市文联筹备组联合举办的“鲁迅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

成都的学术讨论会（注一）总议题是“鲁迅与中外文化”，由此可以看出，鲁迅研究的趋势已由微观的研究到综合的宏观的研究。近年来，厦门大学的林兴宅用系统论方法研究《阿Q传》，发表了论文《论阿Q性格系统》，也是一个新的开拓。

这个总议题引发我思考：鲁迅对待中外文化的价值尺度是什么。我想到“拿来主义”。但拿来主义主要是对外来文化的，而且“拿来主义”是一种态度，看不出鲁迅的价值尺度和取舍标准。于是我想到1925年鲁迅答复京报副刊询问“青年必读书”的一段话，这段话可以看出鲁迅的价值标准。从这一点出发，我想得很多，于是我确定了“略谈鲁迅的文化价值观”这个题目。

鲁迅在答复“青年必读书”的问题时，说：“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是真没留心过吗？否！不是没有留心，而是怕说错了，贻误了青年。有一次一个学生直接到他那里买他的书。学生走后，鲁迅感到这钱上还有青年身

上的体温，使他很感动，这就更加重了他对青年讲话的责任感。但他仍然忍不住要说，所以他就在似乎不重要的“附注”里说出了他的重要意见。

在这个“附注”里，鲁迅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指中国古书）多看外国书。”这话太偏激了，中文系的老师和同学可能不接受。但我们要注意：一、他的话是针对一般青年说的，不是指研究文学的青年。对研究文学的青年，他还真开了一个“中国文学入门书”十二种。二、“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现在看来也过火了，但那时是时代的需要，历史的需要。我们对任何一个伟人的言论，都要注意他讲话的历史的背景和他的讲话的针对性。三、更重要的，是这个偏激的言论中包含着客观真理。

那为什么要少读或不读中国古书、多读外国书呢？鲁迅说：“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鲁迅又说：“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不了什么大不了的事。”

读了这两段话，我们就清楚了：鲁迅是要我们面对现实，面对人生，重视实践；鲁迅反对的是逃避现实，崇尚空谈。从这里我们看到，鲁迅的文化价值观是革命功利主义的价值观。

但是下面的话就不大好懂了。鲁迅又说：“中国书虽有助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什么是“僵尸的乐观？”什么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历来的鲁迅研究者未见有何种解释，下面姑且谈谈我个人的浅见。

为什么中国的古书上即使有劝人入世的话，也是“僵尸的乐观”呢？这要从中国的传统文化说起。

建筑在宗法封建社会基础上的中国传统哲学、传统文化是以封建伦常为核心的，它把一切人际关系甚至天人关系一律归之为封建伦常关系。皇帝叫天子，君臣关系、官民关系，都是父子关系。所以知县老爷称为“父母官”，老百姓称作子民。就这样，上下尊卑，秩序井然，具有天意和命定的权威性，并使这种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伦理观念蒙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这种文化具有三个特点：

第一、轻视实践 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是道德修养，所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就是自我道德完善。这种道德修养是完全脱离实践的，是用“自省”的方式进行的。曾子曰：“一日三省吾身”。不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这一点，同西方文化是完全不同的。西方文化强调求真，追求客观世界的规律，所以科学发达；中国文化讲究求善（内容是封建伦理），所以科学长期落后。

第二、压抑个性 强调封建伦常关系，强调服从，必然压抑个性。这种思想也影响了我们无产阶级。我们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我们却常常忽视了合理合法的 personal 利益，特别是忽视人的个性。“个性强”不是常常被认为是一种缺点吗？一个人有点个性，有点锋芒，还常常被认为是大逆不道。这就大大地妨碍了人才的成长。

所以刘心武在他的小说《我爱每一片绿叶》中呼吁：“要为个性落实政策！”

第三、摧残人性 这一点鲁迅把它归纳为“吃人”。在鲁迅的小说和杂文中大量表现了这种思想。在《狂人日记》的结尾 鲁迅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这种摧残人性还表现为对人性的扭曲。孔乙己、阿Q、魏连芑、四铭、高老夫子等等，都是在不同的侧面表现了人性的扭曲。对别人的痛苦漠不关心，甚至幸灾乐祸，也是一种人性的异化和扭曲。

在这样的文化熏陶下，就出现了“僵尸的乐观”。鲁迅曾把中国的封建史概括为两个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祥林嫂就是因为 在鲁家做工，暂时做稳了奴隶，就感到幸福。阿Q的精神胜利法也是一种“僵尸的乐观”。有位理论家认为中国的民族性有一种好传统，就是“达观”其实就是鲁迅所说的“僵尸的乐观”。实际上就是：听天由命，忍辱屈从，安于现状，不要改革，不要革命，就是鲁迅说的“不死不活相”。鲁迅教青年少读或不读中国古书，就是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根本否定。

什么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呢？颓唐和厌世是不好的，但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又当别论。这个问题需要研究。

颓唐是从不满而来。在不满中就潜伏着希望。

所有一切革命者对现状都是不满的。正因为不满，才有改革，才有革命。马克思因为不满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才致力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研究，终于揭开了“剩余价值”的秘密，创立了唯物史观；毛泽东不满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

国社会现实，才高举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的民主革命的大旗；鲁迅痛心于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被奴役，才以文艺为武器，揭露中国民族的痼疾，引起疗救的注意。当然，从不满到颓唐，消极因素增长了。但既然是活人，就必然有欢乐也有痛苦，有前进也有颓唐，甚至于也可能发展到厌世。在鲁迅一生中，就有过颓唐和厌世。他并不讳言这一点。鲁迅在日本求学时，满怀救国救民的宏愿，从学医改变为从文，想办《新生》杂志，没有成功；翻译了《域外小说集》，又卖不出去。感到孤独的痛苦，但还并不颓唐，这从他介绍西方浪漫主义诗人，特别崇尚他们的反抗现实的精神，从他的论文《摩罗诗力说》可以看出来。但辛亥革命后，接着是二次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使他感受到更深一层的失望和痛苦，他说他自己颓唐得很了。于是他躲在会馆里抄古书，也看佛经。当然不能否定他辑录、校订古书的功绩，但从精神状态来说，他已经从颓唐发展到厌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惊醒了他。他写《狂人日记》，发出了第一声“呐喊”。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他由颓唐、厌世一跃而为“精神界之战士”。但是“五四”退潮之后，他从同一营垒的分化中又感到孤独，感到理想的渺茫，所以由“呐喊”而变为“彷徨”，颓唐的情绪又在不断地袭击他。尽管他在对敌斗争中表现很坚决，但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痛苦。比较一下《野草》（内心的独白）和他的杂文，可以明白这一点。一直到他真正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之后，这个矛盾才根本解决。由鲁迅思想发展的曲折过程来看，活人的颓唐甚至厌世也不可怕，因为在颓唐和厌世之后可能就是奋起，这就因为他是“活人”不是“僵尸”。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僵尸的乐观”、“活人的颓唐”中充满着一种独特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使我们不停留在表面的现象上，而深入到本质中去。鲁迅所看重的，不是表面的“乐观”或“颓唐”而是内在的生命，一个人的生命活力即动力，具体地说，就是人的理想和向往。这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观点。由此可以看出：鲁迅的文化价值观又是一种人道主义的价值观。

鲁迅所说的“多读外国书”，实际上是指引进现代意识。什么是现代意识呢？据我的理解，就是科学态度，求实精神，重视实践，讲求效率，自由、平等和民主观念，张扬个性，人道主义等等。

现代意识的核心是人的主体意识。马克思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观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费尔巴哈论纲》）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不同于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主要是他重视人，重视人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也是外国书，也在鲁迅欢迎之列，虽然1925年的鲁迅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里我想澄清一点误解：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不讲个性的，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是水火不容的。《共产党宣言》中说到未来的理想社会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据我的理解，共产主义的理想，就是每个人的个性，每个人的智慧和创造才能得到充分而自由的全面发展。这个理想，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完全实现。所以马克思主义是最彻底

的、最高的人道主义。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这一历史发展阶段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

当然，鲁迅所说的“多读外国书”，不限于马克思主义，也不应该限于马克思主义。如果是非马克思主义不读，那我们就成了谢惠敏（注二）式的人物了。鲁迅对外来文化，是广采博收的。他相信自己的消化能力。他说：吃了牛羊肉，并不会就类乎牛羊（大意）。大家知道，他受过达尔文的深刻影响，还受过启蒙学者卢梭、孟德斯鸠的影响，受过尼采、叔本华、柏格森、弗洛伊德等人的影响，但他经过消化以后，是有所扬弃、有所改造的。他通过反复的比较和实践的检验，最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在文学艺术方面，鲁迅有更宽泛的界限，可以说是兼容并包。西方的古典主义、批判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以至现代主义等等和苏俄的文艺，他都学习、借鉴，加以融会贯通。他的标准，他的价值尺度，我以为就是广义的人道主义。对于文学、艺术，他还特别注意它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他为什么那么鄙薄中国的传统文化呢？难道传统文化中没有好的东西吗？鲁迅并不否认传统文化中有好的东西，但即使是具有民主性人民性因素的作品也是精华与糟粕并存，无不深深打上封建思想的烙印。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超稳定性的系统，传统文化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的封闭性。在那样的封闭文化的土壤里是不可能产生现代意识的。鲁迅在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之前，长期处于苦闷、彷徨、矛盾之中，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深深感到传统文化对他的束缚很难摆脱。所以，我认为，鲁迅的文化价值观可以作如下的概括：用外来文化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用现代意识来冲击、

批判和取代宗法封建意识。这就是鲁迅对中外文化的基本态度。鲁迅的这种文化价值观，对于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至少是有参考价值的。

1986.10.15

（注一）指 1986 年四川省文联、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在这次讨论会上，我作了同一题目的大会发言。

（注二）谢惠敏 刘心武的著名小说《班主任》中的人物。她在老师的教导下，拒绝一切外国文学作品。

一本培养鉴赏力的力作

——读何西来的《绝活的魅力》

何西来先生新近出版的文艺随笔集《绝活的魅力》，正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说，我是最初的催生者。其中第一、二辑中大多数文章发表于我主编的《美育报》“鉴赏趣谈”专栏。《美育报》的读者主要是高中学生和中小学教师，何西来的“趣谈”在读者中特别是在教师中引起了轰动效应。现在作者又增补了许多篇章结集出版，这对于广大教师和大中学生提高审美素质，必将产生更为深广的影响。

由于职业的关系，我经常注意到中小学的语文教学，发现不少教师讲课程式化，枯燥无味，引不起学生的兴趣，主要原因是缺乏审美鉴赏能力。一些教师知识面窄，又急功近利，看书报只看与教材直接有关的部份，甚至只看教学参考，习惯于照抄照搬。语文教材很多是文学作品，教师不懂鉴赏，就不能深入作品的底蕴，就不能吃透教材。这样怎么能提高教学质量呢？我建议教师们读读这本书。它会打开你的眼界，启发你的思考，引导你进入艺术鉴赏的殿堂。你的鉴赏力提高了，你的语文教学的质量才有提高的可能。

什么是审美鉴赏？怎样培养审美鉴赏力？该书的第一辑《味的美学》从多种角度、从不同的方面给予解答。如果说

第一辑解决了一些方向性、知识性的问题，第二辑《文心发微》的作品赏析则可以看作是示范性的运用。这一辑涉及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等多种文学体裁。第三辑《艺苑寻幽》更推广到戏剧、绘画、书法等艺术的鉴赏与评说。其实，第四辑第五辑的文章也或多或少、或隐或显、或直接或间接地与第一辑所讲的原则、原理、方法相关联而有了灵活多样的发展。总之，就我看来，这本书虽没有严密的体系，却也浑然一体，都和鉴赏有关，假如题为《鉴赏趣谈》也似无不可。

但是，这本书和一般的教科书又是迥然不同的。它的语言生动活泼，挥洒自如，具有情趣和理趣，可读性强。由于作者的博学多闻，联想丰富，他能够旁征博引，左右逢源，使你在审美的享受中获得启发与教益。他所标榜的“味的审美”，源出于日本学者笠原仲二。笠原仲二认为中国人的审美意识是从味觉开端，何西来根据中国古典美学对“味”的强调而加以发挥，构成他的鉴赏理论的特色。他强调鉴赏记忆，还提倡作鉴赏笔记以补记忆之不足。这种记忆不同于书本的记忆，而是有声有色有形有情有境的鲜活体。所谓“观千剑而后识器”，正是这种鉴赏记忆长期积累的结果。他谈鉴赏要“入迷”，也就是鉴赏要投入，要有一种情感体验。这不同于纯理性的思维。他讲命题的研究，这本书许多文章的命题他都是费了一番心思的，如《做在脚上的文章》、《锯齿上的情思》、《智慧的炼狱》、《美寓于偶然之中》等都是新颖别致、饶有趣味、耐人琢磨的。此外，就全书说，既有微观上的体察入微，又有宏观把握的恢宏博大，同时并存，相映成趣，更显示出本书的摇曳多姿，丰富多彩。当然，如

果作为一本通俗读物看，则略有微疵：有少数文章征引古籍较多，语言略有些艰涩，学力较差者可能有阅读障碍。但总体看来，这是一本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好书。

1996年国庆节

《何日君再来》与《流亡三部曲》

近日看一本书，偶然间得知《何日君再来》与著名抗战歌曲《流亡三部曲》同出于音乐家刘雪庵之手，不禁大吃一惊。原因是我在读高中时，接近地下党，早听说《何日君再来》是黄色歌曲，所以虽然在大街小巷经常听到广播这支歌，无意间把曲调都听熟了，却始终没有唱过。解放后这支歌和别的“黄色歌曲”一样，销声匿迹了。改革开放以后，偶然又听到这支歌，似乎与时下一些流行歌曲相似，为我所不喜欢。至于《流亡三部曲》，我从小就学会，感情大不相同。去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全国各地到处唱起了《松花江上》。年轻的朋友不一定知道，这《松花江上》是《流亡三部曲》的第一部，其二、三两部不如第一部知名，传唱不那么广。其实，我认为，《三部曲》是一个整体，全部唱完比单唱第一部好。第一部《松花江上》情调低沉、伤感，二、三部逐渐变得高昂，结尾达到最强音；虽不如《黄河大合唱》结尾的《怒吼吧，黄河》气魄那么雄伟，但确也表达了中华民族抗敌御侮争取民族解放的坚强意志。

那么，《何日君再来》是不是黄色歌曲呢？1957年反右时，刘雪庵被划为音乐界的右派，据说还有人批判作者是盼望蒋介石再来。他竟然忘了这支歌曲早流行于三十年代。对

于这种荒谬年代的荒谬批判姑置不论，这支歌曲是不是应该否定呢？这个疑问使我产生了认真感受一次的愿望。我第一次坐在家里的一部旧风琴前弹唱这支歌曲：“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今霄离别后，何日君再来……”我边弹边唱，浮想联翩，想到人生几十年，有多少悲欢离合，多少生离死别，多少梦魂萦绕，多少相思泪痕……，所以人们珍惜好花好景，珍惜相聚的欢乐，唱出“人生难得几回醉，不欢等何待”，这不是醉生梦死，又何“黄”之有、何罪之有呢？

经过许多年的风风雨雨，在人生旅途上我似乎有所感悟。我想到鲁迅曾说过：战士不能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战斗。（大意）革命者也有真挚的亲情、友情、爱情。那么，写过《流亡三部曲》的刘雪庵，也写了《何日君再来》，正是人之常情，不足为怪。

有感于“小霸王”之类

中央电视台每晚都有“小霸王学习机”的广告，起初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和思索，后来又发现儿童吃的糖果有“小霸王”“小皇帝”的牌号，这才引起了我的深思。

为什么要取“小霸王”之类的名称呢？难道我们今天的少年儿童就是小霸王、小皇帝，或者期望他们成为小霸王、小皇帝？无可否认，现在独生子女愈来愈多，他们在父母和长辈的娇惯下，常常就是家里的“小霸王”“小皇帝”；但这不是正确的教育，更不是我们对下一代应该有的期望。

学习机和糖果的制造商也许认为，随便取个名称，这有什么关系，何必大惊小怪。他们全然没有想一想这样的牌号对儿童可能产生的心理影响。当孩子们玩着小霸王学习机、吃着“小霸王”“小皇帝”糖果的时候，他们可能想到他们就是小霸王、小皇帝，于是就会愈发任性和自傲。即使他们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们经常与“小霸王”之类打交道，耳濡目染，也会潜移默化地起一种消极作用，妨碍他们接受正确健康的教育。陶行知说过：生活就是教育；什么样的生活就是什么样的教育。所以我们不能把这类事情看成鸡毛蒜皮的小事而等闲视之。奉劝学习机和糖果的制造商，不要见利忘义，还是换一个牌号为好。

1995.5.24

“父母官”乎？“公仆”乎？

十几年前，打倒“四人帮”不久，因某种机缘与一位县长结识。此人能干、健谈，我对他印象不错，但接着听他在大会上的讲话，以本地的“父母官”自居，津津乐道地谈他的“政绩”，却使我大倒胃口。记得1949年解放前夕，我在川南仁寿做地下工作。当国民党军队溃退，仁寿县城成了真空，地下党县委出了个“安民告示”，一开头就称“父老兄弟姐妹”，何等亲切！陈毅将军有一首诗我只记得两句：“我是你的好儿郎，革命强中强！”你“指人民”陈毅自称是人民的好儿郎，老百姓是他的父母。人民政府的干部，还有个人所共知的称呼曰“公仆”。可是这位县长却沿用封建社会的称谓，洋洋自得地自称人民的父母官，这与“好儿郎”、“公仆”相比，相去何止万里！简直是作了完全的颠倒。旧社会有个说法：“百行孝为先”；“只有不是的儿女，没有不是的父母。”父母可以随意打骂孩子，而孩子不能有丝毫的反抗，此之谓“孝”。我们的这位县长竟是这样理解自己和人民的关系，真是可叹！

殊不知我这是少见多怪！随着时间的推移，“父母官”作为地方官的代名词，竟逐渐推广开来，听人说得多了，甚至居然上了报，上了中央电视台。想想这也难怪。父母总还

是疼爱孩子的吧。那么，老百姓只能寄希望于“父母官”对自己的疼爱，当然就谈不上是国家的主人了。

记得我在蒙冤受屈、走投无路时也曾给某领导写信，捧之为“社会主义”的包公。我是希望有一位包公来平反冤案，为民作主。我的头脑也存在着严重的封建意识。包公是封建时代的清官，怎么能与“社会主义”挂上勾呢？

“为民作主”与“人民作主”，一字之差，天渊之别。愿人民的公仆早早认清时代，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要再高高乎在上地以“父母官”自居了！

谈语言的商品化

任何一种语言都不是凝固不变的，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语言也会发展变化。这主要是指新的词语的出现和词义的变迁。特别是在一个社会处于变革和转型的时期，这种变化比较明显。新中国建立初期，“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们都有此感受。

这本来是合乎规律的事。在这种发展变化中，我们的汉语词汇会更加丰富起来，更富于表现力，更加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词义的变迁也反映了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取代旧的价值观念。可是，在这种变化中，也可能出现某些不健康的倾向，例如，时下颇为时髦的语言的商品化就是一种不健康的倾向：商品要“推销”，人的求职也成了推销自己；商品要讲究“包装”，人也要讲究“包装”。电视连续剧《礼仪小姐出租公司》中的“礼仪小姐”居然也可以“出租”，虽然现实生活中我还没有听说过有这种名称的公司，编导者可能是为了追求一种喜剧效果。但总而言之，这种语言倾向显示着：人成了“物”，成了一种商品。在这里，人的主体性不见了，人异化成不是人的东西。

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早已指出：全民经商是要不得的。可是实际上，商品意识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次，各个角

落，成为社会主义大厦的一种强烈的腐蚀剂，就连我们本应是一片净土的校园，就连天真烂漫的小学生也不能幸免。语言的商品化，不过是商品意识的泛滥成灾的一种表现而已。

鲁迅早在本世纪初即曾呼吁精神界之战士。今天更需要有大批的精神界之战士，起来抵制这种商品意识的泛滥，抵制语言的商品化，保卫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

在内江市纪念陶行知 诞辰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今天，我作为一名陶行知先生的学生，参加我市纪念陶行知先生诞辰 100 周年的大会，心情是很激动的。四十五年前我在育才学校社会组学习，曾经直接间接受到陶先生的教诲。四十五年过去了，陶先生的音容笑貌，到今天记忆犹新，陶先生的伟大人格，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育才学校是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存在的一所革命的学校。尽管处在周围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中，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毛主席著作。我在育才学校时间不长，但是在那里奠定了我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基础，成为我一生中一个真正的起点。在育才的学习生活中，我知道，陶先生同中央南方局、同周恩来同志，关系是很密切的。陶先生是毫无保留地接受南方局和周恩来同志（我们当时称周副主席）的领导。我们育才的地下党支部，是南方局直属党支部，支部书记廖意林同志（我们称为意姐）是南方局直接指派的。党支部的任务就是帮助陶先生办好育才学校，党对他没有保密。同时，重庆市管家巷 28 号育才学校办事处，实际就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一个联络点。当时，各地党组织输送干部到解放区，都是经过这个联络点，从这个联络点出发的。所

以，周恩来同志说，陶先生是毫无保留地追随中国共产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是有大量事实根据的。许多人还不了解陶先生和我们党的这种密切的关系。这里我还要提到，周恩来同志、邓颖超同志曾多次到育才学校看望陶先生，同育才师生谈话。有一次，周恩来同志告诉育才师生，党中央已经决定，新中国的第一任教育部部长就是你们的陶校长。当时全体同学都欢呼起来。实际上，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陶先生的教育方针，就已为解放区所采用。李鹏同志在 1946 年《晋察冀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谈到过一点。那么，为什么在新中国建立以后，陶先生的教育主张没有得到普遍推行呢？为什么到今天，还有许多人不了解陶先生呢？这是因为建国初期对电影《武训传》的过火批判，株连到陶先生，因为陶先生曾经称赞过武训，赞扬过武训做乞丐也要兴学的精神，后来有些人就批判陶先生，认为他是教育救国论，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这完全是对陶先生的误解。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才有了正确评价陶先生的可能。但是，有些人长期以来形成的偏见，短时间还不容易转变过来，一直到 1981 年，我到成都参加四川省陶行知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的纪念大会，陶先生过去的同事、学生，还为这件事大事呼吁，因为当时还有人写文章贬低陶先生。现在，十年过去了，四川省陶研会，由一批陶门弟子发起，1981 年就成立了。育才学校、社会大学校史研究会成立得更早，我记得是 1979 年成立的。各省市的陶研会也陆续成立。特别是 1985 年，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基金会在北京宣告成立了。中央领导同志表了态，彻底恢复了陶先生的名誉，重新肯定了陶先生是一个伟大的进步的

教育家、教育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爱国者。胡乔木同志在中国陶研会成立大会上讲话，说 50 年代对武训的批判是粗暴的，过火的，对武训这个人应重新评价，对陶先生的株连是错误的。这样，学陶、师陶和陶研活动，才蓬勃地开展起来。人们终于认识到，陶先生的教育思想是革命的教育思想，陶先生的教育实践是革命的教育实践。特别可贵的是，陶先生的教育思想，充满着社会主义精神，而且是在中国的土壤上产生的、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论。这一套理论系统、全面，博大精深，而且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做基础。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没有任何一位教育家能够与他相比的。我们有这样宝贵的精神财富，为什么不应该好好地学习、继承并使之发扬光大呢？这次，我参加四川省纪念陶先生的大会和会后召开的省陶研会工作会议，听到中国陶研会领导同志和省里领导同志的许多指示。省教委主任、四川陶研会第一副会长卢铁成同志说：“有人说，我国的教育家很多，为什么只学陶行知？还有人说，今天的教育实践已超过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为什么还要学习陶行知？”卢铁成同志强调地说：“这是由于他们对陶先生缺乏认真的学习，系统的了解，如果听一听昨天的大会就不同了。如果对陶先生有了真正的了解，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陶先生的教育理论与马克思的教育思想，与党的教育方针是一致的。我们应该继承前辈的遗产，才可能结合今天的实践加以发展。”四川陶研会会长、副省长韩邦彦同志说：“昨天的纪念大会起到了动员会和讲授会的作用。我们的时代需要像陶行知先生那样高大完美的典型。我们今天讲教育方针，要联系

陶行知这个光辉典范来讲。各级学校，特别是教育学院、师范院校，要把学陶、师陶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中国陶研会副会长、四川陶研会名誉会长胡晓风同志说：“杨汝岱同志本来是要参加纪念会的，但他有出国任务，到古巴去了，他感到很抱歉。今后我们宣传陶行知，要以杨汝岱同志的题词为指导。这是杨汝岱同志为《陶行知教育思想与合川教育整体改革》一书所写的题词：‘学习陶行知言行一致，继往开来、实事求是的革命精神，弘扬生活教育理论，开展创业教育试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民教育体系，迎接未来二十一世纪。’韩邦彦同志和胡晓风同志都谈到，只谈“教书育人”是不够的，还必须加上一句“育人创业”。创什么业？创社会主义之业。这样，目标更明确了。

全国的陶研工作，在近几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是同中央的倡导、支持分不开的。四川在全国来说，是走在前列的，四川的成绩，是同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是同省教委的积极支持分不开的。正如中国陶研会常务副会长方明同志所说：“党政支持是学陶、师陶活动顺利开展的必要条件。”他说：“上次我到成都来，还没有看到教委同志同陶研工作结合得这样紧密，这使我感到很兴奋。现在，全国学陶、师陶活动的形势很好，十一个省市教委发了文件，教育工会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你们四川的工作起到了示范的作用。听了合川、内江、绵阳三个地区的汇报很满意，很受启发。”卢铁成同志还要求各地教委要支持陶研会的工作，使他们在学陶、师陶活动中起骨干作用。他还要求：今后在教育行政干部的培训中，在师资培训中，都要讲陶行知的理论，陶行知的思想、人格，使陶研工作后继有人。

我们内江市陶行知研究会，两年多来，也是在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下，作了一些具体的工作；特别是今年的纪念活动和学陶、师陶活动，更得到市教委的有力帮助和市教育工会的密切配合以及各方面的广泛支持，特别是我们的挂靠单位内江教育学院领导经常的大力支持。在此，我代表市陶行知研究会，表示深深的感谢。限于条件，我们作的具体工作不多，这次在省里汇报，得到中国陶研会领导、省里领导一致肯定的有一点，就是我们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晓风同志说，这就是陶老夫子的精神。我们今后还要坚持和发扬这种精神。中国陶研会和省里领导都重视扩大陶研队伍，培养新生力量的问题。我们希望有更多志同道合的同志参加到陶研队伍中来。我们欢迎你们成为市陶研会会员。我们希望，全市的学陶、师陶活动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起来；我们希望我市的陶研工作，出现一批真正有水平、有份量的科研成果。同志们，让我们继承和发扬陶行知先生“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无私奉献精神，为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培养又红又专的一代社会主义新人，努力工作吧！

1991年

漫谈人生理想

—— 1997.3.4在行知实验学校教职工大会讲

—

一般人都有理想，特别是青年。我要做个什么人？我的人生理想是什么？我校一位教师，她的男友要她结婚后辞去工作，当家庭妇女，可她断然拒绝。很好，有骨气，有理想，自尊自爱，自己的人生追求。

三八节快到了，在此，我提前给我们的全体女同志表示敬意和感谢，感谢你们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为我们学校的教改实验，辛勤劳动，并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中国妇女的解放是经历过一个艰难的斗争过程的。以前，女子无才便是德，根本不要女孩子读书，然后是反对男女合校；毛泽东讲的四条绳索（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就有一个“夫权”；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女始终没有独立地位，没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新中国成立后，妇女才得到彻底解放。但是封建思想始终还盘踞在一些人的头脑里。像刚才说的那个人大男子主义，把妻子当成自己私有的东西，我们要坚决反对。我们的女同志一定要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权利，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和人生理想。

二

理想是什么？因人而异，各不相同。当前的不良风气影响了一些年轻人。有些人就把发大财当作自己的人生理想，认为金钱万能，有钱就有一切。

我过去有一个同事，他的儿子发了大财，他在成都郊区修了一幢漂亮的别墅，可是他不敢搬进去住。原因是怕有人绑架，说是雇了几个保镖也不安全。我校过去也有家长，一天心惊胆颤，生怕他的孩子被人绑去。这样，的确活得太累了。

一个富翁死了，几个儿子争夺财产，造成家庭不和；还有人图财害命，为钱丢了命。有钱真是好事吗？不见得。

和金钱万能的观点相反，有位哲人对一个富翁说：“你穷得只剩下钱了。”除了钱，一无所有。这是两种完全相反的价值观。

孔子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说人的基本需要有七种，宝塔式地上升，最基础的一层是生理需要。而吃饭，是第一需要。连饭都吃不饱，还不改其乐，使人难以理解。这是精神的丰富战胜了物质的贫困，所以孔子赞美他。这也是审美人生观的一种体现。四川人有句土话：“穷要穷得新鲜，饿要饿得硬走。”

过份追求名和利的人，常常是适得其反。有成就的人都是淡泊名利。范仲淹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日本最近

有本畅销书《清贫》，讲的也是精神生活远比物质生活重要。

“知足常乐”。这个“足”指的是物质生活。我在落难的时间，住在贫民窟式的房子里，我也感到满足。我想，我国众多的贫苦的农民还吃不上白米饭，我还有饭吃，有什么不满足呢？

我祖父有副对联：“到底存些真面目，好生挺着穷骨头。”这是中国知识份子的好传统——穷骨头精神。——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

过去，我们的社会把人都塑造成“政治人”；现在，许多人都成了“经济人”。这些都是畸形的人，不是正常的、健康的人。

做人要做一个具有完整人性的人。我对美的定义是：“美是人性的实现”。

三

我们的理想应该是什么？

你想当什么都可以。马斯洛把“自我实现”当作人的基本需要的最高层次，即人生理想，也就是自我潜能的充分发挥。但“自我实现”并不只是为自己，“自我实现”是要在社会中实现自我价值，是要把社会的需要转化成“我”的需要，把社会的要求变成“自我”的要求。这里有一个社会责任感的问题。

我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近代先进的知识份子都把“救亡”和“启蒙”作为自己的社会责任，把建设一个独立、富强、民主的国家作为

自己的理想。他们有的是“实业救国”，有的是“教育救国”或“文艺救国”。中国共产党则把反帝反封建、武装夺取政权，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在将来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的理想。

陶行知起初是教育救国论者，建国初期受到批判，殊不知陶的理想已经发展，他办的学校育才、社大，为革命培养了大批干部。鲁迅的理想，先是做医生，让中国人的身体都强壮起来；后改为从文，是因为他认识到，精神比肉体更重要。他是根据他个人的特长来确定他的个人理想的。

高中生一般都以考上大学为理想。你们失败了，带着心灵的创伤来到我校。我告诉你们：条条大路，都通罗马，自学可以成才，在教育工作中可以实现自身的价值。但你们的情况并不一样。有的人走了，你们坚持了下来。这是正常的。鲁迅看赛跑，不称赞跑第一名的人，而称赞跑在最后一一直坚持到底的人，为他鼓掌，称他为“中国的脊梁”。这个要害就是“坚持到底”。现在，三年半过去了，你们心灵的创伤已经平复。你们已经正在成为合格的、甚至优秀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也许你们原来并没想过当教师，你们有另外的个人理想，但只要有一个为国为民的崇高思想，个人的理想是可以改变的。鲁迅、郭沫若起初都想当医生，后来都成了文学家，他们个人的理想变了，但崇高的为国为民的理想没有变，都为祖国和人民做出了伟大的贡献。我从小爱好文学和音乐，曾想当作曲家，16岁时写了《反内战进行曲》。

17岁报考艺专音乐科，考上了，父亲不让去。进了华大，偷偷学钢琴，没有条件，终于放弃了。14岁开始发表诗歌，18岁有一本诗集将要出版，后书店被查封，没出成，我又

想当诗人。但我又爱读理论，又想当文学评论家。这些都是个人的理想。但读了革命理论和革命文学作品，立志参加革命，入党以后以身许党，把革命当成最高理想。为了党的需要，放弃个人理想。解放以后，当了团的干部，不久又调到学校当教师，那是一种惩罚，我却爱上了教育。我教语文，读文学书，研究文艺理论是正道。我又把它当作理想了。

1957年反右挨整二十多年，落实政策后，爱教育爱文学不变。不愿当官。十几年来，有了一点成绩，但比起我的理想来，差距还很大。自从当了这校长后，又把办好这个学校作为我的理想了。

由此看来，一个人为国为民的崇高理想、社会责任感永不能变，个人的事业、理想，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可以和应该有所变化。即使你以前没想过当教师，只要你确立了这个理想、目标，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也可以达到实现自我价值的人生目的，成为一个优秀的、出色的、学者型教师，成为一个教育家，为国家、为人民作出巨大贡献的。

当前，“科教兴国”已是全国的共识，而科学技术人才也要教育来培养，所以，教育是立国之本。教师是人人尊敬的职业。愈是文明的社会，愈是尊重教师。我们要以教师的职业而自豪。教师的待遇也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提高。作一个教师，既可以实现自我的价值，又可以造福于人类。我们不是先富裕起来的那一部份人，但是当我们想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即使我们“后天下之富而富”，只要我们有崇高的精神境界，我们会感到充实和富足。

《灰色黄昏》点评

读罢《灰色黄昏》，你会感受到一种美渗透着一种淡淡的哀愁，使你留连忘返，又使你无限怅惘。

山村是美的，那里有“小溪的清冽”，有“滚壮的螃蟹”，有“如烟的雾霭”，有“戏耍的鸟们”，还有“黑红黑红小灯笼似的四月泡”。姐姐是美的，从弟弟的眼睛看来，姐姐的颈脖“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那里有春、夏、秋、冬各不相同的芬芳；姐姐的动作是美的，“姐姐的手巾在水中鱼似的摆来摆去。”但是，最美的还是姐弟之间的情意美。这里并没有什么感情直露的话，几段对话，几个动作，把弟弟的童稚的依恋和渗透着母爱的姐姐的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在描写姐弟的纯真的感情之中，作者敢于大胆地描写弟弟那幼稚的性意识：弟弟把姐姐的裤脚挽起来，那里“便成了他想象中的神秘王国。”姐姐隆起的胸脯，激起他想“去摸”的欲望。而姐姐的温柔的责备中，又分明洋溢着性的觉醒、青春的喜悦与少女的羞涩。这一段文字使姐弟二人的逗乐跃然纸上。这里，作者显然受到弗洛伊德思想的启迪，但是写得自然而富有情趣。作者追求的是人性的诗意美，没有低级庸俗的东西。由此也可以看出：要展现丰富的个性，

不能排斥性意识的描写，写得高雅或者写得低下，取决于作者的人品与审美修养。

《灰色黄昏》的语言也是美的，作者对语言的锤炼颇具匠心，而并无斧凿的痕迹。例如，“姐姐幽幽地看着他，长长地叹口气。长长的，如一根线，缠着一颗心，缠着一个思念，缠着一个谜。”这里，显示着作者感觉的敏锐与丰富的想象，由一点漫延开去，大大丰富了语言的容量。“如水的日子在姐姐的背脊上悄无声息地流过，也一点一点地舔去他鼻梁上的稚气。”“稚气”在鼻梁上，把“稚气”具体化了，形象化了。“舔”字又用得多么别致，多么生动。对那个“吹唢呐的汉子”两颊上的麻子的描写，则是“有如多事的老鼠恶作剧地遗下的几粒排泄物”，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弟弟对带走了姐姐的姐夫的厌恶。

然而，总体看来，《灰色黄昏》弥漫着一种哀伤，一种孤独，一种惆怅。以哀愁始，以哀愁终。回忆中的欢乐更衬托了现实中的哀愁。美在哀愁中透露出来，构成了全篇的诗意美。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是贫穷、落后的中国农村妇女的悲剧，正是如鲁迅所说“近乎无事的悲剧”。这里看不出鲜明的时代的历史的背景。然而，可悲的正是这一点：近百多年来中国虽然经历了反反复复的变化，然而在广大的偏僻的农村，中国古老的自然经济并没有多大改变，中国传统的深层文化更牢固地桎梏着勤劳善良的中国人民，中国劳动妇女仍然在走着祖祖辈辈无法逃避的路。在这里，作者并没有廉价的乐观，而是含蓄地给我们带来一种思索，让我们自己去寻觅答案。

附录： 灰色黄昏

黄程堂

夕阳。

一条路从夕阳下爬来，草蛇般溜进山谷，蠕向山峦。

他坐在路旁，呆呆的，一支瘦瘦的菊花从他支开的两腿间钻出，蔫蔫的，满腹心事的样子。

实实在在记不清，这已是第几个黄昏；实实在在记不清，眼眶曾有过几回潮湿，倒是记得，姐姐出山时，走的就是这条路。

姐姐是被如哭似的 唢 呐声牵走的，那吹唢 呐的汉子实在是有气势，一路不照死活地吹，吹！点缀在葫芦样圆滚的两腮上的麻子有如多事的老鼠恶作剧地遗下的几粒排泄物。他拉着姐姐的衣角，木木地走。荷包里的东西不时拍打他的大腿，那是姐姐悄悄塞给他的鸭蛋，红红的，像天边的霞，像坡上的映山红，像姐姐的脸。姐姐今天过年似的，衣换了新的，裤换了新的，连头发也似乎换了，滑黑滑溜得使人手发痒，想去摸摸。却总也不明白，姐姐的眼里为什么滚动着露珠样的东西。

“姐，你哭了？”

姐姐点点头，又摇摇头。

“姐出嫁一定要哭吗？”

“嗯。”

“草根的姐姐出嫁就没哭还笑哩。”

“……”

“姐，你还回吗？回时，可别忘了带一包荷梨。
你说过，给我好多好多的梨。”

姐姐幽幽地看着他，长长地叹口气。长长的，如
一线 缠着一颗心 缠着一个思念 缠着一个谜。

姐姐一定会回。他想，她怎舍得那一线小溪的
清冽，和溪中壮滚的螃蟹？

唢呐声在土路上滚来滚去。

如烟的雾霭溢出山谷，自在地弥漫开来。一溜
小风滑过，鼻前便有了丝丝香气流连。

这是来自姐姐颈脖的香。姐姐颈脖黄黄的，和
屋后的泥土一个颜色。那可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春
天，有油菜花的芳香荡漾；夏天，有稻花的清香飘
溢；秋天弥留的是油菜花的香甜；冬天流动的是热
烘烘的干草气息。

不知有好多回，他醉在姐姐的颈脖上；不知有
好多回，姐姐用不太丰厚的背驮着他，在田埂上默
默地走，走着自己的人生。如水的日子在姐姐的背
脊上悄无声息地流过，也一点一点地舔去他鼻梁上
的稚气。时常，姐姐一手提篮，一手牵他溯溪而
上。溪旁追逐戏耍的鸟们不时逗弄他停步凝视，而
那一串串黑红黑红小灯笼似的四月泡则泛起圈圈诱

人的涟漪。

“姐 我要吃泡泡。”

“馋。”姐姐摘下几串。“吃罗。”

他笑咪咪地撮下一颗，扔进嘴，啧啧，才甜！
又嚷，还要还要。

姐姐又摘下几串，尔后拿镰刀挑一萼萼他叫不出名的肥肥的野菜，断断续续地，风把姐姐的歌声扯向远处。

“姐 你唱歌？”四月泡吃完了，他挺着小鼓样的肚子晃到姐姐身后。

姐姐吃吃一笑，带他下溪，把手巾浸湿，在他嘴上慢慢地擦。姐姐的手巾在水中鱼似的摆来摆去，姐姐的影子在水中蚯蚓似的拱来拱去。蓦然发现，姐姐的胸脯不可思议地隆了起来。莫非……他有些不放心，去摸，姐姐红着脸迅速拨开他的手。

他很失望。“姐 那摸不得的东西是宝贝？”

“羞。”姐姐在他鼻梁上一刮，“告诉你 姐姐大了。”

“大了就有那东西？”

“你……坏死了。”姐姐轻轻拍拍他的脑壳 甜甜地、羞羞地笑了。

夕阳被山一口一口地啃着，只啃剩残缺不全的巴掌大一块了。一个女人匆匆在他面前擦过。匆匆的，长而宽的裤脚清扫着路，扬起团团浮尘。

姐姐的裤脚可比那女人的裤脚要短，一旦挽起来，便成了他想象中的神秘王国。

上学后，老师的教鞭拴住了他的“自由”，更懊恼的是，一见书上那弯弯的叫“拼音字母”的东西他就昏昏欲睡。唯一惬意的便是放学后立在村头的苦楝树下等姐姐。

姐姐总是落在别人后头，姐姐总要背点什么东西，一步一步走来，很是艰难。常常，隔老远，他就扑上去。

“姐，有蝈蝈吗？”

姐姐抿嘴笑笑，让他猜。

他猜不着，抱住姐姐的腿，一层层地放姐姐挽得高高的裤脚。冷不防一只蚱蜢麻利地弹出，一跳一跳地跳向远处。他也一跳一跳地追，于是一行歪歪斜斜的脚印和一团团笑就会丢了一地。

姐姐微笑着看他，微笑着拍他书包上的灰尘，微笑着抽出书，轻轻地压蛋卷般卷起的书角。

“姐，你识字？”

“姐，不识字。”

“姐，想不想读书。”

“想。”

“为什么不读？”

“姐命苦，没读书的福气。”

“不读才好，老师狠呐！天天逼你背书背书做作业做作业，上课想睡一觉也不行。”

“老师是为你好，读出书来好做人。姐给你讲

个故事：从前，有一个书生很穷，很穷，穷得灯也点不起……”

他记得，母亲也曾讲过这个故事。可不知为什么，母亲那次出远门后再没回来。姐姐接着母亲的故事讲下去，也操起了母亲丢下的一切。“咯妹子苦！又当姐又当娘。”姐姐身后总有如此叹息。

姐姐确实苦，肩上几乎没有离过扁担。一根一根的青竹扁担被姐姐的肩头打磨得成了古铜色。有许多东西等着姐姐挑，姐姐为这世界挑了好多好多东西。姐姐，挑、挑，挑着种田人的劳累、希冀，挑去了少女的憧憬，青春。姐姐还要喂猪，还要洗衣，有时还要服侍半条性命的父亲……

“姐，累么？”他抚摸姐姐老茧垒垒的手，心疼地问。

姐姐痴痴望着远山，默默无声。良久，姐姐问：

“想跟姐姐走么？”

“哪去？”

“出远门。”

“爹也去吗？”

“……”

夕阳终于化了，化在山的腹中。

有牧童的口哨声隐隐吹来。有腆着肚子的牛悠哉游哉踱来。有成对成对的鸟飞过。

雾霭在变浓，变浓，浪一般排来，淹没路，淹没姐姐的足迹，淹没……

（载《未来作家群》总2期）

有感于一位离休干部的自杀

从深圳度假一月归来，一位朋友在电话里告诉我一个新闻：“夏非死了！”这使我吃了一惊。几个月前，我在一次离休干部活动中还见到他。他仍然是面带微笑，亲切和蔼的样子。没见他身体有什么毛病，怎么就死了呢？

“怎么死的？”我好奇地问。

“一时说不清。”朋友回答，“明天我到你家里来摆龙门阵，详细告诉你。”

第二天，这位朋友对我娓娓道来：

“夏非同我们不同。我们退了以后，没什么失落感，可是他是官，就不同了。平时颐指气使，有人恭维，手中有权，可以呼奴使婢，谁敢不依。这下退了，没人奉承他了。他又没本事，更没理想，找不到发挥‘余热’的机会，所以精神抑郁，患了抑郁症。曾有一次想寻死，吓得她妻子把什么绳索、刀子都藏好了，又哀求他不要死。他在成都远郊筑了一幢花园式的住房，不愿接触一切人。不料他的儿子正当官运亨通，似要飞黄腾达之际，又犯贪污罪判刑。这再一次给了他一个沉重的打击。他的抑郁症更加严重了。

“有一天早上，他的妻子做好了早饭，没见他散步归来，到处寻找，终于发现他在自己的家里悬梁自尽。没有绳索，

仅仅用了一根废弃的电线就吊死了。”

想不到夏非这个红极一时的笑面虎竟落得如此下场。

朋友说：“我们最近同几位老友摆龙门阵。你猜是什么话题：‘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我补充一句：“若是不报，时候未到。”我记得若干年前，成都的一位评论家来这里做学术报告，他竟然也讲了这样的话。

夏非是一个笑面虎。对上级，他笑，这是谄笑；对同级，他也笑，这是伪笑，可能就是笑里藏刀；对下级，他也笑，这是一种居高临下的笑，带有一种强烈的优越感，使你感到是一种恩赐。我在某些“首长”或“非首长”那里领教过这种最令人不能忍受的笑。说夏非是“笑面虎”，因为他在“笑”的背面隐藏着一种阴暗心理，一种狠毒，甚至是一种杀机。

如烟的往事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妻子曾对我说：“我在师范学校毕业后正等着分配。那时，我是优生，许多同班同学都分配走了，老师们劝我不要急，说我一定会分到市里的重点学校。那一天要宣布结果了。我到了文教局，在办公室门外听候消息。原来文教局确实已经把我分到了一小（全市重点学校），这时夏非来了。他说，像这样的家庭出身的人怎么能分到重点学校。文教局长不得不服从宣传部长，于是，把我分到了一所设备简陋的乡村小学。”

当然，在那个时代，地主子女无论怎么优秀也不能成为培养对象。父亲的社会经历要由子女来承担责任。这还不能怪夏非，只是他认真贯彻了“左”的政策罢了。

我和夏非在解放初期都各在一个县做团的负责人，后

来，地下党受压，我在川南党校无端被开除党籍，作为一种惩罚，被调到一所中学教书；夏非却官运亨通，升为市委宣传部长。两人的地位已经悬殊，幼稚的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却仍然认为过去都是团干部，还有些老交情，反右斗争前夕，我以一个老同事的身份去看望他，没有把他当成一个上级。谈话间有些无礼，说到我们那位校长，表现了对“外行领导内行”的不满。话不投机，笑面虎的笑容消失了。进一步，矛盾尖锐起来。他说：“你有话到政协会上去说，让你有说话的地方。”幼稚的我不知道这是“引蛇出洞”的“阳谋”，竟悍然地回答：“好嘛，什么地方我也敢说。”

政协会开过了，想说的话也在大会上说了。不料反右运动很快就开展起来，我受到批斗，心里不服，去找夏非。他正是领导全市中学教师反右运动的头儿。我说：“批斗我不怕，但要讲事实，讲道理，要允许我说话，要以平等态度待我。”这时，笑面虎的笑一点也看不见了，他沉下脸，狠狠地说：“对右派份子还讲什么平等！”

我被打成了右派。更痛心的事还在后头。1958年4月4日，学校开大会，宣布我是反革命份子，有人捏造了我镇压学生运动，逮捕学生的罪状。从此颠沛流离，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备尝非人的待遇，达二十年之久。妻子受我的牵连，又一次被贬到偏僻的乡村。至1974年，我提出申诉，找到了当年法院审判我的审判员王正言。王说：“判你的罪，是五人小组决定的。通过法院，只是一个形式。我们根本无权更改五人小组的决定。”学校系统五人小组的负责人正是笑面虎夏非。

我的妻子生了三个孩子。由于我的罪过，产后没有条件

充分调养，住的都是潮湿的地方，因此得了风湿病。记得六十年代我从劳教归来以后，因住房很潮湿，妻子曾以风湿病为由，请求学校换了一间干燥一点的房间。这房间靠近大门。有一天，宣传部长夏非不知为了什么事到了这所乡村小学，他看到了我。他走以后，支部书记张义俊就对我妻子说：“夏部长指示：你必须换一间房子，说反革命份子住在大门边不安全，我还挨了批评。”

于是，我们只好又搬家。这次搬家就更惨了，搬到了操场边一间孤零零的危房。一天下雨，房屋到处漏雨，用尽了所有一切可以装水的用具也不够用。晚上下了雨，早上起来，放在床下的鞋子全部在水中飘浮，满屋都灌了水。后来，校长怕危房倒塌，才叫妻子又搬回到原来那间潮湿的房子去住。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的冤案得以昭雪，后来调到了教育学院。真是冤家路窄，夏非又调来当了副院长。我们相对无言。夏非竟没有一句抱歉的话。由于他在学院争权夺利，对教师无礼，最后终于走了。他的党委书记的梦归于破灭。

这以后，我们都成了离休干部。我们在一起开会，见面时他对我还是客客气气的。官架子没有了，仍然是面带笑容，已经不是谄笑和优越感的笑，但是很难说是真诚的笑。我们俩之间，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他也仍然没有一句抱歉的话。我几次想提醒他：应该对过去的行为作一点反思，但仍然克制住了。我想，人应该宽容，那时他的作为，在那样的政治环境里，也是不奇怪的。但是我又想：同样的政治环境，有的干部（如当时的文教局长）仍在千方百计的保护

无辜，你又何苦要雪上加霜呢？

夏非和他的笑都已经消失了。他在死前，是否会因为制造了一些冤案而内疚呢？不得而知。不过，我想，如果他能够反思自己的错误并且有道歉的表示，也许会减轻一些他为权力丧失的苦闷和他内心的不平衡，因而不至于悬梁自尽吧。

奉劝那些有类似错误的朋友以此为诫。

1999.3.7

写完这篇文章以后，听到一种对夏非的死的不同说法，说他是对现状不满而死，忧国忧民而死。我想，如果真是忧国忧民，为什么不在“史无前例”的文革或更早一些时候悬梁自尽？在改革开放二十年以后，在一切都有了转机，中国正走上“依法治国”的道路，这样的现实，难道比“文革”还更糟，值得你去“慷慨就义”么？真使人不可思议。

3.17补记

（作者附注 为了厚道和避免麻烦，夏非”用的是假名。）

情 系 教 苑

主体意识的觉醒

——读绿地文学社的一束稿件

前几天读了姚雪峰的短篇小说《古城》，不胜欣喜，小说大胆地触及当前体制改革中一个无人涉及的尖锐问题，比较充分地体现了作者主体意识的觉醒。于是，当绿地文学社的负责人拿来一束即将付印的稿件，要我任意看一部分、写一点意见的时候，我怀着急于了解青年的内心世界的热望，一口气读完了全部稿件。于是，我的心里涌起了阵阵的热浪，逼使我立即拿起了笔。

为什么许多青年都喜爱文学？我想是因为文学可以寄托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吧。不论是欢乐、是幸福，是苦闷、矛盾、困惑和迷惘，不论是爱还是恨，或是一种说不清的情感，只要来之于生活，来之于主体的真实的感受，无不具有或多或少的动人之处。我在这一束稿件中就分明体会到这一点。这里，没有空洞的说教，没有抽象的概念的演绎，没有矫揉造作与装腔作势，没有千篇一律的公式化。我在读这些稿件时，仿佛看见了一张一张的纯真的年轻的脸，仿佛听到了一颗颗年轻的心在跳动。这里的小说、散文和诗歌，都是属于每一个作者自己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的青年一代的主体意识觉醒

了！尽管觉醒的程度也许不同，也许有的还正在觉醒。但既然已经开始，就将星火燎原，形成不可阻遏的强大潮流。我们的青年正在独立地思考，独立地走自己的路。他们自觉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心灵世界，从而自觉地评价自己的心灵世界和再现自己的心灵世界。尽管不免于幼稚和肤浅，却充满着生命的活力，不时有思想的闪光，与心灵的老化和僵化不可同日而语。

我向你们的探索和追求致敬！我为你们的主体意识的觉醒欢呼！

这里，我还想谈一谈我最喜爱的一篇《十三的月亮》。你看，她的构思多么奇特，人人都赞美十五的月亮，她偏要吟咏十三的月亮。这篇散文是具有深刻的哲学意蕴的。“十五的月亮最圆、最亮，已不再欠缺什么”，所以，不再需要向往和理想，不再需要追求什么了。人生永远应该是十三的月亮，永远不满足，永远有向往和追求。作者在这篇散文里，表现了她的丰富的感受和多层次的思考。“人是适应环境的能力强，还是改变环境的能力强？”我认为，文章里所表现的，既是适应，又是改变环境。作者不仅在艰苦的环境中发现了大自然的美，而且，“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在创造前途，在这乡村小学的陋室里，创造我意念中的前途。”使意念变成现实，就既是对现实环境的超越，又是对环境的改造。所以，“适应”和“改变”是辩证统一的，但必须是“适应”为了“改变”。把主导的方面给予“改变”即“改造”，正是人的主体力量的能动的体现。

作者自有自己的苦乐观、“前途”观、爱情观，自有自己的人的尊严和自豪，她说：“我很充实，书籍教我认识生

活，认识真正的爱。我的日子是热热闹闹的，我拥有整个世界 整个宇宙。”

这简直是“天人合一”了，这里出现了大写的“人”的形象。人的主体意识获得了高度的发扬。具有这样的精神境界的人，将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前面已经说过，这一束稿件还不免肤浅、幼稚，这包括思想认识、艺术技巧和语言文字等方面。但只要有了自觉的主体意识，在探索 and 追求中就有了强大的动力。我祝愿这一束带露的花苞盛开在祖国的绿地上。

1987年 4月

注：绿地文学社是四川内江教育学院的学生团体。

关于“青年美学函授”的通信

王世德教授的来信

刘光同志：

你好，7月31日来信和《青年美学》第一期，同时收到。收到后，立刻把手头的工作放在一边，全刊细读一过，认为第一期编得很好，整个刊物的指导方针、编法、内容各方面都很好。你写的主要教材《美学初步》第一章，我也细读了，也觉得很好。主要意见，大体上我都同意，认为你讲得清楚。对于自然美，特别是未经改造的自然美，你说人在其中发现他自己的对应物，他所追求的理想，我也同意，我对于这个难题基本上也是这么回答。我在《美学研究与应用》（湖南人民出版社87年1月）发表的《“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与自然美》，在《美学讲坛》第一辑（广西人民出版社87年1月）发表的《论自然美》，在《天府新论》87年2期上发表的《对“美的本质”的新认识》中也谈了有关意见。我赞同你说人在对象世界（包括未经改造的自然美）中发现他所追求的美，但认为这与你说的“美是劳动创造的”与“美是自由自觉的劳动按照美的规律创造的”尚有矛盾；显然人在自然中发现的美，并非都是人劳动创造的。我同意

你说的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不一定都美，美也不一定全是人的对象化产物。这些问题较复杂，容许有不同看法待诸长期的商讨与进一步研究。我今年发的上述论文有较细致的思考，最近我还有一些新的发展。我认为，美是符合进步人类健康向上发展的理想要求的感性形象表现，与你说的“人性实现”能统一，与美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和谐、多样统一、自由的象征（或形状）等说法也可统一，并非互斥的对立，而是包容关系。“进步理想”可周延地包容以上这些说法，但以上诸说之一，似不能等同、周延地包容、代替“理想”的丰富内涵。这一浅见，不知你以为如何？特提出向你请教，也向函授学员们请教”如有质量的来稿，函授刊物也可开展一些讨论，以活跃学术研究。

原来我最担心的是函授教材是否有质量和能否负责地给函授学员作回答。现在，看了第一期函授刊物，我放心了。我觉得教材与参考辅导材料都是有质量的，对学员的态度是负责的。并且相信，以后几期，以及其它教学环节，你们一定会抓好，会越抓越好。在各项工作中，还要我作哪一些配合工作，请随时来信，我愿全力支持，应命而为。

《中学美育读本》承你们信任与重托要我写序我自当努力写好。8月10日到20日之间，我都在家。国内有好几个会邀我去，我都请假了。胡俊林同志随时可来，我在家恭候。关于写序，你们有什么要求与希望，希研究后请老胡当面告诉我。

从来信看，你的工作太多太重太努力，以致积劳成疾，住院两周，闻之十分惦念不安。我诚挚由衷地期望你减轻负担，千万珍重。

健康。

世 德 8.7

(《青年美学》编者按 王世德教授 著名美学家 中国美学学会理事 四川省美学学会会长。)

答王世德教授

世德兄：

大扎奉悉。感谢您对《青年美学函授》和我的身体的关怀特别是对我的指点，感谢您应允为我们的《中学美育读本》写序。我们准备发表您的来信，因为这不仅对我们函授中心以及关心我们函授中心的同志是很大的鼓舞和鞭策，而且广大函授学员也可以从中获得启发和教益。您在中国美学园地上的辛勤耕耘，不断开拓，不断有新著问世，尤使我感佩。我们的美学函授开创伊始，困难很多，但一想到普及美学知识，用美学来哺育一代新人，意义十分重大，就不能不勉为其难，全力以赴，虽含辛茹苦，亦在所不辞，一定要把美学函授办好，庶不负您的厚望。

关于美的本质问题，是一个众说纷纭、难度极大的问题，我完全同意您的“美是符合进步人类健康向上发展进步的理想要求的感性形象”与我的“人性的实现”说不是互斥的对立，但我认为一切“进步理想”都是有利于人性的发展和实现的，而马克思的美学理想，正是“进步理想”的最高发展阶段，这个理想，正是人性的全面实现。我对“人性”的理解有一个发展过程，1983年，我在拙作《人性三题

——兼评 文学理论基础 关于人性的论述》（载《社会科学研究》83年第2期）中，把人性只概括为人的能动性自觉性创造性与人与人之间的亲和力这样两个方面，后来再读马恩的书，才理解马恩所说的人性含义还要丰富得多。这才逐渐领悟到美的本质正是人性的实现。至于我不同意美就等于“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同时又肯定“美是劳动创造的”，是否有矛盾？第一、我对这个“劳动”是有限制语的：我说，“美是自由自觉的劳动按照美的规律创造的”，首先是“自由自觉”，即合规律性合目的性，其次是按照美的规律。所以，不合乎规律不合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目的的“对象化”不是美。第二、因此，我认为，“自然的人化”与“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这一点，我在谈“自然美”时还要进一步讨论，是否正确，还要请您指教。第三、我肯定“美是劳动创造的”，这只是个大前提（我认为，更准确的说法是“自然人化是产生美的根源”），这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经济当作人类社会各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的“最终根源”而又反对把这一问题简单化一样，承认“最终根源”，同时又承认其他的复杂原因。我以为，这样似乎更符合马克思主义。不知您以为然否？

对于您这样博大精深的美学家，我是作为讨教直率地说了这样一些肤浅的意见。可能有错，尚望继续指教。感谢您的建议，在条件成熟时，美学函授是可以展开一些讨论的。

敬祝

健康

刘 光

吕进致刘光

刘光同志：

《青年美学》（函授）第一期收到。说实话，刊物的质量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有些出乎我的意外，应该向你，向内江的同行表示感谢。《美学初步》多次提到斯托洛维奇，此公就是在所并不出名的大学——塔尔图大学任教。爱沙尼亚是 1940 年才并入苏联的，人口不到 150 万，它的境内的塔尔图大学的条件可以想见。但是斯托洛维奇却以苏联一个重要学派的带头人而赢得国际声誉。内江不是北京，不是上海，但是它可以为我国的美学研究作出重大贡献——这是读完刊物后我产生的一个预感。

大作《美学初步》第一章第一至四节，我是一口气读完的，我想为之鼓掌。“美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和“中外美学史上对美的本质的探讨”两节，对美学的一些基本的而又争论不休、众说纷纭的课题的研究状况所作的概括是全面而又简洁的。第四节中，有你的创见闪光。我从来对你的不囿定论、思路开阔的治学风格十分敬重。在对美的本质的探讨上，我又一次体验到这种敬重之情。我相信，函授教材中有这样的著作作主干，青年学员们一定会获益非浅。同时我也相信，《美学初步》一定是一本有创见的读物——我希望尽快看到它的全貌。

当然，《美学初步》在定稿时，还可再过细地打磨一下。比如，就这四节而言，也还有些工作可作。如对中国古代美

学对美的本质的探讨，似嫌过略；当然，从西周到近代，我国古代美学在这方面虽说没有形成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但吉光片语的美学思想却极为丰富，如何以简洁的语言尽可能概括出近三千年的探讨足印，是个难题。

我刚暂时“解放”。爱人生病、住院、手术、出院，差不多花了三个月。九月份又要有6名新诗研究生进校，真是焦头烂额。现我爱人去昆明治疗和休养，由她一个姐姐陪去。我趁这个把月的时间把需要赶快做的事做了。

问

全家好

吕 进

9/8

刘光致吕进

吕进同志：

你的信在我们函授中心经理部压了很久才送给我，所以误了回信时间，请你原谅。以后来信，请仍寄内江教育学院，以免延误。

非常感谢你对我和我们的鼓励与支持。特别是对拙稿《美学初步》的评价，使我不但有“知音”之感，又确实有些惶恐。因为我这稿子的确写得很仓猝。——这一段时间，我负担很重，我和胡俊林要共同主编一本《中学美育读本》，

（《青年美学》编者按：本中心顾问吕进先生系西南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新诗研究所所长，著名诗歌评论家。）

贵校出版社已决定采用（注），此稿约 25 万字，已反复修改几遍，化了大量劳动，最近才初步定稿。又为市教育局主办的“中学美育师资培训”组织上课。“青年美学函授”创办伊始，人员全是业余的，困难颇多。我不但是函授刊物的主编，要组稿、审稿、定稿，还要主持函授指导，甚至要过问印刷、校对，当然此外还有一些别的工作和会议。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学初步》的写作，参阅资料和细致思考都很不够。不得已，第二期我只写了第一章的第五节“美的内容与形式”。但第三期不能不多发一点了，因为六期要发完，告一个段落。我这个《初步》，预备只谈美和美感，艺术美只作为美的一种形态略谈，我们有“文艺美学”专栏，可以谈得更具体些。对“美育”，我的看法是把它作为美学与教育学的交叉学科，我们又设了“美育”专栏，因此也可以不谈。《初步》架子已定，不能更改了，只能以后另写的别的东西。

非常感谢你的指点，《初步》如能出单行本，我当认真修改。你所谈到的中国古代美学，的确是个难题。我这里是只从“美的本质的探讨”这一点来谈的，远不足以概括其全部精华。

你是一位非常勤奋的学者，又是一位循循善诱的青年的导师，祝愿你的大作源源问世，祝愿你的夫人早日康复，祝愿你的新诗研究生迅速成长为新一代的评论家。

刘 光

1987.969

（注）此书后来由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

回顾与展望

——第一届美学函授结束语

写完了《美学初步》，又编完了《青年美学》本局的最后一期，当对着窗外的一片寂静，我不禁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很有点如释重负之感。

正如我们的市委宣传部长何其愚同志在一次会议上所说：“青年美学函授办得很苦”。这是真的，我们不自量力，办起了全国第一家美学函授。人，全部是业余的；经费，没有一点来源。我们借钱在《中国青年报》刊登了广告，《沱江文艺》和内江市电视台免费为我们发（映）了招生启事。我们感谢领导的关心和朋友的支援。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的艰难的创业。许多人不知道美学是什么东西，在我们这个国度，美学还很不普及，我们宣传不够，招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在全国范围内，在我们之后，出现了一个比我们有名、比我们有实力的美学函授，它没有成功，但我们居然坚持下来了。当时我有一个想法：有进有退，美学函授一定要办，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有一位女诗人感慨着告诉我一个故事：一位音乐家化了很大的精力筹办一次独奏会，可是到时候台下只有一个听众，但他没有气馁，仍然照常开他的独奏会，仍然起劲地演奏，为了这一个唯一的

知音。听了她的故事，我感到一阵酸楚。知音真难觅呵！我们的处境难道也会是那样的么？但是我下了决心：我和我的同伴一定要学习这位音乐家的精神，定不后退。

困难总算一个一个地克服了，回顾起来，真像是一场梦。我们终于有了一定数量的学员，有了最基本的经费的保障。我们得到了本地党政领导和本省内外的、全国知名的美学家、艺术教育家、文艺理论家、诗歌评论家的关心、肯定与支持（他们成了我们的顾问），在这里，我代表我的同事向你们表示深深的敬意。特别是美学界老前辈王朝闻先生和他的助手，亲临内江，给我们指教，给我们上课，给青年朋友们解答问题，这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和鞭策，使我们更加坚定了办好美学函授的决心。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始终支持我们的一批青年理论工作者吴兴明、李杰、杜险峰等，他们朝气蓬勃，思路开阔，见解新颖，且富有激情。他们的文情并茂的文章，受到了广大学员的欢迎。

我们同广大学员之间逐渐地有了心灵的交通，有了思想情感的交流。在函授开办之初，我们的指导教师就确定了一条原则：我们不仅仅是解决知识上的疑难，最重要的，我们要关心学员，要以满腔热情对待我们的学员。学员在我们的函授教材和书信来往中，得到了启迪，开阔了眼界，增强了对生活的信心和勇气；我们也赢得了学员的理解和信任。许多学员把我们当成知心朋友，对我们无话不谈，学员的来信甚至长达七、八千字。我常为我们的青年朋友的纯真坦诚、热情洋溢的信激动得热泪盈眶。春节期间，我们还收到远道学员寄来的贺年片和礼物。不少青年朋友甚至还关心我的身体，劝告我爱护身体，不要劳累过度。所有这一切就是对我

们的最高奖赏，最大鼓励。曾经有一次，印刷厂去印赚钱的书，把我们的刊物搁在一边，耽误了整整一月。我们受到学员的责难。可是，当我们作了坦率的解释，就立刻得到谅解，而且，有的学员还向我们道歉。——这一切使我感动，我们的青年是多么可爱。谁说我们的青年是垮掉的一代？我们在我们的学员身上，正看到祖国光辉灿烂的未来……

当然，回顾过去，我们又感到深深的不足，深深的歉疚。在开校的前一阶段，由于经理部与函授指导部的分离和制度的不完善，学员们的来信有的压积得很久才被我们看到，回信太晚。这个问题一直到 88 年开年以来才得以解决。另外，有些学员间或没有收到刊物，有的是因原地址不清楚或地址变更等原因，也不排除我们工作的失误，我们已尽可能作了弥补。

这一届青年美学函授即将结业，第二届就要开始。针对上一届的不足，我们决定以加强针对性（针对青年的特点和需要）和现实性（面向现实面向人生）作为第二届函授的总方针。要增加学习资料。《美学初步》将印成单行本发行给全体学员作美学理论基础教材，另在函授刊物上刊载辅导学习文章，将增辟“人生美学”专栏，探讨现实人生问题，并组织学员参加问题讨论。还将增加“爱情美学”、“生产美学”的文章。“西方美学”将继续评介，“文艺美学”将以小说美学、电影美学为重点，兼顾其他艺术。针对过去发表学员文章不多的缺点，今后将大大增加“青年园地”的篇幅。对高级班学员除专家精心指导外，还要增发有价值的学习参考材料。

亲爱的朋友们！如有可能，我希望你们升入高级班学

习。如果你们爱“青年美学”，请你们介绍给你的亲友，动员更多的青年参加美学学习。

亲爱的朋友们，再见吧。也许我们还会继续同行，也许就要分手，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但愿一年来的美学函授学习能给你力量，给你信心，给你识别美丑的能力，给你战胜困难的勇气。任重道远，殊途同归，让我们共同为创造一个美的中国、美的世界而奋斗吧！

陶行知的创造教育

（一）创造是行动之果

“行动是老子、思想是儿子、创造是孙子。”^①这是陶行知谈“创造教育”的一段话。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你要有孙子，非先有老子、儿子不可，这是一贯下来的。”^②这意思是说，行动是第一性的，必须先有行动，才有思想，才能开出创造之花，结出创造之果。“做的最高境界就是创造。”^③

陶行知强调“做”，强调行动，强调实践，这是同他的哲学思想分不开的。他早年受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影响，认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认为先有知识，才有行动，所以取名为“知行”。后来他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到先有行动，才能获得知识，所以又改名为“行知”。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把王阳明的话翻了个筋斗。他的教育思想是受他的哲学思想指导

① 《创造的教育》，湖南版《陶行知全集》卷二 P.612 P.612 P.619 P.611 P.614 以下只记卷数和页码。

② 《创造的教育》，湖南版《陶行知全集》卷二 P.612 P.612 P.619 P.611 P.614 以下只记卷数和页码。

③ 《创造的教育》，湖南版《陶行知全集》卷二 P.612 P.612 P.619 P.611 P.614 以下只记卷数和页码。

的，有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指导，他才可能以“做”为中心，创造“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方法论。

但是，如果只有“做”，只有行动，仍然是不能创造的。必须在“做”之中获得了认识，产生了思想，才能创造；如果只有书本知识而没有“做”，没有实践，那就是一个书呆子，还是不能创造。所以必须把行动和思想结合起来，也就是把用手和用脑结合起来，手脑并用，“在劳力上劳心”，才可能得到创造的结果。

陶行知认为，创造要经过“行动——思想——新价值之产生”这样一个过程。他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个过程；一个是鲁滨孙。他漂流到荒岛上去，口渴了，白天他走在海边用手去捧水喝，到黑夜里就没有办法了。他偶尔在灶的旁边，看见经火烧过的泥土，硬得如石子一样。他想到软的土经火烧了，就成坚固而硬的东西，于是他把土做成三个瓶子，放到火中去烧，烧碎了一个，其余的两个可以满满的盛着水，于是他口渴的问题完全解决了。他在黑夜饮水困难，这是行动；由看见烧过的泥土硬如石子而想到可以用火烧泥使它坚硬，做成盛水的瓶子，这是思想；再由思想而指导行动，终于成功，这就产生了新价值。这就是创造，是“物质的创造”。另一个例子是讲，《红楼梦》上，贾母请客，唤了两只船来，贾母同媳妇等人先行，宝玉和姐妹们后行。河内余满破残荷叶，船行受阻，划得不快。宝玉忿怒，要铲光破荷叶，林黛玉却说：“我平生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诗，只有一句还可以。”宝玉问她是哪一句，她说：“留得残荷听雨声”一句。宝玉欣慰称是，不再要铲光荷叶了。这时，船行到破荷叶中受阻，是行动；黛玉提出李义山的诗句并引起宝玉的

思考是思想；于是“宝玉心中厌恶的破荷叶，一变而为可爱的天然乐器，是产生了新的价值”。^①这就是创造，是“心理的创造”即精神的创造，也可以说是审美的创造。

创造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份，也是他的教育思想的重要特色之一。陶行知的一生就是创造的一生，而创造教育思想又自始至终地贯穿着他的全部教育思想，从教育宗旨、培养目标、教育的内容与方法到教育设施各方面，无不焕发着创造教育的光辉。

陶行知创造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全面的说，那就是“创造新自己，创造新中国，创造新世界”；“新世界之创造，是我们的主要功课”。^②但一切的创造要归结到人的创造上来。创造教育所要创造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是能够创造的人，富于创造精神和创造能力的人；是真善美的活人。“教师的成功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陶行知还认为，不是教师单方面的创造，“先生创造学生，学生也创造先生，学生先生合作而创造出值得彼此崇拜之活人”。^③陶行知的这种崭新的教育观点，不就是一种光辉的创造吗？

（二）创造之神你回来呀”

由于许多年来传统教育的桎梏，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受到严重的损害。1943年，陶行知写作《创造宣言》，热情洋溢地大声疾呼：“创造之神你回来呀！”

陶行知说：“儿童的创造力是千千万万祖先，至少经过

《创造的教育》，湖南版《陶行知全集》卷二 P.612 P.612 P.619
P.611 P.614以下只记卷数和页码。

② 《社会大学运动》卷三 P.586 P.584

③ 《创造宣言》卷三 P.482 P.484

五十万年与环境适应斗争所获得而传下来之才能之精华。发挥或阻碍，加强或削弱，培养或摧残这创造力的是环境。教育是要在儿童自身的基础上，过滤并运用环境的影响，以培养加强发挥这创造力，使他长得更有力量，以贡献于民族与人类。教育不能创造什么，但他能启发儿童创造力以从事于创造之工作”。^①

陶行知所说祖先传下来的精华，与西方哲学家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很相似。这是一种很有道理的科学假说，但陶行知对儿童具有潜在创造力的信心，主要还是从他几十年来生活实践和教育实验得来的。儿童的这种潜在创造力，有的刚刚萌芽，初露端倪，有的已经较充分地表现出来。陶行知谈到许多例子，他号召教育工作者要充分注意，改变歧视儿童、压抑儿童创造力的现象。

有一件事使陶行知十分高兴，他曾在文章里、书信中多次提到：当晓庄师范被迫停办的时候，晓庄的教师和师范生不能回晓庄小学任职，那里的小孩就自己组织起来，推举同学做校长做教员，自称为自动学校。陶行知认为，“这是中国破天荒的创举！”他写了一首诗去祝贺他们：

有个学校真奇怪，
 小孩自动教小孩。
 七十二行皆先生，
 先生不在学如在。

自动学校的孩子们回了一封信，信上除了道谢以外，说

^① 《创造的儿童教育》卷三 P.522 P.523—524 P.524 P.525 P.524—527 P.527 P.528

这首诗有一个字要改。大孩教小孩，难道小孩不能教大孩吗？大孩能够自动，难道小孩不能自动吗？而且大孩教小孩有什么奇怪呀？^① 这个看法很正确，完全符合陶先生“即知即传”和“小先生”的精神。陶先生得信后非常惊喜，立刻把诗改为“小孩自动教小孩”。他后来回忆，说孩子们是他的“一字之师”。

还有一个改诗的例子，陶行知有一次到南通去推广“小先生”写了一篇一分钟讲演词，其中一段是：“读了书，不教人。甚么人？不是人”。陶先生是反对守知奴的，可是这句话说重了。他讲过后有一个孩子马上来说，陶先生，你的讲演最好把“不是人”改为“木头人”。“不是人”不具体，而“木头人”就能给我们一个具体的印象。^② 这个词改得更加高明。如果说，前面的例子是用字（词）的准确性问题，这里却是形象性问题。这个孩子显然已经懂得诗（文学）的特性，并且有想象力。他改这个词成了画龙点睛，使整个诗都活起来。

此外陶行知还谈过，他曾请一位不满十三岁的孩子到常州漕桥去帮助开创西桥工学团，后来这孩子又到山海工学团，领导小朋友们工作，表现出超越的天才；“淮安几个光棍”（指淮安新安小学所组织的新安儿童旅行团的几个团员）到上海时，居然到各大学讲演，反应热烈……；陶先生还谈到他的儿子小桃在六岁时曾教五十七岁的祖母读完一册千字

^① 《创造的儿童教育》卷三 P.522 P.523—524 P.524 P.525 P.524—527 P.527 P.528

^② 《创造的儿童教育》卷三 P.522 P.523—524 P.524 P.525 P.524—527 P.527 P.528

文的故事，所有这些，都说明“小孩子有不可思议的力量”，^①绝对不能低估。

育才学校的实践更证实了这一点。学校是1939年建立的。1940年底，音乐组就在重庆举办“儿童音乐会”，获得成功，周恩来称赞音乐组“为新中国培养出一群新的音乐天才。”1942年，戏剧组首次在重庆公演五幕名剧《表》，轰动了山城；此后又自编、自导、自演四川方言话剧《不平》和《啷格办？》，再次轰动山城。1942年绘画组在重庆举办“抗敌儿童画展”，参观者踊跃，颇获好评，冯玉祥将军看后还赋诗称赞“小艺术家”。^②

由这许许多多不胜枚举的例可以看出：儿童是确有创造力的。但这种创造力还很稚嫩，还需要发挥、加强和培养，而决不能阻碍、削弱和摧残。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师范、育才学校、社会大学以及工学团等各种类型的学校都为创造力的培养提供了很好的榜样和借鉴。

这里再谈一个事例，说明我们的家长和教师有时是不自觉地摧残了儿童的创造力，还不知道自己犯了很大的错误。陶行知说：一位朋友的太太因为孩子把她新买来的一个金表拆坏了，在大怒之下，把孩子结结实实地打了一顿。陶先生对她说：你这一打，恐怕中国的爱迪生被你枪毙掉了。她终于恍然大悟，请教补救办法。陶先生说：你可以把孩子和金表一起送到钟表铺，请钟表师傅修理，让你的孩子在旁边看他如何修理。这样修表铺成了课堂，钟表匠成了先生，你的

① 《小孩子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卷五 P.275—276

② 《生活教育十讲》P.175—179

孩子成了速成学生，好奇心得满足，修理费成了学费。^①这就是活的教育，这就是生活教育，这就是把社会当作学校。可见生活教育无处不在，无处不可以培养儿童的创造力，关键在于教育者是否有这样的自觉。

陶行知认为：创造力在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并不是只有天才才有创造力。创造的民主教育“是动员全体的创造力，使每个人的创造力得到均等的机会，充分的发挥，并且发挥到最高峰。”^②

为此，就需要每个人都树立起自信心，相信自己能够创造。这就要破除因袭守旧的观念，克服自卑思想和懒汉思想，振奋创造精神。陶行知批评了“环境太平凡”、“生活太单调”等不能创造的借口，指出我们就是要“在平凡之中造出不平凡；在单调上造出不单调”。他还鼓励那些以为自己年纪太小、或者太无能的人，举出科学家爱迪生、莫扎特的童年的例子，说明儿童也能创造，举出鲁钝的曾参，不识字的慧能都能够有所作为；甚至在一个人走投无路、陷入绝境的时候，也会出现“柳岸花明又一村”，获得创造的成功。因而，他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的人”。^③也就是说，无人、无时、无地不可以创造。

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教师首先要有充沛的创造精神，创造热情。要把自己当做“第一流的教育家”、“敢探未发明

《创造的儿童教育》卷三 P.522 P.523—524 P.524 P.525 P.524—527 P.527 P.528

② 《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纳》卷三 P.539

③ 《创造宣言》卷三 P.482 P.484

的新理”、“敢入未开发的边疆”。^① 勇于创造，勇于开辟。

敢探未发明的新理，首先要不迷信旧理，敢于向传统教育挑战。陶行知的全部生活教育理论，就是对传统教育的宣战书。例如，传统教育主要的任务是读书，书本知识重于一切；而陶行知却主张手脑并用，手脑相长，重在“做”，重在实践，认为教与学都必须通过“做”来完成。传统教育是培养“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书呆子，而陶行知却主张“用活书、活用书、用书活”，培养独立思考的创造型人才。传统教育迷信考试，把考试分数作为考察学生的成绩、衡量一个学校教育效果的主要的甚至唯一的手段，而陶行知却用身心的全面发展和创造能力作为衡量学生的标尺，并从多方面全面地考察学校的质量。传统教育是关起校门来办学，不关心天下国家大事；陶先生却主张“社会即学校”，对国家的命运、人类的前途，都要有强烈的责任感，等等。陶行知既反对中国封建的老教条，也反对外国的洋教条，他敢于面对中国现实，从国情出发，探索新理，创造新理论。这需要何等的魄力、何等的勇气啊！

敢入未开化的边疆，陶行知终身致力于普及教育，他的力量主要放在广大的农村。晓庄师范和育才学校，也都创办在乡间。他常常受到反动政府的压迫，加以经费困难物价飞涨，最低的生活也常常得不到保障，几次面临断粮的危险。但是，他把普及教育当做创造新中国的必由之路，不怕难、不怕苦、不怕死，艰苦奋斗，义无反顾。这需要何等开阔的胸怀，何等坚强的毅力啊！

^① 《第一流的教育家》卷一 P.113—114

1933年，陶行知创作了四支儿歌，现摘录一首如下：

小 盘古
我是小盘古，
我不怕吃苦。
我要开辟新天地，
看我手中双斧。^①

陶行知殷切期望于下一代的，就是这种“开辟新天地”的精神和魄力！

（三）创造力的培养

你这糊涂的先生！
你的教鞭下有瓦特。
你的冷眼里有牛顿。
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
你别忙着把他们赶跑。
你可要等到
坐火轮，
点电灯，
学微积分，
才认他们是你当年的小学生！^②

这“糊涂的先生”可不是个别的。出于传统的对儿童的成见和偏见，他们认为：“小孩子懂得什么”因而，他们看不见“笨伯”之中有牛顿；“庸人”之中有瓦特；“坏蛋”之中有爱迪生。他们不理解儿童，儿童也不理解他们，孩子中

① 《创造的教育》，湖南版《陶行知全集》卷二 P.612 P.612 P.619 P.611 P.614。以下只记卷数和页码。

② 《师范生的第二变——变个小孩子》卷二 P.243

的聪明才智、创造潜力全被他们抹煞了。

儿童的创造力，被传统教育、传统观念层层包裹着，培养儿童的创造力，首先要揭开层层包裹，解放儿童的创造力，才能使他得到健康的发展。

陶行知曾经多次谈到这个问题。他有时谈五个方面的解放，有时谈六大解放^②，现综合介绍如下：

（一）解放他的眼，使他能看。也就是使眼睛能看到事实，从事实出发。

（二）解放他的头脑，使他能想。这就是要使头脑从迷信、成见和曲解之中解放出来。儿童本来没有迷信、成见、曲解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他周围的环境传给他的。去掉这些，才能客观地实事求是地思考问题。

（三）解放他的嘴，使他能谈。儿童应当有言论自由，要准许他们问。旧中国一般是不许小孩子多说话。其实，喜欢发问，是求知欲的表现。还应该允许他们有话直接和老师谈，并且心甘情愿地和老师说，老师要耐心地倾听。

（四）解放他的双手，使他能干。人类的一切文明都是在头脑指挥下用双手创造的。但是传统教育把儿童的双手束缚起来，不许小孩子动手。爱迪生就是因为爱动手搞化学实验被赶出学校的。他的妈妈鼓励他搞实验，解放了他的双手，他才终于成了科学家、发明家。

（五）解放他的空间，使他能够到大自然大社会去取得丰富的学问。大自然有丰富的自然科学；大社会有丰富的社

《创造的儿童教育》卷三 P.522 P.523—524 P.524 P.525 P.524—527 P.527 P.528

② 《小学教师与民主运动》卷三 P.606，《实施民主教育的纲领》P.542

会科学；大自然和大社会还是文学艺术创作的源泉。不要把学校当作鸟笼，把学生当作鸟。把学生像鸟一样关在笼子里是不能培养创造力的。

（六）解放他的时间，不把他的功课表填满，不逼迫他赶考，不和家长联合起来在功课上夹攻，要给他一些空闲时间消化所学、并且学一点他自己渴望要学的学问，干一点他自己高兴干的事情。其实，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常常是在课余时间培养出来的。

陶行知郑重声明：“我个人反对过分的考试制度的存在”。他说：“现在中学校里有月考、学期考、毕业考、会考、升学考……。有的只好在鬼门关去看榜。连小学的儿童都要受着双重夹攻。日间由先生督课，晚间由家长督课，为的都是准备赶考，拼命赶考，还有多少时间去接受大自然和大社会的宝贵知识呢？”赶考首先赶走了脸上的血色，赶走了健康，赶走了父母之关怀，赶走了对民族人类的责任……”^①“一般学校把儿童的全部时间占据，使儿童失去学习人生的机会，养成无意创造的倾向，到成人时，即有时间，也不知道怎样下手去发挥他的创造力了。创造的儿童教育，首先要为儿童争取时间之解放”。^①

以上，陶行知论述了从六个方面全面地解放儿童的创造力。这就为有效地培养儿童的创造力提供了最基本最重要的条件。在这些论述中处处渗透了生活教育的精义。其实，全部生活教育，也就是创造教育。生活教育的全面实施，也就

^① 《创造的儿童教育》卷三 P.522 P.523—524 P.524 P.525 P.524—527 P.527 P.528

是创造教育的全部实施。不过，这里还要着重谈一谈与培养创造力关系密切的“因材施教”的问题，并介绍一点育才学校实施创造教育的措施。

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应该重视每个学生的个性，尊重学生的个性，贯彻“因材施教”的原则，决不可“一刀切”

陶行知说：“松树和牡丹花所需要的肥料不同，你用松树的肥料培养牡丹，牡丹会瘦死；反之，你用牡丹的肥料培养松树，松树受不了，会烧死。培养儿童的创造力要同园丁一样，首先要认识他们，发现他们的特点，而予以适宜之肥料、水分、太阳光、并须除害虫……”。^①谈到晓庄学校，他说：“我们愿意在这里的人都能各得其所，现出各人本来之美，以构成晓庄之美。如果要找一个人中模范教一切人都学成和他一样，无异于教桃花、榴花拜荷花做模范”。创造者既然各有不同，他们的创造也必然各不相同。如果都相同，还算什么创造呢？所以，陶行知说：“晓庄不但是不愿把个个学生造成一模一样，并且不愿意他们出去依样画葫芦”。“晓庄同志要创造和晓庄大不同的学校……，才算是第一流的贡献，才算是有些成功”。^②

育才办的是人才教育，培养的是有特殊才能的儿童，更需要体现“因材施教”的原则。学校根据学生的特长，设音乐、戏剧、绘画、舞蹈、文学、社会、自然七个组，一开始就同时进行一般基础教育和特殊基础教育。这是不是过早的分科呢？陶行知解释说：“这是及早防止一般基础学习及专

《创造的儿童教育》卷三 P.522 P.523—524 P.524 P.525 P.524—527 P.527 P.528。

② 《晓庄三岁敬告同志书》卷二 P.214

科基础学习之裂痕”^①，及早培养儿童对于世界和人生一元的看法。^① 特修科与普通科是相互渗透、相互联系的。实践证明，育才学校的试验是成功的，她为革命战争时期和新中国的建设培养了大批的优秀干部和杰出人才。

育才学校有集体的创造，也有个人的创造。集体创造有五个方面：1. 健康的堡垒；2. 艺术的环境；3. 生产的园地；4. 学问的气候；5. 真美美的人格。^② 不但有计划，有号召；更有组织、有实践、有效果、有成绩。决不是装点门面，给参观者看的。

育才鼓励集体和个人的创造，也有具体的办法，这可以从《育才学校创造年计划大纲》和《育才学校创造奖金办法》上看出来。“创造奖金发与下列有创造意义贡献之集体或个人”，以下列了十个方面：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音乐、戏剧、绘画、文学、治事、生活教育、人格修养、集体生活。“获奖者暂以育才学校师生、工人、育才之友、生活教育同志为限”。可见获奖的内容和获奖对象都是很广的。看来陶行知还想在经济条件好转时，扩大获奖者的面呢。

经过种种努力，育才确实“把创造之神迎接回来了”^③！愿新中国的一切学校都把创造之神迎接回来！

1991的上 9月

《育才学校教育纲要草案》卷三 P.366—P.367。

② 《育才学校节略》卷三 P. 509

③ 1942年10月16日晚，育才学校举行音乐会，获得很大成功，陶行知兴奋地即兴讲话，说：“今天的音乐会，在大家的掌声中，欢呼中，已把创造之神迎接回来了”（见卷三 P.477。）

美从何处寻

——《美育报》代发刊词

亲爱的朋友：

我知道你是爱美的，可你知道美在哪儿？你能不能找到美？你怎样才能找到美？你怎样才能亲近美，从而得到最大的快乐？

朋友，你以为自己很美吗？别人会不会也认为你美呢？那么，你是否懂得，一个人要怎样才是美的，怎样是不美的，甚至是丑的？也许你认为自己是丑的，你有些自卑，那么，你是否可以变丑为美呢？我们以为，这是可能的。

生活中到处都有美。美不仅“在微风下”，“在细雨里”，在崇山峻岭上，在繁花似锦中；而且在母亲的微笑里，在友人的握手里，在科学的攀登中，在崇高的人格里……。一曲悠扬或雄壮的乐曲，一首动人心弦的诗歌，常使你如痴如醉，流连忘返，这难道不是美吗？是的，美无处不在，可是人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却常常埋怨生活中没有美。不，不是生活中没有美，而是他自己没有能力去发现美。一个人如果丧失了发现美的能力，生活就会变得枯燥、单调，并导致心胸狭隘，目光短浅，庸俗势利，灵魂荒芜，即使有某方面的才能，也会成为畸形发展的人。

朋友，我们将同你一道，在生活的海洋里漫游，同你一道去探寻，去发现，去欣赏生活中形形色色的美。我们不只是去欣赏美，更重要的，我们还要主动积极地创造美，而我们在创造美的同时，也发展和创造了自身的美。我们的理想是创造一个美的世界，创造一个美的人类。

《美育报》的对象主要是中学生（包括中师和其他中等学校的学生，同时也兼顾大专生和小学教师），是中学生自己的报纸。你为一张你自己的报纸的诞生而高兴吗？我想肯定是的。我们，作为报纸的编者，将倾听你们的呼声，我们将同你们一起，共享你们的欢乐和幸福，也将分担你们的忧愁和痛苦。我们是你们忠实的朋友，请尽情地向我们倾吐吧。我们将尽可能解答你在生活和学习中的问题，《美育报》还开辟专版（第三版）刊登你们的作品。生活是美好的，但生活之路不是平坦的，让我们携起手来，努力向前，向前！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990年 11月

《美育报》创刊致读者

在试刊第一期的《代发刊词》中，我们已经阐明了本报的宗旨和服务对象。现在根据试刊第一期发行后所搜集到的反映，作进一步的说明。

首先，我们感谢省内外美学家、学者、省教委领导同志、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的有关领导同志对我们的热情鼓励和支持。省教委卢铁成主任看了本报试刊第一期说：你们面向中学生很好，现在应该抓美育。曾清华副市长说：美育非常重要，你们这个报办得及时。专家们来信说：你们在目前的困难条件下艰苦奋斗，办起了《美育报》，这种精神令人感佩，我全力支持你们！有的专家表示愿为《美育报》写稿，有的已经寄来了稿件。中学教师纷纷来信对本报试刊给以赞扬，中学生也踊跃来稿，他们说：试刊第一期质量高，使我们大开眼界，我们很高兴我们有了自己的报纸，还有些同志善意地提出一些改进的意见，有的同志则对报纸的作用和存在价值表示怀疑。

“‘美育’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这是某些同志的看法。是的，欣赏一幅名画，听一曲音乐，确实解决不了什么实际问题。美育是一种潜移默化、不露痕迹的教育，正因为如此，第一，它容易被中学生所喜爱，所接受；第二，它的

作用不是立竿见影的，却是一种更深层次的陶冶和熔铸，常常影响到受教育者的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

这些同志所说的“实际问题”大概的指的是智育，或者简直就是知识。我们在试刊第一期发了一篇文章《科学家不需要美吗？》正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爱因斯坦的自我美育，大有助于他的创造性思维，对他的科学研究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达尔文因为中断了审美活动，就觉得头脑成了一具机器，不仅损害了他的科研，而且觉得因此而将失去人生的幸福。轻视美育，智者也将上不去。为了追求升学率，有的学校星期天也加班加点给学生上课，学生弄得精疲力竭，健康被夺走了，智慧也将被夺走，那么，升学率也将难以保证。退一步说，即使赢得了升学率，学校培养出来的人，也不是全面发展、富于创造精神的一代社会主义新人。

“五育并举，整体育人”是全面发展的正确方针。过去，我们认为，智育（=升学率）才是硬任务，德育是软任务，到现在，这方面应该有了沉痛的教训。那么，仍然把美育当作软任务，是不是正确的呢？“五育”是一个整体，不可偏废；“五育”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我们反对书呆子式的教育，我们要求全面发展的创造性教育。我们之所以办《美育报》，是为了配合教委进行全面发展的教育，不是要以美育取代德育、智育、体育和劳动教育，而是要以美育促进德育、智育、体育和劳动教育。

有的同志说：“你们的报纸中学生看不懂。”据我们了解，不完全是这样。不少中学生是叫好的。但是我们确实有缺点，对于初中生来说，的确是深了些。我们对中学生还了

解不够，在中学生中还没有几个知心的朋友。我们正在争取同中学生交朋友，广泛听取中学生的意见，据以改进我们的工作。今后我们要多发短小精干、生动有趣、情文并茂的文章；不仅要满足高中、中专同学的需要，也要满足初中同学的需要。希望同学们多给我们来信，不仅可以对报纸提出批评和建议，而且欢迎同我们谈心。我们已经表示：我们要同你们一起，“共享你们的欢乐和幸福，也将分担你们的忧愁和痛苦”。我们一定要成为你们的忠实的朋友。

有的教师同志要求我们密切结合中学语文教材。我们尊重这个意见，今后可以常发教材中的文学作品的赏析文章，帮助同学们感受和理解文学作品的美；我们还准备发“审美作文谈”系列文章。但要说明，我们的报纸不同于语文报，我们的视野更广阔，内容更丰富。

我们已经有专版“幼蕾”刊登同学们的优秀作品。凡是有特约通讯员的学校，希望同学们经过特约通讯员推荐稿件给我们。因为我们编辑都是业余的，人手不够，经过特约通讯员的指导，稿件发表的可能性更大些。另外，稿件一定要用有格稿纸按规定缮写清楚。

特约通讯员多数是中学教师，你们熟悉中学生的生活，了解中学生的思想、感情和愿望，希望你们的来稿更有针对性，更加活泼有趣。

《美育报》正式创刊了。它的存在和发展需要各方面的扶持和帮助，特别需要校长和老师们的支持与帮助。这是一个艰难而崇高的事业，任重而道远，愿我们在共同的事业、共同的目标、共同的理想下，携手并进！

一 声 春 雷

——评简阳三岔区抓美育

最近简阳三岔区区长和教办正副主任亲自抓《美育报》的发行，全区校校开花，订了 816 份。这是一个创举，具有深广的意义。

当前，我国普通教育正在“转轨”，由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升学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教育。这个“转轨”能否实现，直接关系到四化建设，关系到祖国的未来，关系到能否迎接世界科技革命的挑战。可是，积重难返，不少人口头上讲素质教育，行动上仍然是升学第一，“升学率”仍然是评估一个地区、一个学校、一个教师的唯一标准。在这样的情况下，简阳县三岔区有关领导的实际行动无异一声春雷，振聋发聩，启人沉思。

三岔区这一行动的重大意义并不在于发行了多少份《美育报》，而在于：他们有全局观念，有高瞻远瞩的远大眼光，有强烈的责任感与紧迫感，有坚决贯彻中央方针的精神和开拓创新的魄力。他们不是因循守旧，屈从于习惯势力，而是勇于为天下先，创造一个新的格局。他们目光敏锐，选准了“美育”作为教育全面改革的突破口。

为什么要以美育为突破口呢？

让我们稍稍说远一点。据《中国教育报》11月5日载：全国有2所学校正在实施“快乐教育”，已取得显著成效；国家教委十分重视，北京市已将快乐教育列入“八五”教育科研规划。所谓“快乐教育”，其实我们的老祖宗孔子早已有所论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正是美育思想。让学生愉快地学习，让学生热爱学习。当然这不是美育的全部内容，但却是美育的一种基本精神。这是美育向智育的渗透，与智育的结合。美育的情感性与形象性不仅可以与智育渗透，与智育结合，还可以与德育渗透，与德育结合。过去我们的德育效果欠佳，不正是因为缺少美育的情感性与形象性吗？

所以，三岔区的教改以美育为突破口，正是一种远见卓识的表现。

三岔区教办副主任苏爱民还强调：“我们不仅要订好《美育报》，而且还要学好、用好《美育报》，并以此作为考核教师和学校综合评估的一个重要依据。”这就根本改变了那种以升学率作为唯一评估标准的作法，实现了教育观念的转变。我们欢呼三岔区的这一转变！并祝愿我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实现这个转变！

（原载《美育报》1992年第1期）

国庆节絮语

今年的国庆不比往年。今年，是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全国掀起改革大潮，我国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正在全方位地发生深刻变革的一年。举国上下，兴高采烈；各条战线，热气腾腾：真是一派大好形势。

当然，发展是不平衡的。我们的教育，仍然是最薄弱的环节。许多耳闻目睹的现象，令人触目惊心，忧患丛生：

现象之一：中小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重复劳动，机械记忆，数不清的作业，上不完的课，几乎占据了中小学生除吃饭、睡觉之外的全部时间。这就严重摧残了青少年的健康，扼杀了青少年的创造性思维，造就了无数弱不禁风的书呆子。

现象之二“五育并举 整体育人”。虽然倡导已久，但实际上仍然是“升学第一”甚至“升学唯一”。以升学率作为评估一个地区、一个学校、一个教师的唯一标准，并作为奖惩标准；以致教师不得不拼命，学生也以升学为唯一出路，升学无望就悲观绝望，甚至自杀身亡，令人十分痛心。

现象之三 各种各样为应考而编制的习题“指南”以各种名目继续大量印刷，从上到下，硬塞给学生，更加重了学生的负担。

自然，这些现象相互联系，有其复杂的社会原因，需要综合治理。但是，主持其事者却不能推卸其应负的责任。我们呼吁全社会关注教育，对以上列举的不良现象，再也不能听之任之了。

（原载 1992 年 10 月《美育报》）

谈谈审美作文

作家有一双善于观察到美的眼睛，有一颗敏感的心灵，还有一付善于思考的头脑，因而，作家比一般人更能捕捉到生活中的美；并能以此为素材，为基础，为契机，生发开去，浮想联翩，创作出一篇篇优美的文学作品。这就是美的创造，或者说审美创造。

审美，是一种复杂的心理活动，这其中，有感知，有情感，有想象，也有理解和鉴别。没有辨别美丑的能力就不能发现美，更说不上创造美。

年轻的朋友，你们的作文当然不能与作家比，但作家的经验还是可以学习的。你们也要培养自己的观察力、感受力、想象力、理解力和创造力，才能写出一篇好的作文，这就是审美作文。审美作文也是一种审美创造。

朋友，你是不是常常望着老师出的作文题发呆，感到没有什么好写，无从下笔呢？即使勉强写了，自己也不满意，也得不到老师的好评，使你更加害怕作文呢？

你不要着急，你应该研究一下原因。

也许是，老师出的作文题，你不感兴趣，勉为其难，别人怎么写，你就怎么写，敷衍了事；也许你不敢写你感兴趣的東西，怕老师说离题，与主题无关；你不敢写出你的真情

实感，怕挨批评；你不敢写“细微末节”，不敢去大胆的梦想和幻想，感到这都离开了作文的“谱”。这样你就把自己束缚住了，你当然写不好一篇作文。

我们提倡审美作文，首先要你解放思想。

审美作文是自由作文，自由选材，自己命题。古人说：“我手写我心”，作文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如果某一件事没有触动你的情感，你对这一件事也没有真正自己的认识，更没有表达你的思想感情的愿望和冲动，你又何必硬着头皮写这篇作文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既然没有米，那用什么来煮饭呢？当然，中学生需要教师来指导，但教师的责任应该是启发、诱导学生去认识、去体验生活，帮助学生用自己的语言正确地明确地生动有力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和认识，而不是包办代替。如果要命题，也只能是大范围的，具体的题目最好由学生自拟。

审美作文如何选材？那当然是选打动你的情感的人和事，选那使你感受最深的人物、形象、语言和情景。中学生作文不要超前去摹仿作家的虚构，要写真实的人和事。不要说假话，更不要虚情假意。感情的虚伪比感情的苍白更使人难以容忍。中学生生活圈子比较窄，最亲爱的人往往就是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和表兄姊妹、老师和同学中的朋友。那么，你就写这些，也能写成上乘之作。

当然，我们谈审美作文，决不是不要语文的基本功；但也决不能说，只有基本功练好了，才能谈审美作文。有一位初二的同学，作文时常常因为考虑字不要写错了，阻塞了他的思路，结果作文老是不及格。他的老师袁微子想了一个法子：“你不会写的字就画个圈”，他的思路一下畅通了。老师

让基础好的同学把那些圈全填上字，竟是一篇内容丰富的较好的作文。老师把这篇作文张贴出来，给了他很大的鼓励。从此他努力补上语文基本功，终于成了班上的语文尖子。袁微子是出色的教育家，他认为，写不起字是完全可以弥补的，更重要的是打开学生的思路。

（原载《美育报》1992年4月）

当前作文教学的关键在那里？

一条基本的标准

中小学语文教师常常为学生作文水平低下而苦恼，普遍反映作文难教。问题的关键究竟在哪里？

我想，我们先得考虑一下，在我们教师的心目中，一篇好作文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我们究竟用什么样的标准要求学生。这实际上就是作文教学的指导思想问题。

《人民日报》最近有一篇文章《推荐（作家的童年）丛书》，其中写道：“丁玲在桃源省立女子第二师范念书的时候，各种功课都得百分，只有语文和写字常常只有八十多分。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她不愿抄书，都是写自己的话，联想丰富，文章则拉杂重叠，因此得分少，但那真正是她自己的东西”^①

现在看起来，丁玲的老师恰恰忽略了丁玲作文中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联想丰富”，用自己的语言写自己的感受。他大约是喜欢用套话的。他不了解，“拉杂重叠”的缺点是不难克服的，作文的致命伤正是思想贫乏、僵化，没有自己

见 81年 6月 6日人民日报第八版。

的东西。

应该把“用自己的语言写自己的感受”作为一篇好作文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标准。

影片《苗苗》中青年教师韩苗苗正是这样做的。所以，虽然徐培培的作文是他爸爸从书上抄来的，韩苗苗并不知道这篇文章的来历，但她却只给了六十分，并且理直气壮地认为，这不是一篇好作文。——韩苗苗的作法值得我们深思。

“语言是直接和思维联系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①离开了思维能力的培养，语言训练是很难奏效的。袁微子同志说得好：“培养思维能力是语文教学的核心，这一个提法恐怕是正确的。因为，语文教学如果不把发展思维，培养思维能力，发展智力，作为重要的一个目的，语文教学就是没有灵魂的。因此，本着这一认识，语文教学不能停留在语言文字的理解和表达上面。”^②我们强调学生要写自己的感受，就是强调独立思考，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不能用别人的思想代替自己的思想。韩愈说：“惟陈言之务去。”但是如果只从语言文字上着眼，学生作文中的“陈言”即套话是很难去掉的。学生有了自己的感受，才可能有自己的语言；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语言才会生动活泼，丰富多采。

“用自己的语言写自己的感受”也就是通常说的“辞能达意”，强调的只是这个“辞”和“意”是自己的。在此基础上，如果“意”更清晰些、活泼些、深刻些、新颖些，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

② 《四川教育》8年第3期《关于小学语文教学的规律性问题》。

“辞”更准确些、生动些，那么，作文就能达到更高的境界了。

各种框框套套束缚了学生的创造能力

学生为什么感到作文难？为什么写出来的作文常常是千篇一律，套话太多？我以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有各种框框套套束缚了学生的创造能力，限制了学生用自己的语言写自己的感受。这些框框套套主要表现于公式化的作文教学和不恰当地要求政治意义两个方面。

有些语文教师在讲读课中，常常把一篇课文分为三段：开头、中间（即主体）、结尾。在作文教学中，也常常要求学生照此办理。去年，我们听了到北京去参观回来的同志传达的一堂作文指导课，对象是三年级小学生，题目是《野炊》。指导的结果，黑板上出现了三段的提纲。大意是：第一段写野炊的准备工作，出发那天的天气等，第二段写野炊，第三段写总结、感想之类。听了这样的指导课，我不禁想：难道非要这样写三段不行吗？这个开头和结尾，难道是非要不可的么？我们看石景山学校的小学生的作文，非常活泼，非常生动，就没有三段的框框。我可以肯定：照这位教师的指导去写的作文，一定不可能写得像石景山学校的小学生写的那样活泼。这堂指导课的“指导”的确是十分具体的。据我所知，凡属公开教学的作文指导课，指导都是不厌其详的。教师并不着重启发，打开学生的思路，活跃学生的思想，而是把学生的思路限制在自己规定的框框内。这样，指导越具体，学生的思想越受束缚，结果就形成学生作文的

千篇一律。同时，写不出“感想”硬要写“感想”，还要联系自己表一表决心，学生又怎么能够避免说假话、套话、空话呢？

我还看到这样一堂公开课：教师先指导学生写中间的主体部分，指导完毕，教师发问：这样写好以后是不是一篇完整的文章？（其实已经是一篇完整的文章了）学生回答：“不完整”，于是教师再指导写开头和结尾。从这里看出：教师把一篇文章当作一种机械，它可以在主体部分完成之后外加一个“开头”和“结尾”，好像一篇文章不是一个有机体。它的每一部分是可以任意割裂的。这种写作方法，我们从古今中外任何名家的写作中找不到一个先例。当然，这并不是某一位教师的独创，听说这种作法是很普遍的。由此可以看出：我们在作文教学中是怎样严重地忽视了思维能力的培养和写作中的情感因素。一篇文章，如果不是循着一定的思路自始至终，如果不是始终一贯地贯穿着一条情感的脉络，能够从情感上打动别人，从思想上说服别人么？

公式化作文教学的另一表现是作文命题一律。小学从三年级到五年级都可以出这个题，初中、高中也可以出这个题。甚至连要求也看不出什么区别。学生面对自己不感兴趣的作文题，不得不搜索枯肠，硬着头皮去写。教师是不允许他改变题目的。从小学三年级到高中学生的作文本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批语：中心思想不明确，详略不当，语言不够精炼，不具体不生动，语言贫乏，层次不清等等。学生面对这些批语，怎能不加重“作文难”的思想负担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心思想的要求。当学生还不会观察客观事物，还不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时，我们却过早地

要求学生的作文要有明确的中心思想，这好比要求还不会走路的婴儿跑步一样。无论是中小學生，无论是哪一个年级，只要学生的思想还被八股调束缚着，我认为，首要的任务就应该是打破这种八股，这个时候要求中心思想，就会给学生增加一重束缚，只有当八股调已经清除，学生的思路已经打开，已经有滔滔不绝的话说的时候，才能够适时地提出中心思想的要求（在小学，只能提出“中心明确”的要求）。苏轼教人作文，主张“先奔放，后收敛”^①，就是这个道理。

教学多年的老教师痛感到我们的语文教学常常受到左倾思潮的影响，把语文课上成了政治课，严重忽视和违反了语文课的特点和语文教学的规律。十年浩劫，语文课可以说是被取消了。林江倒台以后，语文教学逐步走上了正轨，但是极左思潮的余毒尚未彻底清除。表现在作文教学上，就是不恰当地要求学生作文要有政治意义。有的《教学法》试用教材，甚至要求教师用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来衡量小学生的作文。我见到一位中学生的作文，写姐弟之间的纯真感情，写得情真意切，但是教师却认为没有什么意义，不能算一篇好作文。这不禁使我想起冰心的作品和朱自清的散文，特别是朱自清的名作《背影》，这篇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众口交誉的文章写的不过是父子之情，于是我感到，我们对学生要求的苛刻简直超过了对作家的要求。人与人之间的纯真感情到底能不能写？是不是一定要附加一些政治意义呢？何况这位学生的作文，我们还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它是写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亲人家属之间正常关系的恢复。如果

① 参看《语文学习》80年第9期徐中玉：《苏轼教人如何作文》。

对“政治”不作过于狭隘的理解，它还是有一定政治意义的。我还看到一位师范生写了过去教她的一位女教师，这位女老师对学生的教育非常认真负责，但是因为学生很调皮，她在同学生的个别谈话时，就往往急得哭。这个学生如实地写了这位女教师的性格特点，我认为是很好的，但是有的教师却认为，先进人物不应该流眼泪。这位同志显然不知道，他的观点正是极左的文艺观点。我们认为，第一、先进人物决不会是没有缺点的人物；第二、流眼泪并不都是软弱的表现；第三、人不能没有感情，没有个性。常见一些学生在写人的时候，总是“浓眉大眼”，眼睛“炯炯有神”，说的都是“豪言壮语”，想的全是革命大道理，好像一个模子铸成的，不能说同老师的指导无关。

对学生作文不恰当的要求政治意义，是学生作文中喊空洞口号、发空洞议论的重要原因之一。它还使学生不敢写真实思想，不得不说假话、套话，生编硬凑。有一个小学生为了表现一个先进同学不怕艰苦，写他在打扫教室的时候把手都扫痛了，甚至手指脱了一层皮。有的四年级小学生扩写《囫囵吞枣》，竟然扯到五讲四美。不恰当地要求政治意义还限制了学生的选材，使他不能写自己最感兴趣的事物。这些同志忘记了作文教学的目的，同时把政治庸俗化了。

我们的中小学生在种种束缚中，想要活跃思想，写出生动活泼的文章来，的确是十分困难的了。

解放教师和学生的思想

要解除对学生思想的种种束缚，首先要解放教师的思

想。

第一、教师要从多年来左倾思想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中学语文教师应该真正懂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以便破除林、江的极左文艺观点，掌握写作的规律。中小学语文教师都要认真学习和领会作文教学的目的和要求，特别是在不同阶段、不同年级的具体要求。不要不恰当地要求学生作文必须有某种政治意义。只要学生作文中的思想感情是健康的，就可以了。即使感情不健康，思想有错误，也不必大惊小怪，更不能随便批判，而应该细心研究所以如此的原因，采取诱导的方法，使学生自觉地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

第二、教师还要从作文教学的呆板程式中解放出来。我们的语文教师同志常在自己的教学中，有意无意地传播一些作文的公式和程式，其实作文的大忌就是程式化和公式化。我们当然并不否认作文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但我以为主要的是应该研究作文的构思，从作文的构思中找规律。我们教学范文的目的，不仅要学生懂得范文的一般性，更要学生懂得范文的多样性和独创性。不是要学生机械摹仿，依样画葫芦，而是要学生在范文中受到启发，得到借鉴。因此，我们在改革作文教学的同时，也要相应地改革我们的讲读教学。

第三、教师还要从应付升学考试的惶惶不安的心理状态中解放出来。语文教师如果为了追求升学率而违反教学的规律，应该说是一种失职。即使升学率高，也是一种假象。当然我们更希望各级各类学校的入学考试更加准确、更加科学地正确评定学生的作文成绩。现在，各级学校的考试从命题到评分都已有了很大的改进，相信这个矛盾逐步会得到解决。

教师真正解放了思想，才可能抓住当前作文教学的关键，着眼于能力的培养和智力的开发，首先是打开学生的思路，让学生从各种框框套套中解放出来，让孩子们的思想活跃起来。第一、让学生能够如实地写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认识到的；第二让学生的想象自由地驰骋，要敢于让学生写幻想，编故事。这两个方面好像是矛盾的，其实并不矛盾。学生如实地写，就可以避免假大空，言之有物，言之有情。那么，可不可以虚构呢？我以为，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写作范围内可以不允许虚构，例如在学生刚开始学作文或者假话、套话很严重的时候。但如果作文已走上正轨，不良文风已有克服，就应该允许在基本情节真实的前提下可以有合情合理的虚构。应该有时候让学生自己命题，或改变教师出的题目。同时，让学生大胆写幻想，有助于想象力的培养，这恰恰是当前作文教学中最不受重视的环节。

在作文指导中，还有一个情感的因素为许多同志所忽视。学生作文，不仅要写他熟悉的，更要写他感兴趣的，有爱憎感情的。情感的有无、真假、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文章的好坏。这是作文的普遍规律，学生当然也不能例外。我们一定要创造条件，让学生自由地抒发他的真情实感，而不能用各种框框套套去限制他、束缚他。我在师范学校近三年的教学实践中对此更深有体会。我教的班有一个差生，作文内容空洞，找不到话说，但在思路打开以后，写了一篇《当我听到语文分数的时候》，描写她在听到语文分数前后的着急、痛苦、懊悔的心情，真实而生动，作文的质量一下子就提高了。还有一个差生，在她从框框套套中解放出来以后，写了一篇《看爸爸》，描写她在“文革”期间随同

母亲到重庆一个医院探望在公安局工作，被“造反派”打得遍体鳞伤的爸爸。那时她还是儿童，她写出了自己的惊愕、害怕、悲痛，对爸爸的爱和对坏人的恨，写得很动人。我在批改时也流泪了。学生之中还有人在写作之前有强烈的感情冲动，我让他们暂时不要写，让情感再经过一番沉淀、提炼，结果就写得更深刻一些。总之，由于重视了情感的因素，加速了学生作文的进步，我在批改作文时常常禁不住热泪盈眶，精神上得到很大的满足。我深深体会到：情感是文章的灵魂，忽视情感的因素，是不可能提高学生的作文水平的。

最后，要提倡、要鼓励创造。不要满足于学生能摹仿一些范文，能写许多套话，或者能堆砌一些辞藻。学生学习作文，当然不免摹仿，但摹仿也是为了创造。只要对创造不作狭隘的理解，不作过高的要求，中小学生都是可以创造的。所有这一切，并不妨碍我们严格要求学生的语言。相反地，学生的思维能力发展了，语言也一定会丰富起来。我们一定要培养朝气蓬勃的一代新人！作文是能力的综合表现，在培养能力上，作文教学负有特别重要的使命。我们要解放思想，切实地、尽快地提高作文教学的质量。愿与全国同行共勉！

1981.6.5初稿

7.13深夜三稿

第二课堂活动中的审美教育一例

今年六一儿童节，学校搞庆祝节日演出，我校号召各班和第二课堂各组织充分发挥创造性，发挥孩子们各方面的才能；结果二年级两位班主任创作的哑剧《如此医生》荣获创作与演出一等奖。

哑剧的主旨是抨击蒙骗群众的江湖医生。人物是一个假医生，一个患肚痛的女孩，一个患腰痛的老大爷，一个串牙痛的老太婆。哑剧不仅用夸大、滑稽的动作，也用特大的针、电筒、板子等道具来突出喜剧性，增强艺术效果。这个节目采用哑剧形式，没有人物语言，全凭动作显示剧情，使观众的注意力更加集中，想象力更加活跃，比用有语言的小品更好。

排练过程就是一个使孩子们接受审美教育的过程。孩子们兴趣很浓，经过引导，很快进入角色。两位编导进一步帮助小演员根据每一个人物年龄、性别、所患疾病来体验他们各自的特点和心理状态，设计最佳的动作。排练时小演员都很认真。演出时他们逼真又夸大的滑稽表演，引发了一阵阵热烈的笑声。

儿童哑剧《如此医生》的排练和演出，帮助孩子们认识了社会上还存在的假恶丑。对假恶丑的嘲笑、鞭挞，也间接

地培养了他们对真善美的热爱。哑剧的成功昭示我们：师生中蕴藏着丰富的创造力，教师要努力开发自己的创造力，更要努力开发小学生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要在第二课堂活动中自觉地进行审美教育。

1995年 6月

（原载内江行知实验学校主办的《家庭教育报》）

一次作文指导的启示

12月6日晚，我同孩子们一起吃晚餐，看见一个五岁左右的预备班的小女孩夹在三、四年级女生中间，生活老师先给小女孩盛饭菜，小女孩旁边是一位四年级的大姐姐何影在哄着她吃饭。这时我想起，前两天，有位预备班读通学的学生家长来要求让孩子住校，因为预备班的寝室已经住满，三、四年级的女生寝室还有空铺，于是决定把这女孩安在三、四年级女生寝室。这个小女孩大家叫她奇奇，这肯定就是她了。邻座的四年级的周平，三年级的李凤，都爱奇奇，李凤说：“奇奇小，要睡下铺，是我让铺位给她的。”这时我忽然闪过一个念头：这不是很好的作文题材吗？为什么不让她们写呢？我说：“我给你们出个作文题：《寝室里来了个小妹妹》。谁愿意来写这个题目？”好几个孩子都愿意写，其中三年级的李凤最积极，她说：“我的作业做完了，我有空，我来写。”我同她一道走出食堂，她一面给我谈她的构思，我一面给她指导。她要求在行政办公室来写，以免别人干扰。我同意了。我让她一人坐在办公室里写，我出去巡视各班教室。晚自习上了半个多小时以后，李凤就写了八九百字。可见她写得很顺畅，只问了我几个写不起的字。我细读全文，基本通顺，只有一个自然段有些疙瘩，辞不达意，需

要加工,有的句号、逗号误用,还忘了后引号,分段太细了点,有些不恰当。李凤守着我修改。我一面讲一面改;有时我讲了,叫她自己改。最后写成了一篇好的作文。这时,下晚自习的铃声响了,从李凤开始写到修改完毕,只用了一小时。

这次偶然的作文指导,我觉得有以下的启示:

一、生活中有无数写作的题材,语文老师对生活要有敏感,要启发、诱导、培养学生注意生活中的题材。像这一篇作文,是一件新鲜事,写起来有新意,不会与其他文章雷同,避免了公式化。因为是新鲜事,学生有兴趣写。多写生活中的新鲜事,会逐渐地克服学生厌恶作文,害怕作文的情绪,并培养了学生对生活的敏感和创造性思维。

二、生活就是教育。让学生写生活中有意义的真人真事(包括别人和本人的事),写作本身就是一次教育。李凤过去爱同周平吵架,这次也写了周平的好处,这对于她本人就是一次团结友爱的教育。我校还不时有大欺小的事发生,我相信这篇作文广播和刊登以后,对其他同学也有教育作用。

三、“当面批改作文”是过去行之有效的一种好方法,可以加快学生写作能力的提高。如果边诱导、边修改,有时由老师讲了,让他自己改,可能效果更好。当然,这不可能普遍运用,但可以重点使用。

四、李凤的这篇作文长达八九百字,这是三、四年级学生作文中最长的一篇。李凤还不算作文很好的学生。由此看来,只要命题好,指导得法,学生的作文水平是会很快提高的。我们决不能亦步亦趋,因循守旧,要大胆探索,大胆创造,大胆革新,实现“以作文教学为中心,全面提高听说读写能力”的语文教改目标。

贪污受贿现象引起小学生 关注是好事还是坏事？

六年级的周游写了一篇自命题作文《浅谈贪污受贿》，贪污受贿现象引起了小学生的关注，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也许还有人认为：小学生年纪小，应该专心读书，不应该去过问这些事，深怕这会玷污小学生纯洁的心灵。我不这样看。我们的教育不应该也不可能是封闭的教育，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时代早已过去了。小学生虽然小却不能不接触社会，不能不听到人们的议论，不能不知道社会上的一些事情。如果他能够关心这些事情，特别是对“贪污受贿”这种祸国殃民的大事加以思索，进而发表议论，这就说明，他已经萌发了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并且有了判断是非的能力，这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大好事！

周游还写过一篇《家乡的小河》（题目改为《家乡小河的今昔》更好），那是对于环境污染的抗议。尽管是小学生，他的视野已经扩大，他写的已经不是个人的快乐和忧愁，更不只是儿童的天真和游戏了。

周游诚然是一个早熟的儿童，不是所有的儿童都能够这样。但他的成熟的走向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在儿童中存在着无穷无尽的潜力，需要我们去开发和引导；我们应该提前培养儿童的公民意识和关心国家、关心全人类的博大胸怀。

赞娃娃报

四年级语文教师黄斌建议，每个小学生自办一张手抄报，作为语文学科活动课的一次活动。我听了很感兴趣，觉得这是发展学生创造能力的一种很有益的尝试。教研组讨论时，有人担心一、二年级的孩子太小，怕办不了。但一、二年级的教师说可以办。他们虽然识字不多，还不会作文，但可以绘画，简单的语句还是能写的，于是决定全校各年级人人办一张娃娃手抄报。

孩子们听了老师的动员，绝大多数都兴趣盎然，跃跃欲试。经过两个星期的准备，一张张娃娃报“出版”了。真是五颜六色，五花八门，琳琅满目，多姿多采，而又稚气可掬。先说“报”名，就有《少儿报》、《小学生报》、《童心报》、《知识报》、《娃娃报》、《海洋报》、《儿童报》、《行知报》、《智力报》、《少年先锋报》、《星星报》、《瑶瑶报》、《苗苗小报》、《叮当小报》、《儿童手抄报》等等都是他们自己取的名。他们在报头下还把总编、主编的头衔赫然写在自己的名字上面和下面。再说报纸的栏目，有“语文”或“作文天地”、“漫画之窗”或“漫画王国”、“英语世界”、“数学天地”、“成语趣话”、“名人警句”、“名人名言”、“知识海洋”、“动物世界”、“科海拾贝”、“寓言故事”、“音乐天地”、“笑

话天地”、“游艺乐园”、“巧解题目”、“笑一笑”、“猜一猜”、“谜语”等，还有孩子们喜爱的古诗、新诗和自己写作的新诗。一位五年级的学生画了两幅连续的漫画：第一幅，画着爸爸在扫地，孩子说：“爸爸，我帮你扫！”手里拿着扫把，爸爸面带笑容，说“真乖！”第二幅，孩子手里拿着作业本，望着爸爸说：“你帮我……”爸爸作惊愕状，站了起来。这两幅画很有意义，而且画出了爸爸和孩子的神态，画得维妙维肖。有一个女生写了一篇《我二十八岁》、幻想当了一名小学教师，把自己的爱倾注在孩子身上，把丰富的知识教给学生等等，写得很真诚。

当然，这些手抄报的作者编者，年龄不同，知识有差距，也有的写得歪歪斜斜，语句有些不通，也有错别字，但这是他们自己的作品。虽然也有家长帮忙的，但为数很少。这次活动确实培养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培养了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从这些稚气的小报上，可以看出：小学生的兴趣是广泛的，他们有表现自己思想和能力的强烈愿望。有的个性表现不足，这说明我们的教师和家长对孩子个性的培养还不够充分。我们应该因势利导，启发学生更主动地去多方面积累自己的知识，发展自己的个性。

1997.12.10

（原载行知实验学校主办的《家庭教育报》）

语文教学与美育

在中小学各智育学科（包括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生物、化学、物理以及小学的自然常识、社会常识等）中的美育，是一种辅助手段，主要目的是更好地完成各学科各自的教学任务，这就是“以美启真”。虽然这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换句话说，美育必须渗透于各智育学科的教学中去，但不可喧宾夺主，把本学科的任务放在次要地位，孤立地去进行审美教育。

在各智育学科中，只有语文有所不同。因为语文教材中有大量的文学作品，本身就是艺术品，或具有艺术性的文章。而艺术教育主要就是审美教育，所以语文中的美育，比其他智育学科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

有一种较普通的看法，认为语文是工具学科，语文的学科性质就是工具性。这有一定道理，因为语文的确是学习各门学科、进行各种工作以及人际交往的重要工具。语文是动用得最广泛的工具。

可是，语文不仅仅是工具，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不仅仅是培养学生熟练地、正确地运用本国语文的能力。如果说，“文学是生活的教科书”（高尔基语）。那么语文也就是生活

的教科书，它教育学生怎样生活，它关系到塑造一代新人的灵魂。我曾在《当前作文教学的关键在哪里》一文中，把作文教学提高到培养什么人的高度来认识：是培养默守陈规、人云亦云、谨小慎微的君子呢，还是培养朝气蓬勃、独立思考、富于开拓精神和创新精神的一代新人？作文教学如此，语文教学就不必说了。

一、美文的教学

美文主要指文学作品和具有文学性的教材，包括说明文和议论文。小学语文教材多是具有文学性的教材。教材中有各种小动物，常用拟人手法，很符合儿童的兴趣和爱好；有各种美育形态，不仅有优美、还有壮美、崇高、喜剧和悲剧。第二册的《咕咚》一课就具有喜剧性。喜剧常采用误会法，这篇课文用的就是误会法。教师要启发、引导学生感受美文之美。首先，要引发想象，教师要通过课堂教学调动学生的想象和联想，要用优美的语调、生动的比喻、修辞，创造具体可感的形象和情境。其次是激发情感。要让学生进入情境，深入情感体验。什么是情感体验？简单说，就是将心比心。例如《一只小羊羔》这一课，要让学生体验：小羊羔失去了妈妈，是多么难受；最后，“小羊羔又回到妈妈的身边”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安全、温暖、妈妈的抚爱。再从巴特方面来体验：巴特找到了小羊羔以后怎么想？他想：小羊羔失去了妈妈是多么痛苦，所以他抱着小羊羔急急忙忙去寻找小羊羔的妈妈。他寻不到，只好把小羊羔送回自己的家，让它得到温暖和食物。当他知道小羊羔的妈妈在牧场时，又急急忙忙把小羊羔送到羊妈妈的身旁。

这样的教学，就达到“培养一颗爱心”的目的。陶先生

的“爱满天下”：一爱人民，二爱宇宙万物，同宇宙万物建立一种审美关系。我们要在儿童的心里，撒下“爱满天下”的种子。这就是立美教育。

美文的教学也需要概括和理性的总结，但必须建筑在丰富感受的基础上。

我们特别提出“感受”，是针对中小学语文教学中的纯理性教学出发的。纯理性教学的特点是：

1 不重视整体的形象感受，不重视想象力的培育，语言枯燥、单调、空洞，缺少感染力。

2 公式化的教学。一个套子到处套。美文的每一篇都有自己的特点，不能用一个或几个固定的套子去套的。

3 满足于抽象的中心思想的归纳，舍弃了课文的丰富的有血有肉的内容。

4 生硬的外加的政治思想教育。

二、作文指导

作文是学生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最好的锻炼，必须重视作文指导。

首先要解决一个基本标准问题。许多语文教师都认为，一篇作文应该是：中心明确，条理清楚，用词恰当等等。他们往往忽视了一条最基本、最重要的要求，这就是：用自己的语言写自己的感受。即使上面的要求都作到了，但写的是套话、空话、假话，没有自己的感受，没有自己的语言，就决不是一篇好文章。

不少教师只注意引导学生去观察，不重视引导学生去感受。“观察”是客观的，理性的，而“感受”是审美的，情感的。杜甫诗：“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众山并不

因为杜甫登上泰山就变小了，“众山小”，只是杜甫的主观感受。“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并不是经过丈量的确有三千尺，只是李白感到它很高很高；也并不是真的银河落下来了。由此可知作文不能只靠观察，更要有感受。这种感受不是用客观的标尺能够衡量的。

第二、不要用“中心思想”之类的东西去约束孩子的思维，要让学生写他喜爱的人和事物，让他尽情地倾吐，滔滔不绝地叙说。怕的是无话可说，语言贫乏，思想贫乏，情感苍白。

我在师范学校教书时教过一个普师班，第一次作文我出的题目是《国庆节见闻》，为了摸底，我不作任何指导。全班最小的女生张写的是她在街上见到一个小学生捡到钱包，归还原主的故事。一看就知道是瞎编的，我给了她 50 分，不及格。可是一年之后，她跃居全班前几名。后来她写了一篇《夏夜》，描写她因中考考得不理想，心中郁闷，出门在院坝乘凉，望满天星斗而浮想联翩，终于消除郁闷，心情舒畅起来。我因为这篇文章想象非常丰富而给了她高分，把它印发给全班同学（我常把优秀作文印发给学生）。但这篇作文说不上中心思想明确。其实，许多名作中心思想都不是明确的。浅露的文章并不是上乘之作。（当然这不包括议论文）

第三、要着眼于抒发真情和发展想象。中小學生之所以害怕作文，就是因为他们认为作文是“做”出来的，必须装腔作势，有些话不能写，有些内心活动不能写。有一个学生向我诉苦说没有什么可写的。经过我启发之后，她写了《当我听到语文分数的时候》一文，写出了她探听语文分数时的惶恐心理和得知语文不及格后的懊悔、自责和痛下决心的心理过

程。我给了她高分。

许多同行都常抱怨教语文要改作文真恼火，把这件事当作一种沉重的负担。我却把批改作文当作一种享受。我常在批改作文时被学生作文中的感情感动得热泪盈眶，学生作文进步很快又使我十分兴奋和高兴。

真的感情和丰富的想象，使学生的作文一人一个样，一文一个样，人人不同，篇篇不同，文章有了个性。有了个性才有创造性。

第四、不要排斥细节描写，要指导学生写细节。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有出色的细节描写。可以说，没有细节描写就没有文学。

有一段时间，我生活在贫苦老百姓之间。有一位邻居老大娘写家信一定要我代写，别人代写她总是不满意。为什么？别人代她写时，把她罗里罗嗦说的一堆废话全部删去，只写重要的事；我却把她的原话照样写下来。因为我懂得，那些罗里罗嗦的话正是她的情感的流露，并不是废话。她的儿女读到这些话就好像听见老妈妈在说话，删去这些就一点没有亲切感了。

第五、不要有不恰当的政治要求。也是我在师范校任教的时候，我的一个学生的作文被选进《优秀作文选》。标题是《班主任》。文中说，她们那时候很调皮，班主任却很耐心，其中有“她用眼泪和我们交谈”一句，编辑教师把“眼泪”改成了“真心”。这一改，就完全把文中的动人之处改掉了。为什么要这样改？大概是因为：这位编辑认为要写人就要写完人，写班主任就要写模范班主任，而模范人物是不能掉眼泪的，老师掉眼泪，还有什么教师的尊严呢？这样的

指导思想实际上就是一种不恰当的政治要求。这样的要求常常会扼杀儿童的创造性。

作者附注：

此文是我在内江教育学院小教班和行知学校师资班讲《小学美育》的一段讲稿，有删节。讲稿有些地方是提纲式的，也有增添。

《语文教学中的形式美教育》一段限于篇幅完全删去。

（原载内江行知实验学校主办的《创造园地》第二期）

“六大解放”与素质教育

—

陶行知把生活教育与传统教育鲜明地对立起来，针对传统教育对儿童的六大束缚，提出并实践与之对立的“六大解放”。育才学校就是“六大解放”的楷模。这种革命精神是很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的。返观今天的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我觉得颇有相似之处。一切为了分数，像陶夫子尖锐地指出的“杀人的考试”，不是还在影响着广大的地区和大量的学校吗？素质教育的锣鼓尽管敲得很响，许多人还是充耳不闻。中国太大，传统的积习太深，真正大面积实现由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转轨”还需要长期的艰苦的工作。而改革的先行者首先必须坚决、彻底地与传统教育思想、与应试教育观念作彻底的决裂。

今天的应试教育仍然存在着“六大束缚”。与之相对，仍然迫切地需要“六大解放”。“六大解放”不仅是生活教育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素质教育题中应有之义。

今天仍然存在的“六大束缚”，不同程度地有如下的表现：

第一、“脑”的束缚：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现

象并未根本改变。机械划一的“标准答案”束缚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陈至立部长举了一例：“标准答案”是“齐心协力”，学生答“同心协力”，错了。

第二、“手”的束缚：书本为中心，这就束缚了学生的双手。考试都是书面考试，应付考试妨碍了学生能力的发展。

第三、“嘴”的束缚：教学实际是“灌”，不需要学生用嘴。即使是提问，也是书上有的或老师规定好的现成答案，照答就是了。

第四、“眼”的束缚：用眼只是看老师看书本，不需要看其他什么。

第五、“时间”的束缚：时间全被功课和作业占据了。侵占了学生每天应有的自由活动时间，侵占了学生的睡眠时间，侵占了双休日，还侵占了音乐、体育、美术的教学。大面积的补课，加重了学生的负担。这个问题，陶夫子批评得很尖锐。

第六：“空间”的束缚：有些学校标榜自己是封闭教学。学生足不出户，用不着去接触大自然和大社会，每天被关在鸟笼式的学校里。

二

“六大解放”从何着手？如何进行？陶夫子说：“首先要为儿童争取时间之解放”。从我们今天的情况看，也正该如此。

应试教育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拼时间，拼体力，题海战

术，加班加点。造成的后果是：严重损害儿童的健康；机械记忆，无视能力的培养；只重课本，知识面狭窄；德育、美育被削弱以至被抛弃，学生的心理负担沉重，产生厌学、畏学和各种心理疾患。

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争取时间之解放，成为社会舆论注目的焦点。内江行知实验学校及时抓住这个问题，作为全部教改的突破口。

学校作出一系列的规定：

一、不许利用任何课余时间进行大面积补课；

二、不许占用音体美及其他非应试学科（英语、计算机、自然、社会）的课时来上应试学科（语文、数学）课，在临近期终考试前也不许占用。

三、不许拖堂压堂；

四、精选作业，根据不同年级规定每天的课外作业（家庭作业）量，低段为半小时，高年级不超过一小时；规定双休日作业最多不超过两小时。

当然，单从“减负”这方面做工作，单从“解放儿童的时间”着眼是不够的。“六大解放”是一项系统工程，脑、手、眼、嘴、时间、空间必须全面解放。从“减负”的角度看，“减负”不能以降低教学质量为代价，恰恰相反，“减负”与“提高教学质量”必须互为前提，互相促进。因此，行知校是把“减轻学生负担”与“提高教学质量”并提的，同时把“六大解放”贯穿于其中。

一、提出“低耗、高效、长效”作为“提高教学质量”的总目标。“低耗”即用较少的时间和精力；“高效”是取得较高的教学效果，即通常所说的“四当堂”，向四十分钟要

质量；“长效”即所学知识，技能与感受内化于学生的心理结构之中。小学教育是一种奠基工程，是终身学习的基础，所以必须追求“长效”。

二、改革教法，指导学法。主要是体现学生的主体性和教师的主导性。在课堂教学中，行知校总结教师的经验，提出“五官并举，脑为中心（即‘奉大脑为总司令’）”。这是校歌《手脑相长歌》的发展，也是“六大解放”的应用：用眼观察，用耳倾听，用脑思考，用嘴发言，用手操作。这是全方位的动员，这是儿童主体性的充分实现。行知校以这种主体性发挥的程度来评价一堂课的优劣。教师遵循儿童心理发展的规律，用多种创造性的教法来启发、诱导、发挥儿童的主体精神，争取最佳效果。

在各种器官的协调动作中，我们强调了“脑为中心”即调动学生的积极思维和独立思考。我们的小学生能够大胆指出教师的板书错误和发音不准；在高年级，能够超出小学生的常规要求写议论文，抨击社会上的不良现象。

“五官并举 脑为中心”适合于各科教学。语文教学中的听说读写，就是耳、嘴、眼、手、脑的运用。五官在运用中要相互联系，相互支持，要以大脑做总司令；语文教学中的听说读写也是这样。只有五官的充分利用，只有听说读写能力的全面提高才是语文素质的全面提高。

三、目标教学与课后检查。行知校规定每一门课一学期，一个单元，一课时，都应有明确的目标。目标必须向学生揭示，以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师生合作，配合来达到目标。一课或一单元结束之后，教师要搜集学生的反馈信息，分析研究，写出“课后检查”。如此，避免了教学中

的盲目性、随意性，促进了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

四、面向全体学生，让优生超前发展，让后进生也有成功的喜悦，让全体学生都能得到发展。行知校根据不同接受能力的学生、采用“分层教学”、“分类指导”和不同的要求；对后进生倾斜，实行“五优先”，即：提问优先、辅导优先、批改作业优先、表扬优先、与家长沟通优先。还为后进生有显著进步的颁发“进步奖”。

五、“分数第一”是应试教育的主要特征，是应试教育的命根子。实施素质教育必须根本改变这一现状。为此，行知校起初规定：不排名次，初步淡化分数观念；然后，先在语数以外学科改百分制为等级分制。没有遇到太大阻力，于是，在1997年，在全市率先全面实施等级分制。这一举措，大大减轻了学生的思想压力。避免了因为分数而造成的悲剧；也为实现“六大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

随着等级分制的实施，行知校把每期末发给家长的成绩通知单改为“学生整体素质报告单”；同时对学生的评语进行改革，将过去那种冷冰冰的法官式的评语，改变为第二人称的亲切、友爱、带激励性的评语。这一改革，深受学生的欢迎，也得到家长的好评。

三

如果说，减轻课业负担解放了儿童的时间，提高教学质量和改革评价制度解放了儿童的脑、手、眼、嘴，体现了学生的主体性，那么系列活动课的开展，就更进一步扩大了“六大解放”，使学生的主体精神和创造能力得到更充分、更

全面的和谐发展。

行知校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因陋就简，尽最大可能，开展了以下活动课。

一、学科活动课。如讲故事比赛、自命题讲演比赛、辩论会、手抄报、香港回归知识竞赛活动、速算比赛、英语角、英语打电话活动、学生出试题、相互评分活动（数学复习题）、计算机兴趣小组、美术兴趣小组活动、黑板报、墙报等。

二、社会实践课。红领巾广播站、红领巾监督岗、手拉手与乡村小学结对子活动、“重庆，你好！”（访问重庆的活动）、慰问孤寡老人、慰问老干部活动等。另外，社会课的“模拟买卖活动”、“参加储蓄活动”、自然课的“考察自然水域”，既是学科活动，也是社会实践活动。

三、审美活动课。校合唱队常年坚持，已能唱二部合唱和三重唱，培养了独唱尖子、小指挥、辅导电子琴学习；美术专刊、美术与书法作品展览；文艺演出（歌舞、诗朗诵、自编自演的小品）等。

四、体育活动课。乒乓球队，羽毛球队、广播操比赛、运动会等。

五、劳动活动课。经常性的净化环境、美化校园活动；高年级“学木工修桌凳”活动；双休日“今天我当家”活动等。

六、阅读活动课。阅览室每天开放一小时，星期天晚上不上晚自习，开放一小时。每年增购图书。四年级以上学生每期读书八本以上，多的达二、三十本。除学校阅览室外，有的班级还有“图书角”。

行知校在组织这些活动中，充分尊重儿童的主体地位，教师只起指导作用，决不包办代替。孩子们在各项活动中，丰富了知识，培养了特长，学会了协作，锻炼了才干，营造了一个孩子们喜爱的学习环境。

“六大解放”是素质教育的必由之路，必须长期坚持。为了因材施教，发展特长，行知校建立了学生个性档案。近年又开展记班主任日记的活动。班主任经常记录观察、了解、教育孩子们的所得。近期我们摘录了一位班主任的日记，刊登在自办的《家庭教育报》上，爱到家长的好评。

1997年

梦 与 现 实

夜深了.....

夜深了.....

黝黑的苍穹
向我倾吐着寂寞

雨点
在低泣.....

冒着风雨
到那遥远的地方去吧
那遥远的
 故乡的溪边
那儿
雨点是在和溪水亲吻

冒着风雨
我要到那遥远的溪边去的
我还要越过那高耸着的山顶
去轻叩你的窗扉哩

睡熟了
睡熟了
是吗？
好
风雨的夜里是可怕的
你这多梦的孩子
又梦见了什么呢？

你笑了
你苍白地笑了

雨点
还在不断的
敲打着我的窗扉

夜深了……

1942年冬，成都

（原载1944年《成都快报》及《流星月刊》。后者发表时题为《夜深了》（外二章）另外还有两首诗。）

花 朵 的 梦

幽静的夜里
我有无数的花朵的梦

我梦见你
穿着花朵的围裙
从斑斓的繁花丛中
跳着舞来了

你，跳着舞来了
你，唱着歌来了
你的歌声
使溪水明亮了
于是溪水里漾出了许多绿色的花朵
太阳也变成
一朵壮丽的闪烁的花朵了……

你，跳着舞来了
四面洋溢着花的芳香；
你，唱着歌来了

天空中散播着花的音乐；

你的脚底踏过的每一寸土地

到处绽开了鲜艳的花朵

—— 繁花的大地

繁花的宇宙呵

我从花朵的梦里醒来

灿烂的星花正向我眨眼

暗笑我心中藏着一朵火红的花

正在燃烧，永不泯灭……

1994年，成都

（原载《新中国日报》）

无 题

你走了——
走得那么渺茫
像一阵静穆的微风

你走了——
把这一缕幽光留给我
把无尽的思念留给我

月亮下坡了
田野是一片荒寂
夜游的袅鸟在飞叫
—— 你还不回来

孤单的更夫
从邻近的街道走过
梆声撒落在黑暗里
—— 你还不回来

烛花悄然下坠

墙壁上的人影更淡了
—— 你还不回来

夜更深……
你不回来
只有这一缕幽光
伴我……

一九四五、九、廿一夜，于小庄

（原载《新中国日报》）

马 路 旁

一辆吉卜车驶过去了
马路上扬起了万丈尘埃……

马路旁边
一个小孩
坐在一个矮小的草棚外
草棚里面
躺着一付小小的火匣子
火匣子里面
躺着他
不幸的小小的妹妹
（昨天
她被碾死在马路旁）

他眯着眼睛
轻轻地撕着纸钱
飘散、飘散……

四野是一片荒凉

他的脚边摆着一张纸：

“ xx氏 孤 苦 无 告
丈夫被拉去当丁
女孩子
昨天又被汽车辗死
恳求仁人君子
施舍施舍
也好掩埋这小小的女孩…… ”

偶尔有一两个行人
好奇地在他的身边望了一望
又轻捷地走了过去

荒凉
荒凉呵

也许
人世已经没有了
春天
这儿是一片阴森哟
只有无尽的沉寂
伴着她长眠……

（原载一九四五、九、十二《新中国日报》）

遥 寄 李 牧

李牧，原名李煜生，于 1944 年去解放区。1945 年，我写这首诗以抒怀念之情。

匍伏着，蛇行着
怀着不屈的意志
你终于通过了漫漫的长夜
到你日夜向往着的
地 方
去了！

设想：
你的缄默的受难的面容
该已绽开了笑的花朵；
你的沉郁的歌声
该已像蓝天一样
晴朗、辽阔了吧

那地方

有春天的阳光
有泛滥的生命的歌.....
有工作，有温暖
有爱

而我们
却依然在暗夜里爬行着
带着沉重的喘息和
焦灼的想望

你勇敢地
决然地去了
——留下了我们

但我们是坚强的
我们依然在风沙中
锤炼着痼哑的歌
我们歌唱着，呼唤着
呼唤沉睡的人们
呼唤红色的战斗.....

终于有一天
我们是会再见的
那时候呵
我们将不再有忧愁

（发表于1949年成都《光明晚报》）

夜 感

哎，这宁静的嘉陵江畔
闪耀着点点灯光
像无数颗晶亮的星
装饰着华贵的天庭

仿佛，那儿是一个天国
那儿是一片
透明的土地
有银色的故事
和银色的梦幻交织——

嘉陵江水平静地流着
没有浪潮，没有澎湃
仿佛它已经忘掉
那将要爆发的明天……

1946年初春，于重庆育才寒假见习团

出 走

——我要掩埋，我要发掘
我要抛弃，我要寻找

——庄 涌

我第三次出走了。

混杂着愤怒和悲哀，我迅速地捆好了被盖卷，锁上了那一口满是书籍的箱子。许多心爱的书籍都被我恋恋不舍地但终于决然地丢抽屉里了。我一手抱着被盖卷，一手提上那笨重的箱子，蹒跚的走出去。心里一面惴惴地跳着，一面却又担忧着我的那些心爱的书籍：我什么时候能够再看到它们呢？我立刻想起前一次我出走后父亲把我的书籍撕成了一大堆烂纸，我伤心地坐在那纸堆前哭泣的情景，我就心酸起来了。但这时我已经走到大门边，没有再回头一下，一面也剧烈地害怕着被发现，我很快的就跨出去了。

我走出门，我的妹妹正在门前等着。她知道我是偷着走的。她的十一岁的圆圆的小眼睛满含哀愁地望着我。她正病着，眼色那么苍白。我将要和她分别了。我在她的耳边悄悄的说：“我走了。你的病要好生注意，一定给父亲说，要找西医才好，中医是靠不住的。”她木然地点头。我想了一想，找不出旁的话给她说了。难道我能把我的感情和我的希

望告诉她么？我上了黄包车，向她黯然一笑，那车子就默默地载我走了。——我能再同她说些什么呢？

车子很快的转弯，我便再也看不见我的家了。心里陡然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虽然一面耳朵还在听着训诲的词句，但一面却暗自庆幸，它再也不能来麻烦我了。然而凝望远方，却有一种迷茫的情绪袭来，交织着我的喜悦之情。这时夕阳已经下坡了，宁静的街道上辉耀着金黄的光芒，那光芒是寂寞的。

车子往前走着，我的心错综复杂地想着许多事。我想着就要失去的家庭的温暖，想着我的理想和我的前途，也想着贫穷与饥饿。于是我仿佛飘荡于大海中，更加迷惘了。一幕一幕生活的悲惨的场景在我的脑里映现。然而我想起萧红的初冬，想起屠格涅夫的门槛中的女郎，想起M高尔基所描绘的“海燕”，让暴风雨来得更厉害些吧。”于是我便觉得自己有了生活的力量，立刻又回复到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的喜悦和对于未来的沉溺的幻想了。

1947年 10月 3日夜

（原载《西方日报》）

彩霞燃烧在东方

彩霞燃烧在东方
为什么看不见你，我的姑娘

我守着窗口儿伫望
我望见一片青葱的树林
—— 像你的衣服一样
我听见雀鸟的喧嚣
青年的男女从我的窗下结队而过
为什么偏偏看不见你，我的姑娘？

看不见你的双垂的发辮
你的明亮的眼睛
听不见你的清朗的歌音
你的激荡的呼喊……
（那曾经强烈地叩击着
多少个被迫害者的心）
呵，这日子
怎么能说是春天？！

我的姑娘
你在哪里？

我找遍了少女的行列
找不到你；
我找遍了歌手的行列
找不到你。
你曾经站在歌手的前列
用嘹亮的声音呼唤着斗争的
你，今天
为什么暗哑了呢？

彩霞燃烧在东方
为什么看不见我的姑娘
为什么新生的不快些成长
为什么不尽情地歌唱……

我的姑娘
我在窗口守候着你呀
我在窗口伫望……

1948年 4月四九血案后，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
(原载《西方日报》)

赞 歌

——给 S. L

你是一只南来的燕子
一路叫着唧唧、唧唧
飞过辽阔的自由天空
到处传播着春天的消息

你是一支清晨的歌
激荡着铿锵的悦耳的音乐
每一个人都要赶快起来
去奔赴今天的新的工作

你是一点耀眼的火苗
在无边的原野上快活地燃烧
猛烈的大风将卷起巨火
烧毁尽一切的愚昧和污浊

你是一粒饱满的种子
在松软的泥土里愉快地呼吸
滋养你的是太阳和雨露
你将要成长为一棵大树

1956年 内江

夜坐补衣听广播国际歌有感

一

昔日我唱国际歌
少年气壮震山河
只为主义要实现
徒手敢与虎狼搏

二

今夜我听国际歌
万感萦怀如缠蛇
红旗漫卷凯歌奏
我独抑郁尚蹉跎

煮饭自嘲

一天忙于三顿饭
锅前灶边团团转
男儿空有报国志
投入灶里化灰烟

1967年 11月

终点，又是一个起点

——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那是悬崖绝壁
那是惊涛骇浪
崎岖的小路
荆棘丛生……

那是爱人的眼泪
那是噩梦中的呼喊
无边的忧虑
熬白了少年头

—— 过去了
终于过去了
人生的航船
驶进了一个港口

可以喘一口气了
可以定一定神
握一握四面八方伸来的手
亲一亲我的亲爱的小心肝

“这是安全的避风港吗？”

不！

不能停泊在这里

这是一个终点

但更是

一个

起点！

亲爱的同志

不要老是说——

“我们是无罪的……”

是利刃

必须再一次磨亮

是理想

必须再一次闪光

共产党员

不是基督徒

不需要忏悔

不需要祈祷

不需要叨念着圣经

祈求灵魂的安息……

启锚吧
我的航船
迎着东方的晨曦
乘着壮阔的风浪！

1982年 4月 12日

诗 就 是 火

朋友劝我再执笔写诗
我说我心中没有诗情画意
没有蓝天白云，没有浅酌低吟
我心中只有一团火

朋友说
诗就是火 火就是诗
诗可以烧毁黑暗
诗可以照亮前程.....

1982年

赠女儿兼题影集

—

十六个斑斓的春天
编织成一串美丽的花环
你自豪地跨进了
青春的门槛……

忆一忆生活的轨迹
温一温童年的梦幻
向猫咪和小白兔告别
扬起你破浪的风帆。

二

这里，生活向你展开——
一张张笑脸
但每张脸都孕育过苦水
唯有你的笑最纯净 最甜

众多的笑浇灌了你的笑
苦汁经过过滤就剩下了甜
你看蔷薇为什么那样芬芳
她哪里离得开雨露和阳光？

你看那些眼泪洗过的眼睛
更加焕发出明亮的光采
你听亲人们爱的目语
一声声亲切地把你召唤！

1984年 5月 26日

华 灯 初 上

逆真理者死

旧小说上描写“天朝”进兵，描写“天朝”的大将之勇猛，往往一马当先，大叫一声：“顺我者生，逆我者死”！于是“贼”兵往往因而胆裂，于是“顺”了；然而也有不“顺”的，那就是“逆”。“逆”是必须“讨”的，于是就是一切混战，非到杀得尸骨堆山、血流成河不可。

希特勒是以“逆我者死”的姿态出现的；一切的侵略者迫害者是以“逆我者死”的姿态出现的。然而“逆我者”却不一定死了。“逆我者死”这一句怒吼落了空，轻飘飘地落在地上，无人理会。因为大家都明白，这一句话已经失掉它的意义；大家都相信，“逆真理者死”才是对的。希特勒以及一切侵略者迫害者是违背真理的，所以他们是必死无疑了。

“逆我者死”不能吓唬人了。先生们，那呐喊变成了讥讽自己的话，轻飘飘的落在地上，没有声息。被迫害者是已经站立起来了。

“逆真理者死！他们要向那些侵略者迫害者们示威！”

1944.9.3读报有感

（原载成都《华西晚报》副刊《华灯》）

层 出 不 穷

今天翻家里的旧书，又把那一部《阅微革堂笔记五种撷钞》拿出来，那是《阅微革堂笔记》的缩本。读这一类书，素来都是跑马观花，觉得它的内容也不过尔尔，可是这一回却不然。翻开书的第一篇——改成缩本者的序，就激起了我的兴趣。不特此也，且使我觉得这类书也不是不可细读的。我们可以从中发现许多精微的理论，可以从里面看出一些伪善者的真面目和那时候社会情形的一鳞一爪的：

“……意欲使阅者爽心豁目，即以之触目警心。夫冥然罔觉，悍然不顾，人心之锢蔽也甚矣，投以先正格言，非憚即厌，姑与之说神，说鬼，说仙，说狐，说世上一切人，晓以善恶邪正吉凶祸福之几，显示之而隐导之，虽锢蔽已甚，亦不禁其憬然悟，惶然愧，怒然悔。况未至于冥悍锢者乎？即此一编，反观内镜，可以为义夫节妇，可以为仁人端士，可以为忠臣良吏；下之亦不失为谨身寡过无灾之幸民。”

我们从里面看到什么呢？我们差不多看到了奴才对于奴隶教育的全貌。他们的思想比主子的周密，而且方法是层出不穷的。

历代的奴才管理奴隶的方法不外两种：一是纯粹的施用暴力，一是引诱。引诱又可分为“利诱”和“礼教的引诱”，

则是因人而施的。一般地说来，引诱是比暴力来得得体，因为前者是“治其身”后者则是“治其心”。

为了是出于文人的笔下，所以当然不谈利而谈礼教。

“民不出粟米麻纱以事其上则诛”之类的恫吓既乏效力，而终日正襟危坐向他们灌输四维八德又会使他们“非惮即厌”，于是奴才们于穷思极想、绞尽脑汁之后，就改变了办法：“姑与之说神、说鬼、说狐”，目的自然是一样；晓以善恶吉凶祸福之几，显示之而隐导之”，使他衷心颂扬主子，甘受主子的调遣驱策，可是手段平和多了。“孝子、悌弟、义夫、节妇、仁人、端士、忠臣、良吏”自然是幌子，使人们陷于深渊之中而不自觉。至于对付那些“冥然悍然”不懂礼教的人，无已，但至少的希望仍旧是有的：“下之亦不失为谨身寡过无灾之幸民”。那意思是说：你虽然不懂礼教，可是你总希望“无灾无害”希望“幸”要如此，你就非作个顺民不可了。可见奴才们的手段是层出不穷的。

满清之所以能够维持两百多年，奴才是有大半功劳的，他们不仅献媚了主子，且教育了奴隶。

1944.8.24

（原载成都《华西晚报》副刊《华灯》）

给叭儿狗

“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我们的社会里是经常存在着这种矛盾现象的。

譬如这一次的援助贫病作家运动吧，援助的人都是出于衷心的、热忱的帮忙。试问他们是为着什么呢？他们不是凭着良心的激发吗？然而却偏有站在旁边说风凉话的人，既非作家，所以只能拆拆烂污。什么“活该”呀，“怎么不改性呢”？为什么要人救济”？似乎作家的罪恶滔天，死有余辜了。

作家之所以至于贫病，就是因为他能够守正不阿，不善逢迎，不会作叭儿狗。这大概就是那位先生所谓的“罪恶”了。那位先生自然是很“健康而富足”的，自然是会作叭儿狗的。所以对于这些既贫且病的作家感到讨厌，对于这些援助贫病作家的人感到无聊，“怎么不改性呢？”作叭儿狗呀！不会作叭儿狗的人，挨饿自然是“活该”！

然而作家仍然是作家，仍然要继续勤苦地工作。虽然贫而且病以至于死也不改性，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岗位上！而那位先生的话却轻飘而无力，实足以表现自己的卑劣无耻罢了。

呜呼！叭儿狗，滚蛋吧！

（稿费捐献贫病作家）

1994年10月 原载《华西晚报》《华灯》

“偶拾”之余

近来“偶拾”的风气似乎很盛，你也“偶拾”，我也“偶拾”，他也“偶拾”，大家都来“偶拾”，简直不亦乐乎？于是作《“偶拾”之余》，聊以效颦。虽然不过拾其余唾，或者甚至尽是渣滓，也不去管他。是为序。

变相的本事说明

最近电影院动辄出××特刊，那内容不过是变相的本事说明。推测他们的居心，不外三种：一、可以省掉印本事说明的费用；二、可以借此再赚一笔钱；三、可以增加片子的价值。

按印片子的本事说明，本是电影院对观众的义务。电影院所出的特刊，内容贫乏，除了本事说明之外，几乎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不说，而且售价昂贵，被广告占去了大半篇幅。电影院不但没有尽到他的义务，反而对观众加以额外的剥削。我们认为，这是不合理的。

因此，我们觉得，似乎什么都商业化了。什么文化、教育，其实都是为了赚钱。呜呼！

闲情逸致

《文艺先锋》曾经刊载过徐蔚南先生的《食三题》洋洋洒洒，凡数千言。对于咖啡、茶叶、水果之类，阐述无遗。我们从那“文章”里可以知道徐先生是如何精于食事的了。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我们的大人先生却有闲情逸致从事这样的“研究”与“著述”，真是不可多得。而且也正说明了我们中国人的从容不迫，和“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精神之可敬；反映出了大人先生们的生活与思想。

前几天似乎看到过一篇文章，描写某大学女生组织了社会服务队，然而因为和贫民距离太远，不明了他们生活的底蕴，所以依然无法教育他们，改善他们。（大意如此，记不清许多了。）徐先生的“文章”，自然不是给他们看的，不过当其想到一个人在饿饭的时候是没有心情欣赏咖啡之类的东西时，恐怕也有些煞风景吧？

1944年 11月，原载《华西晚报·华灯》

土豪与教育

温江县三圣乡保国民学校的女教师在呼号了！她们“受土豪的蹂躏流氓的侮辱，痛苦已到极点。”保长要学校停课，乡队附就“身带武器”，“将学校估作招待所”，于是“男女杂处，遍设赌场，大开红灯吸食鸦片。”她们不能忍受，去向保长申述，而乡队附文美芝就“耸使其兄弟伙（流氓）舞弄武器恐吓”，并且说：“好大一个教书匠，敢喊保长与你清查，给我滚蛋，随便喊两个坤角（女伶）来教……”云云。

这一类事情，当不自今日始。于此，我们也颇能窥见土豪劣绅横行的一斑了。他们可以“将学校估作招待所”，可以在学校里“男女杂处遍设赌场”，“吸食鸦片”，他们可以动辄耸使兄弟伙“舞弄武器恐吓”，可以叫教师“滚蛋”……一句话，他们可以任意横行，摧残教育固不必说，所谓“人身保障”等等，在他们，也是等于乌有的。遥想他们威气凛凛、杀气腾腾，简直大有土皇帝之风矣。君不见：估拉壮丁，吞食公款，非法逮捕以及一切无耻的勾当，他们都干得出来么？

明白他们生活的底蕴，对于他们摧残教育的行为就不会感到惊诧了。他们对于教育的摧残不遗余力；他们对于国家一切法纪的摧残也都不遗余力。

然而，就教育一方面讲，也就当惊心动魄于“为人师”之难。物质方面的困苦固不必说，而且还要受精神上的痛苦（遭人嘲谑），甚而身体也没有保障“舞弄武器恐吓”；随便喊两个坤角来教”。教师之与坤角，在那些土豪的眼里，竟都是一样的贱民。

目无法纪，任意横行，只图自己享乐的土豪劣绅，能够尽量的享受，而不受到针砭与责难；反之，肩负着伟大的教育的使命，贫穷而困苦的教师，却是怎样的在受着别人的污蔑、侮辱、恐吓……于此，我们也可以知道，中国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了。

1944.11.17黄昏。原载《华西晚报·华灯》

一点感触

偶然从一个小学校的门前经过，正碰着那些小孩子们在唱着国歌，于是在外边玩着的孩子们也都停止游戏，很肃穆地“立正”了。看着这景象，我心里不禁发生不小的感触。我想：假如这时，这些来往的行人中有一个停下脚步“立正”，一定会被目为“疯子”或者“宝气”。^①所以，目前的社会，是非黑白是颠倒了的。能够遵纪守法的是“疯子”或“宝气”，违法乱纪的倒是“圣人”、“君子”，“长者”……了。

明白这个，也就明白：我们国内的贪污案为什么会层出不穷，而且既经查觉之后又每每没有下落；我们的文化人为什么会挨冻受饿。……总之，一通百通，天下万事，也都是“不过尔尔”的。

再：由这一点小事也可看出小学生的爱国精神之一斑，然而社会这个大染缸也终于会使他们变色的。这真是令人痛心疾首的一件事。

——救救孩子！

1945年1月 原载《华西晚报 华灯》

^①“宝气”，四川方言，是“傻瓜”之意。

“ 对症治疗 ”

不知怎的，近来忽而注意到广告，觉得也很有趣。它正反映出了一般上层阶级的人们生活的一鳞一爪。虽然是一鳞一爪，但可以举一反三，推测到他们生活的全部。

顺便拿一张报纸来看吧，让我把它的广告摘录几条：

胡定国（各期梅毒、男女性病、妇女子宫病、鱼口坠桃、疳白浊，主治各病负责包医……）

苏州民生诊所特长花柳附设各科

彭铁珊精割包皮过长（……专治男女一切疑难性病及花柳……）

雀斑土痣，美容医药，以应时代男女来此对症治疗

世代祖传全福花柳病诊所

白浊肾病因何难治？

张国范诊所（各期梅毒、男女性病……）

……

这些广告是按着顺序抄下来的，并没有跳格。括弧里的是小字，不必抄出小字其意已明的就只抄出了标题。

这些广告说明了我们的“时代男女”“上层阶级”需要的是些甚么。这些登广告的“专家”正可以给他们“对症治

疗”。

唯其如此，这类广告就逐渐加多而且猖獗起来，甚至把报纸副刊的篇幅也全盘夺据了。然而这是无可疵议的事情，因为那理由是正确的：“对症治疗”。

1945年1月，《华西晚报·华灯》

丑态种种

出版家之只顾“生意”不顾出版书籍的质量似乎由来已久。由于这就助长了一般善于逢迎低级趣味的“作家”的气焰。目前，张××的小说就是例证。但这还不算“竭尽谋利的能事”，若夫以出版家而兼任“作家”，那就更能得心应手、应付裕如了。投机取巧，生吞活剥，把别人的译作窃取一部分，稍加改窜，就成了自己的译作。一举两得，名利双收。不特此也，下焉者竟然自吹自擂，在自己的“著作”里为自己鼓吹，简直成了变相的广告。譬如重版了四次的之江先生的大作《战时英语会话》，就曾把他自己译的《家》大吹了一番。在“增订三版”中附录得有一篇《回顾与展望》就是一篇典型的“广告文”（不知为什么，在增订四版中又删掉了。）

在这篇广告文中，全篇叙述“各报馆”如何“竞载”他的译稿；他如何编杂志受欢迎，如何“打击敌人的帮凶”；他又如何被别人“冒名顶替”。后面的几个“注”，又都各各变成了他的广告。令人奇怪的是，在巴金名著的翻译中，竟然“内中专讲觉慧和鸣凤的罗曼史”。肆意歪曲和窜改名著，以迎合读者的低级趣味，这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

这位把自己捧上天的之江先生，尽管吹得天花乱坠，这

篇广告文却没有达到中学生作文的起码水准——通顺都说不上。

“……所引为欢悦的，倒不是自己的译稿经常有三四份报纸同时竞载，却是自己的劳力并没有白废。虽则自己的工作与抗战没有多大的助益，然而它已经刺伤了敌人和汉奸的心。……”

既然“劳力没有白废”，为什么又“与抗战没有多大的助益”？难道有价值的文化教育成果会没有什么助益？既然“与抗战没有多大的助益”，为什么又“刺伤了敌人和汉奸的心”？这真是矛盾的矛盾，不通的不通！

此外，以文艺为消闲品、玩弄文艺者大有人在；以文艺为效忠主子的工具，汪汪地狂吠者大有人在；借文艺出风头和以文艺来污蔑别人者大有人在。于是，燕风派的东西出现了；《谈相思病》、“名伶雅兴”之类的东西出现了；奉命攻击的东西出现了；专门俏皮、污蔑别人的东西出现了……。风起云涌，浩浩荡荡……

于是在这些丑态之下，读者们的眼睛迷糊了，他们只看见文艺界是五光十色，然而却看不清是些什么东西。

这些东西目前似乎还是方兴未艾，不知在什么时候才能绝迹。此时我忽而想起茅盾先生的对联：

饭桶洒囊亦功德

鸡鸣狗盗是雄才

这真是我们的文坛的绝好写照！

“教授”的话

某教授大放厥词，教青年多读中国古典作品。他说：中国的小说就只有红楼梦可读，此外，“经典文学”必读不可的自然是四书五经。至若目前的报章杂志，则“决不可读”！简捷了当，乾脆之至！

然而可惜的是：教授既不能早生几千年，又不能避开现实社会独自远远地跑到蛮荒之地。生活在现实社会中，而偏要劝别人逃避现实。那居心，不过是希望所有的青年完全变成白面书生，终日“之乎者也”，不问世事；希望所有的青年变成俯首贴耳、一言不发的羔羊。一句话：变相的愚民政策而已。

可是红楼梦和四书五经也不见得是可以读的，它里面也未必没有“毒”。最好是：“一切书籍，皆决不可读！”岂不更为一乾二净扫荡无余了么？”

呜呼！原来教授对于青年学生的指示就止于此矣！我不禁想起鲁迅先生救救孩子的呼声……

自然这种“教训”是没有人会接受的，然而因为它的动机的别有作用，就令人有些感到不寒而栗了。

教授先生，应该回头看看自己在走着什么样的路子了。

一九四五，一，十。病中

长城的围绕

某中学为欢送毕业同学及师生联欢，预备上演话剧《杏花风雨江南》。一切皆已筹备就绪。上演前一日，校长突然宣布停止。他说：别人在报上骂我们了，怎么得了，不能再演了，我们学校的名誉要紧……于是一团高兴，弄得不欢而散，欢送大会宣布流产。

而那报上是什么人在骂呢？不过是学生之一的泼皮无赖，因为自己没有出到风头，在那里撒撒烂污、出出气而已。殊不知这烂污竟然会有如此神奇之作用，居然把校长吓倒，而且把动员了数十百人的欢送大会一拳击垮了。

初听到这消息，我真不相信，堂堂一个校长竟会那么软弱，一个学校已经决定了的计划竟会那么容易改变，况且仅仅是为了一个泼皮无赖的文章。然而这竟然是事实！

那文章所持的理由是：说抗战方殷，青年不该乱七八糟，因为演出的戏剧，演员中有女生参加，似乎男生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别有动机云。

然而我独不解：抗战期间，不合理的事情多矣，青年学生不务正业，终日胡闹，当“飞机”，打群架，诸如此类的事，那作者似乎都熟视无睹，而独于这一件名正言顺的事喋喋不休，这不是作者的鼠目寸光，就是别有用心！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教育学生的学校当局是怎样的脆弱无力，我们的学生是在怎样重重的压迫下生活。鲁迅先生曾经觉得他的周围有长城在围绕，那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添补的新砖。以上所述，就是长城的围绕使然的。可是这长城，较之鲁迅所说的长城，本质虽然相同，花样却更繁多了。

不窒息于长城之内就要撞出去。虽然撞破头颅也不应该痛惜的，因为撞到长城之后，我们不但可以远眺，而且可以跨越而过哩！

一九四五，一，十四夜改
(原载《华西晚报·华灯》)

出 卖

今天从一条街上走过，看见围了一大堆人。走拢去一看：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正坐在地上，有点焦急地“哼”着。苦着脸儿陌生地望着四周的人。“哼！哼！”然而却并没有哭。她的头上插了一根稻草。旁边站着一个三四十岁的男人，正在答复别人的问话。

我猛然记起：我刚进中学的时候，同学们就惯以插稻草在别人的头上，一边笑，一边叫：“草卖草，人卖人”来开玩笑。于是我明白了：这女孩已经成了货物，在被人出卖了。那稻草就是标记。一听那男人（她的父亲）的话，正是在说着出卖他的女儿的原因。

“我家里还有好几个女儿，养不活哪！”

我心里顿时好像受了沉重的一击，热泪几乎涌了出来。我匆匆一瞥他们父女俩——那女孩的脸色是怎样的焦黄啊！她的惊诧而陌生的眼光，仿佛在说明着这世界的一切对于她都是陌生可怕的，她已经和这世界绝了缘了……那父亲的脸上满是雀斑，灰扑扑的，似乎充满了污垢，而那眼光，我看来，是如此的阴森，好像满藏着毒箭啊……

我不忍目睹这非人间的惨痛，于是我只好走开……

然而，冷静地想起来，这一切事情，原是不足怪的，在

这普遍地一切都商业化，一切都可以出卖的世界里，而况是没有丝毫抵抗能力的孩子呢？而况是女孩子？中国的女性，一般地说来，还没有打破这几千年来的沉重的枷锁，所以更是欺侮、出卖的良好对象了。

我们的社会，出卖妇女与孩子是寻常事，因为惟妇女与孩子没有抵抗的能力。所不同者，有的被出卖而不自觉，有的自觉了而不敢或无法反抗，然而其被出卖则一。

不过，这一次的邂逅——至少，是使我更痛切地感到周遭的黑流的压迫和自己的站起来作死力的斗争的刻不容缓。然而所有这些，那存款在外国、连女仆都带来一起出国的绅士，是连梦也不会梦见的。

中国的女性，孩子们，要自己不被出卖，就得好好的准备着斗争。

1945.2 原载《华西晚报·华灯》)

阿 Q 遗风之一端

阿 Q 穷极无奈，到尼姑庵去偷萝卜，结果被老尼姑发现了，然而阿 Q 却不承认自己是在偷东西：“是你的？你喊得它答应你么？”虽然那萝卜明明是在他手里，而且他明明站在人家的菜园子里，他明明偷了人家的东西，然而他却要“理直气壮”。

这种精神，不独表现了当时一般中国农民中的某种典型，而且也是博士阶级的特质。这遗风一直保留着。尤其是最近几年，似乎愈加传播得广泛而普遍了。

我们时常可以看到一些阿 Q 式的人物。虽然萝卜明明是在他手里，虽然他明明是站在人家的菜园子里，虽然那萝卜明明是他偷的，然而他偏要理直气壮的说：“是你的？你喊得它答应你么？”于是质问的人往往哑然无言了。是的，确然喊不答应。

于是因了喊不答应而萝卜遂变为不是自己所有，可以任凭别人偷去抢去。因为，确然，萝卜是没有声音的。

于是乎，天下扰扰，都是因为萝卜没有声音。

呜呼萝卜，呜呼阿 Q！呜呼阿 Q 之遗风！

怀念秦似

今天失掉的是世界的自由
而明天，将失掉人类的恶地狱
——《时恋集》代序

前几天，看到司马文森先生的《援救秦似》，知道秦似先生还没有死，心里真是说不出的欣幸，虽然这欣幸里面夹杂着无限的辛酸。今天，又读到史复先生的《援救千千万万的秦似》，知道秦似先生是在“逃死逃名于穷乡僻壤间”，（见史复先生原文）没有死，也没有被捕，那实在是不幸中之幸了。这些年来，作家，尤其是挺身而出与敌人短兵相接的文艺工作者，他们一直是在受着迫害：写作不自由，生活没有保障，甚至失掉了身体的自由，失掉了生命。王鲁彦死于贫病；张天翼亦是贫病交迫；茅盾先生感到写作像小偷似的，惟恐被人扼住；优秀的作者杨汁也被黑色小汽车载走，从此没有消息；以及最近茅盾的《清明前后》的秘密禁止发行和上演……因此，倘若再有一两个作家“自行失踪”的话似乎已经不足为奇。顶多有几家报纸或文化团体发出一阵呼吁，结果还是如大海中的泡沫一样，迅即消逝了。可是，秦似先生幸而没有“自行失踪”，虽然受了创伤，或者

甚至被幽禁起来吧，然而当他恢复了自由，恢复了他战斗的元气以后，他还可以再作战斗的。这是多么令人欣幸的事！

记得是去年吧，在华西晚报上看到一则很小的消息，说：“前野草月刊编辑人秦似已在湘桂途中逝世。”当时，我仿佛劈头挨了一棒，昏沉了半天说不出话来。在我的冥冥的脑中，徐徐幻出了秦似先生的坚强的身影，和他的受难的情形。（虽然我一直就没能见到秦似先生）并且立刻想起了《野草》——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那时候作为文艺界反法西斯运动坚强的一环的《野草》。

于是我赶紧翻报纸看看有没有追悼他的文章，或者有关他的较详细的记载。可是，——没有。甚么也没有。于是我感到沉重的、双重的悲哀了。我取出了几本《野草》和秦似先生的两本杂文：《感觉的音响》和《时恋集》细细读着：我又重新看到一个伟大的人的爱者的魂灵，一个坚强不挠的战士的身影。我流泪了，而当我抬起头来，迎着我的是窗外的一片无涯际的黑暗。在悲愤中，我写下了：《悼秦似先生》。

次日，一个友人来拉稿，就把我这篇稿子拿去了。可是他们那刊物立刻就短了命，而我的这篇稿子，也尸骨不存，不知散失到甚么地方去了。

因此，我更加感到悲哀和遗憾，而尤其感到悲哀的是：文化界对于这一件事情没有一点表示，甚至没有一篇追悼的文章。我想：难道秦似先生真的死了么？难道他的战斗精神和他的坚贞的人格也都死了么？

这悲哀和遗憾一直到读到司马文森先生的文章才算冰消了，代之而起的是无边的愤怒。

秦似先生，是一个挺身出来和敌人短兵相接的、坚韧不拔的战士。他和国际的法西斯力量战斗；和国内的法西斯走狗如陈诤尹及之流战斗；和所有的奴才理论奴才思想战斗……他，秦似先生，可以说，是继承了鲁迅先生的战斗传统并且加以发扬光大了的。他的每一篇文章，都是热情充沛，洋溢着对于自由、对于民主的渴望，然而同时，他憎恨奴才，憎恨那些帮助主子压迫奴隶的，那些比起主子更凶残、更暴虐的奴才。他说：假使我们有热爱，则热爱就付予人民的站起，民主政治的实现；而疾视那些躲藏在侵略者迫害者的墙垒下面，只欣幸于一片面包一根骨头坠下来的奴才。那便是憎恶……

——《感觉的音响》九页

因为他是这样爱憎分明，他的攻击又是这样的勇猛，所以，主子和奴才当然都不安了，于是“他（秦似——光注）乃为‘官军要素’而困顿，而逃亡”以至于“逃死逃名于穷乡僻壤，还不能挺身而出，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人”。（均见《援救千千万万的秦似》原文）

可是我们会退缩么？

一九四六、四月

（原载成都《华西晚报》《华晚副页》）

敬悼陶行知先生

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

—— 鲁迅

昨天晚上，刚写完了育才学校的一篇报道，就得到了我们伟大的导师陶行知先生逝世的消息，这突然的恶耗，把我袭击得昏眩了。……

这个消息，太突然了，真是我们意想不到的。他到上海去，大半是为育才的复员。我们育才的同学每天都在企望着他的消息，一方面是关心他的身体，一方面是关心学校的复员工作，可是他竟然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再也看不见亲爱的陶先生……

我的泪泉不能压抑，因为这实在是一个太大的损失！千百个青年失掉了最好的导师，民主的战线上又失掉一个英勇的战士！当我想起育才的兄弟姊妹们，听到了这个消息，将会怎样的悲痛欲绝，而反动派的特务走狗们，那些惟恐陶先生不死的人，他们会怎样的“弹冠相庆”，于是，我的感情，渗透着无限的悲哀与愤怒！

坚韧不拔的李公朴先生，倒下去了！诗人、学者和斗士

的闻一多先生，倒下去了！作为我们的指路灯塔的陶先生，也倒下去了！

这是怎样的一个世界？这样的世界，是不容许坦白，正直，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人生活下去的！陶先生虽然侥幸免于被枪杀，可是这样的环境，迫使他身心俱疲，迫使他走向死亡。那不过“殊途同归”而已！

陶先生，他生为我们，死为我们。他一生的斗争，都是为着年轻的一代。可是对于丑恶的一群，他是从不害怕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陶先生的对人处事，也正是这样。

今天，陶先生的英爽、严肃然而可亲的面容，在我的记忆里犹新，然而陶先生竟与世长辞了！

亲爱的陶先生，静静地安息吧！当我们想起你，想起你寄托在我们身上的伟大的希冀的时候，我们会更加振奋起来的。

1946年 8月，原载《华晚副页》

怀念黎茹

——并略论他的诗

三年以前 那时我还在 S. V 学校 结识了那学校的学生组织的一个学术研究会的主脑人物。我们时常在一块儿讨论各种文艺问题，还忙着出壁报。——其时我们的兴趣中心还只是文艺，其他的学术领域很少涉及——。就在这时，由于一个朋友的介绍，我认识了黎茹。

未认识他以前，我已拜读了他的长诗《牧歌初唱》。它是寄给这个学术研究会的会刊发表的。那纯朴的语言，丰富的感情，竟使我对它爱不释手。后来，我认识他了，初次见面就在学术研究会的办公室里。他穿的什么衣服已记不太清楚，总之，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纯朴，和他的诗给我的印象一样。

第一次交谈，只是很简单的几句。以后时逢时散，没有一定，可是交谈的机会总很少，畅意的长谈，竟是一次也没有。因此，关于他的身世，他的一切，我多半从朋友中听来。实在，我对他的整个人格之了解，大半是从他的作品中得到的。

他的写作态度很是谨严，每一首诗，都是经过多次推敲的；并且，他不大喜欢发表。一直到最近，他才开始发表他

的作品，但，发表了的和没有发表的比较起来，还是相差很远。他的发表的谨严，是决非一些粗制滥造的“诗人”所能想象的。

读着我保存下来的他的十几首诗，我不禁百感交集了。我想起诗人黎茹的苦难的灵魂和他的永不屈服的斗志。现在他已经决然地走到他应该去的地方去了，毫无牵累，毫无留恋！我应当为他祝福。

诗人黎茹，是农民出身，因此，他能够洞悉农民生活之底蕴，毫无间隔地表现农民的喜怒爱憎。正因为如此，他的诗是纯朴、健康、爽朗，没有虚伪的矫揉造作；没有小布尔乔亚的感伤。在他的笔下展示出来的农村，是真实的苦难的农村。诗人黎茹描写农村的诗篇，有《我行走在春天的道路上》、《牧歌初唱》等，其中以《牧歌初唱》最为完整。全篇充满着一种优美的情调，而且把苦难的农村都展示给我们了：

但是，就在这一年
我们失掉了猪
被骗走了羊
梭仑河的水磨呵
再也不响……

大兵来了
我们奉上鸡群
官差来了
我们奉上大豆
主人来了

我们找不出五谷……

年青人偷跑

贴上地契

老年人也哭了……

——这是……

什么日子！

这是怎样素朴的形式素朴的语言！可是它把那无穷的灾难无尽的痛苦表达无遗了！

再举一个例，以见它的情感扬抑之一斑：

在夜晚的集会中

我的芦笛再也不响

我望着伯伯叔叔们的脸

我心儿发酸

手儿呀

发颤……

（呵，那时候

我们生活得不好

生活得

不好……

现在，我的芦笛也哭了）

夜里，我就抱住芦笛

低低地呼唤自己：

星儿坠了

羊儿哭了
——天光不亮
我唱什么的好？

诗人黎茹是一个坚强的战士，他热情地呼唤战斗，迎接战斗。正如高尔基所说：“我生这世上是来反抗的。”他爱得深沉，也恨得深沉。因为恶劣的环境，他受到许多白眼，这更促成了他对他们的憎恨。可是他并不悲观，他的诗从无悲观的气氛，他始终是乐观的。他说：“我晓得／我们大家要生活得辉煌／生活得好”（《牧歌初唱》）他确信他能够“迎接明天的好太阳”（全上）。他知道，对于那些施给我们以压迫的人，只有反抗，才是唯一的报答。他痛切地呼喊：

我们高擎过火把的手
就这样无声地坠落？
我们歌唱得嘶哑
拿鲜血润湿的嘴
就这样默默地没有了回声？
在万人的愁眉苦脸下
这是痛苦呵
让我们奔向那宽阔的大街吧！

让愈痛苦的，愈酷爱的
站起来伸手给人群的人
兄弟般拥抱在一起……

——《让我们奔向那些街》，载《果园文艺》第七期。

这是火热的呼唤，是经过强烈的燃烧的感情熔铸而生的。

现在，我要专门来谈一谈《五个人的夜会》这一首诗。原诗是 1944 年 10 月所写，发表在 1945 年三月出版的平原社诗集之二《五个人的夜会》上。

这首诗描写三个铁匠、一个渔夫、一个马夫以偶然的聚会聚会了。他们各人叙说着自己的幻想，自己的“单纯的希冀”。诗人以悲悯的心怀写下了这首诗。

这一首诗，在技巧上，更为完美，更为圆熟了。例如：

听夜市的喧嚣
波浪狂欢地拥抱又碰碎了
渔夫跳上有点黏腻的石级
跨过一条条卧在沙滩上的绳索
含着渔腥的风在背后吹呵
他跨上去，没入那灯火错落的夜街。

请想想，这是怎样形象的写法！把那一幅优美的画面多么鲜明地展现出来了！

可是，这一首诗，实在地说，它是逊于《牧歌初唱》的。这一点，我和曹慧都有同感。因为，在《牧歌初唱》中，作者自己就是被描写的受难的农民中的一个，他所描写的农民的苦难就是他自己的苦难，所以他能够写得如此亲切；但在《五个人的夜会》里就不同了，作者是超出了他们

之外的，用着一种高高乎在上的怜悯的心情在写着：

让他们在梦里拾得一袋黄金吧

让那可怜的老渔夫有只破浪的白木船吧

因此，它的情感就远不如《牧歌初唱》之浓郁、强烈；它的语言也没有那么朴素了。有一些诗人，他们早期的作品往往是新鲜的、活泼的，富于战斗性的，但后来因为和现实生活隔绝，就逐渐失去了那种新鲜、活泼的战斗的气派，专门在技巧上打圈子，追寻灵感去了。这是一个危机，诗人黎茹也可能走上这一条路；可是他没有，他依然面对着现实。最近他写了许多时事诗，痛击那些法西斯主义者及其走狗，并且他又参加到严肃的战斗的人群里去了。他的题材，将更现实更广泛了。我热切地等待着他的新作的出现。

诗的前途是灿烂的，诗人黎茹的前途是灿烂的。

我确信：我们将能“ 迎接到明天的好太阳 ”！

1945.10.5夜于小庄

（原载 1945年 12月 6日《天风》周刊 24期）

附注：黎茹，原名覃子茹，台湾著名诗人覃子豪的胞弟，现名阳云，又名羊翬。1945年去解放区。现为湖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请参看本书第二辑《致诗人阳云》。

后 记

这本书收集的诗文，时间跨越半个世纪。《梦与现实》中的第一首诗写于 1943 年，发表于 1944 年，是我的诗歌的处女作。1947 年，我十八岁时，成都的西川书店准备出一本我的诗集，书名《暴风雨前》，这个书店曾经出过《闻一多传》、《萧红小传》、《民主大合唱》等好书。与我的这本诗集同时，还准备出版王冰洋的诗论《诗与人民》。后值“六二”大逮捕，书店被国民党查封，老板尹敬勋逃走，我的诗集也随之流失，《新民晚报》编辑王冰洋先生也不见了。解放后得知他在江苏师范学院当了教授。

《华灯初上》一辑大半是 1944 年到 45 年发表于《华西晚报·华灯副刊》上的杂文。44 年春，我在金堂县铭义中学上高一，父亲要我转学回成都。因为我的数理化没学好，父亲叫我去补习学校补习半年数理化。我去了一天，不感兴趣，就跑到少城公园里的市图书馆看书去了。从此每天去图书馆，早出晚归，父亲还以为我在补习学校，其实他给我交的学费是白交了。我白天上图书馆，晚上就在家模仿鲁迅写杂文。第二年居然考上了成都的高中读插班生。我除了向《华晚》投稿外，还给别的报刊投稿。《华灯》停办了，我又给《华晚副页》投稿。这一辑的最后的一篇《怀念黎茹——

并略论他的诗》是在念高二的第一学期写的。在《天风》周刊发表时，整本杂志只有我这一篇照我的原稿制了木刻标题，我感到是一种殊荣。《天风》的编辑陈鼎文约我谈话，一见面，才发现我是个穿着“麻麻布”制服的高中生，喜出望外。

就是这样，我是在编辑们的培植和扶持下走上业余创作之路的。

本书的一至四辑不仅与最后两辑时间跨度很大，这四辑中的文字，从 1979 年的第一篇到 1999 年的最后一篇，也是相距整整二十年。这些作品写作时的历史背景和我本人的成熟程度、思想认识自然不很相同，以至出现某些矛盾，都是自然的。之所以把它们汇集起来，不加改动，意在保留历史的真实。这就是我的人生之路。尽管不够完整，也多少表达了我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的欢乐、痛苦、爱爱、仇仇，我的挣扎，我的思索和我的人生追求。值得庆幸的是：我就是我，没有异化成另一个，没有失去自我。

1999.4.16— 17记